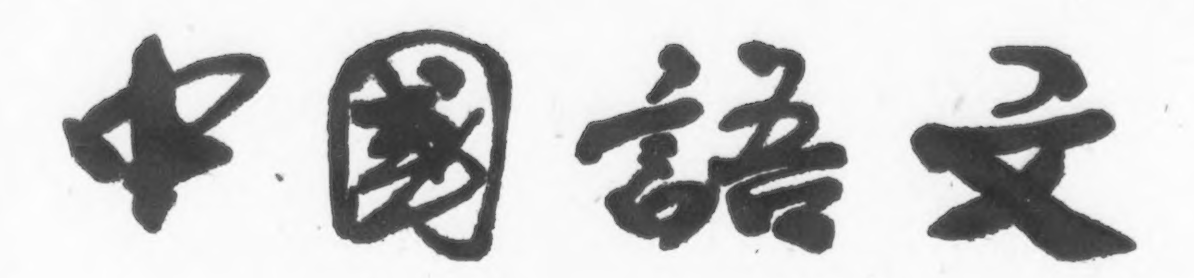


ZHONGGUO YUWEN

5

1959

1959年5月号(总第83期)目录

社　論

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張主义者的本来面目，以及他們支持西藏叛乱的眞正意圖

我們偉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毛主席早就指出，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是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發展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結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616頁)我們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是經过長期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西藏成为我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成为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成員。这是鉄一般的事实。

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張主义者不願意承認这个事实，妄想抹煞这个事实，并且屢次策动西藏独立，企圖使西藏从中国分割开来，放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为了說明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历史的事实。英帝国主义者占領印度以后，早就覬覦西藏那塊土地。他們曾經于1886—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侵入西藏。由于西藏人民的坚决抵抗，他們两次武装侵略都沒有达到并吞西藏的目的。接着，他們采取了从內部瓦解西藏的毒辣手段，收买和豢养了一批藏族敗类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徒，作为他們的工具和代理人，借口反对清政府的压迫，大搞所謂"西藏独立"。1911年，趁着辛亥革命，英帝国主义者唆使西藏反动集团發动武装叛乱，赶走了清朝的駐藏大臣，接着向当时袁世凱統治下的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圖迫使中国政府承認西藏脫离中国，淪为英国的殖民地。为了实現这个阴謀，英帝国主义者勾結西藏反动集团，召开了所謂"中英藏会議"，又叫做西姆拉会議。在这次会議上，英帝国主义者竟提出了荒謬絕倫的要求，如"中国政府与西藏有爭議时，由印度政府判决之"，"英国人得在西藏自由經商，中国政府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监督，英国得派代表常駐拉薩"，等等。中国政府代表拒絕在这次会議所提出的条約上签字，因而中国政府始終沒有承認这一条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結束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又趁着这个机会唆使西藏反动分子派兵进入昌都、德格等地，由英国駐华公使出面調停，再次要求中国政府在上述条約签字，但是由于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沒有得逞。

英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們并不因为遭到失敗而甘心，还繼續在西藏进行破坏中国統一的罪恶活动。1933年第十三世达賴喇嘛逝世后，代行达賴喇嘛职务的热振·呼圖克圖活佛，因为他代表了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維护祖国的統一，为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所仇視，于1941年被迫下台，并于1947年慘遭杀害。同情和支持热振活佛的第十四世达賴喇嘛的父亲——祁却才讓——也被毒死。

热振活佛下台后，以大札、鲁康娃、罗桑益西、夏格巴、拉鲁、夏苏、索康等为首的一群最反动最瘋狂的帝国主义走狗統治了西藏。在英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之下，这个穷凶極恶的反动集团突然于1943年夏天，宣布成立所謂“外交局”，竟把当时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也与英国、尼泊尔等国的代表一样列为駐拉薩的“外国”代表，以表示西藏是另一个“国家”。由于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命令駐藏办事处坚持不进入“外交局”，这一計划破产了。

这个計划失败后，英帝国主义者又于1947年3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所謂“泛亞洲会議”，除邀請所有亞洲国家参加外，还邀請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去参加。在会場上，英帝国主义者把西藏佛教的“雪山獅子”的旗帜作为西藏的“国旗”悬挂在会場里，又在会場悬挂的亞洲地圖上把西藏划出中国版圖之外，作为一个“独立国”。这个十分卑鄙的把戏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中国代表团也提出了严重的抗議，“泛亞洲会議”不得不加以改正。

以上事实証明，英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西藏失败后，在西藏豢养了一批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藏族败类，作为他們的工具和代理人，不断地进行各种阴謀活动，企圖使西藏淪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进行这种肮脏的勾当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故意把印度牵引入漩渦里，說什么中国和印度之間需要西藏作为緩冲国，并从英国在西藏所攫取的权利中分一部份給有关的印度人，誘使他們支持英国的侵略政策。

对西藏进行各种阴謀活动的还有美帝国主义者。1947年10月，美帝国主义者組織了一个西藏反动分子的“商务考察团”，以赴美英各国考察“商务”为名，实际上去美、英两国直接商討如何进一步使西藏背叛祖国。1949年夏天，正当全中国快要解放的时候，美英帝国主义者策动了在拉薩發生的所謂“驅汉事件”，要求国民党政府所派遣的全部駐藏人員撤退。正如新华社1949年9月2日的社論所指出，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驅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駐藏人員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策划下發动的。英美反动派勾結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件的目的，就是企圖在人民解放軍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美帝国主义者还派了一个特务头子劳尔·湯姆斯到拉薩进行阴謀活动。湯姆斯回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报紙就叫囂，“美国已准备承認西藏为独立国家，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組織的請求”，还要給予西藏地方政府以“軍事援助”。湯姆斯还写了一本書，叫做《这个世界以外》。这本書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策动西藏反动派反对祖国、破坏汉藏民族团結的罪恶活动。湯姆斯也承認他煽动西藏地方政府坚决反对中国人民解放軍进駐西藏，并說只要西藏組織“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就可以阻止人民解放軍进駐西藏”。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前哨部队到达金沙江以东的甘孜地区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通过合众社發布了西藏当局将派出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明西藏要“独立”的消息。很明显，發表这个消息的用意是企圖为美英帝国主义者公开干涉中国內政制造借口，以达到阻撓人民解放軍进駐西藏的目的。

1950年8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往西藏的格达活佛在途中被英国特务福特毒死。同年10月我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昌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11月1日在华盛頓記者招待会上，公开污蔑我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是“侵略”。美国国务院的喉舌《紐約时报》發表社論，要联合国“干預西藏

問題"。英国《泰晤士报》也發表了社論，竟无耻地說："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能从历史上找到理由。"并煽动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向我国提出"抗議"。

从上面的事实，我們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美帝国主义者开始同英帝国主义者狼狽为奸，企圖使西藏与祖国分离，并阻撓我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这次西藏反动集团背叛祖国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此唱彼和，大力予以支持，并以种种无耻的讕言詆毁我国。事实很多，不必贅述了。据报，美帝国主义者已經派特务到印度，对逃往那里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救济。美帝国主义者的居心是人所共知的。

印度扩張主义者繼承了英帝国主义者的衣鉢，对于利用西藏叛乱来干涉我国內政，不遺余力。印度扩張主义者的无耻言行是有历史根源的。上面已經說过，在英帝国主义者統治印度的时候，曾經把在西藏所攫取的权利分一部份給有关的印度人。尼赫魯 4 月 27 日在人民院講話的时候，也承認当印度独立的时候，印度"繼承了这些权利中的一些"。自从西藏和平解放后，經过中印两国政府的协商，这些权利已經取消了。但是印度扩張主义者对这些权利是有所留恋的。

还应該指出，印度有些資本家原来在西藏享有經济特权。日本《赤旗报》4 月 4 日刊載了一篇述評，揭露了印度資本家过去在西藏大做买卖，剝削西藏劳动人民的情况。这家报紙說："印度大商人过去曾經在西藏建立了在貿易方面享有特权的地位。他們利用西藏处在丛山峻岭中，交通不便的情况，用任意規定的交換率把日用品卖給西藏人，收买西藏人的羊毛。据說，印度商人在城市获利百分之三百，到內地去做买卖，就可以获利百分之八百。西藏的商业是掌握在喇嘛寺院和官吏手中的，印度的商人同他們一道享受了利益。在西藏重归中国以后，印度商人出卖商品，只能获利百分之三、百分之四。不能否認，这类印度商人对印度議会是有影响的。"

从《赤旗报》所揭露的情况看来，我們不难得出結論，印度某些資本家对西藏的眞正意圖是什么。他們不但是希望維持西藏的黑暗統治，扭轉历史的車輪，支持西藏叛乱，使西藏变为"独立国"，受着他們的控制，这样他們就可以"予取予求"了。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資产阶級某些議員、政客和資产阶級报紙，对中国平定西藏叛乱大嚷大叫！

十分明显，西藏一小撮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反动集团，煽动和支持西藏叛乱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張主义者都是剝削阶級。西藏反动集团是农奴主的集合体；英美帝国主义者是壟断資本家；印度扩張主义者是地主、資本家和他們的代理人。他們互相勾結，互相支持，互相捧場，是由于他們的剝削阶級本質决定的。支持西藏人民从極殘酷的农奴制度解放出来和支持中国平定西藏叛乱的，首先是工人阶級政党和他們的报刊；其次是工人阶級政党的支持者与同情者；又其次是其它阶級的进步人士。这是一場国际性的阶級斗爭。

在这場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出誰是我們的同志，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敌人。这次我們对資产阶級政党的反动性和民族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級政客的两面性，看得更清楚了。这对我們是很大的教育。

平定西藏叛乱，是我們的內政。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西藏，是全西藏人民的迫切要求，不允許外国干涉。我們堅決拥护第二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关于西藏問題的决議，并为它的貫徹执行而奋斗。

論語言的融合

——答戚雨村同志——

高名凱

最近几期的《中国語文》發表了几篇批判我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我都有很大的好处，我感謝同志們对我的关心。不过，这些文章里也有許多与事实不符或是学术上意見不同的地方。为了对祖国的科学事业負責起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的我，有必要加以澄清，使問題明确起来。因为时間和篇幅的关系，我不想也不能在这里对所有这一类的問題提出我的意見，现在只想就戚雨村同志在《詞的借用和語言的融合》①一文中所談的語言融合問題，来跟戚雨村同志和讀者們商榷，因为这个理論性的問題有較大的現实意义，值得及时地进行討論。当然我的学識有限，我的看法不見得就是正确的；如有錯誤，請予批評。

的确，我在語言融合問題上的意見和戚雨村同志的意見有所不同。戚雨村同志認为詞的借用不能算是語言融合的現象，而語言的融合則是属于語言發展的基本过程之一——統一过程的范圍。“統一指的是方言或亲屬語言之間分歧的减少，方言与語言（包括亲屬語与非亲屬語）的相互接近、混合的过程”（51頁）。他并且認为，“語言的融合是指語言的强迫同化过程。語言的融合是阶級社会的产物”（51頁），甚至于認为“融合是牽涉到語言数量增多或减少的基本过程的一种語言現象，而詞的借用只是牽涉到語言要素之一——詞汇丰富和發展的一种語言現象”（52頁）；然而我却認为語言的融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詞的借用是語言融合的一个現象，虽然語言融合也可以表現在語音和語法的借用上。戚雨村同志并举出公元十一世紀初开始的法兰西-諸曼地語与英語的融合作为語言融合的实例，举出現代汉語中吸收許多英語的詞作为詞的借用的实例，認为两者是本質上不同的語言現象。

在沒有談到理論的問題之前，先讓我們分析一下戚雨村同志对語言融合所作的解釋和他所举的实例之間到底是怎样的情形。戚雨村同志說，語言的融合是語言的統一过程范圍內的問題，而这“統一指的是方言或亲屬語言之間分歧的减少、方言与語言（包括亲屬語和非亲屬語）的相互接近、混合的过程”，然而他却举了十一世紀开始的法兰西-諸曼地語与英語的融合作为例証。的确，語言学家們都举英語和法兰西-諸曼地語的融合作为語言融合的一个突出的实例，然而这实例却与戚雨村同志的理論大相徑庭。法兰西-諸曼地語是罗曼語系（即拉丁語系）的語言，英語是日耳曼語系的語言，前者既不是后者的方言，后者也不是前者的方言，它們既不是同一語言的不同方言，也不是亲屬語言，更不是方言和語言（亲屬語言或非亲屬語言）之間的分歧，那末，根据戚雨村同志自己的理論，法兰西-諸曼地語和英語的互相滲透，就不能算是語言的融合了。戚雨村同志又說，“融合是牽涉到語言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的基本过程的一种語言現象”，然而法兰西-諸曼地語和英語的互相滲透，既沒有增加語言的数量，也沒有减少語言的数量，两种語言都同样地存在着，也沒有促成新的語言的产生（除非根据馬尔的理論），戚雨村同志为什么又說它是語言的融合呢？他还說，“融合是在語言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强迫同化的方式进行的，而詞的借用則是各族人民接触和交往的結果，通过一些事物和概念的影响过程进行的”（52頁）。所謂强迫同化指的是不是行政上和法律上的强迫？如果这样的話，这个实例就不能說明問題。英語和法兰西-諸曼地語的互相滲透并沒有通过政令的强迫同化的方式进行。法兰西-諸曼地人的确曾經征服过英吉利人，曾經成为英吉利人的統治者，但是历史的記載并沒有告訴我們，他們曾經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强迫过英吉利人說法兰西-諸曼地語，相反地，法兰西-諸曼地的統治者在英吉利却尽量地学習英語，作为他們进行統治的工具。正如滿洲人統治中国的时候，不但沒有强迫汉人說滿語，倒是他們極力地学習汉語（然而戚雨村同志却說滿語和汉語有融合現象），何况法兰西-諸曼地語的詞之流入英語，多半是通过法兰西-諸曼地人征服英吉利之后所形成的法兰西-諸曼地本地人和英吉利人之間的頻繁的接触和交往。事实上，在法兰西-諸曼地語和英語的接触当中，不但英語吸收了許多法兰西-諸曼地語的詞，而后者也吸收了許多英語的詞。戚雨村同志

---

① 見《中国語文》1959年2月号，51—53頁。以下引注頁碼的，均見同文。

举的实例和他自己的理論这样地处在完全矛盾的地位上，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正是戚雨村同志誤解了語言融合的必然結果。

戚雨村同志引証斯大林的話，作为他的理論的根据。他說："語言的融合是指語言的强迫同化过程。語言的融合是阶級社会的产物，斯大林曾經对它作过深刻的分析：

> 在这个时代中剝削阶級是世界上統治的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被国家的区别所巩固着，民族的平等还不存在，語言的融合是在爭取一种語言底統治地位的斗爭中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个語言底和平与友誼合作条件还未具备，摆在日程上面的問題不是各种語言底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語言被同化和另一些語言底胜利。不用說，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能是战胜了的語言和被战胜了的語言。

…斯大林在批判馬尔关于語言融合过程的錯誤結論时，曾經对这一問題作过明白的指示"（52頁）。然而戚雨村同志却不再引証斯大林的其他的話，他并沒有对斯大林的理論作出全面的研究，便断章取义地引証了斯大林这一段話，而認为只有在"一些語言被同化"的情形下，語言的互相滲透才是語言的融合。他旣沒有了解斯大林批判了馬尔什么，也沒有了解斯大林对語言融合的問題是如何的看法。斯大林說："有人說，历史上有过各种語言融合的許多事实，可以作为根据来推想这种融合是經过爆發，經过从旧質到新質的突然过渡，形成新的語言而發生的。这种說法是完全不对的…其次，如果以为两种語言融合的結果，能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語言，不象这两种語言中的任何一种，并在本質上与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区别的話，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①可見，斯大林所要指出的是語言的融合不是通过什么爆發，不会产生第三种新的語言。斯大林并且在《答阿·霍洛波夫同志》一文中补充說明，这种不能产生第三种新的語言的語言融合的情形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前的时代的情形，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后的时代里，語言的融合就可能产生新的語言。他說：

> '从你的文章里——他在信中写道，——我理解了語言底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語言，可是在这篇文章發表以前，根据你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發言，我曾坚决地深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語言会溶合为一个共同的語言。'
>
> 显而易見，霍洛波夫同志發現了这两个公式之間的矛盾并且深信应当消灭矛盾，于是認为必須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霍洛波夫也沒有想到：两个公式都可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
> 斯大林在其小册子的論及語言融合問題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前的时代…
>
> 至于說到斯大林在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發言論及各种語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語言时的另一个公式，那末这里所指的是另外的一个时代，卽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剝削阶級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将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权利底平等将被实現，压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将被取消，各民族間的合作将被建立，而各民族底語言将有在合作方式下互相丰富起来的可能。不用說，在这些条件下根本就談不到一些語言底被压制和失敗与另一些語言底胜利。在这里我們将遇到的不是两种語言——其中一种遭受失敗而另一种成为斗爭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語言——这些語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經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長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丰富的單一的区域性的語言，然后区域性的語言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語言。这种語言当然旣不会是德語，也不会是俄語，更不会是英語，而是吸收了各民族語言和各区域語言底精华底新的語言。
>
> …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發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經驗、新的知識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結論不能不随着时間而改变…馬克思主义不承認絕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結論和公式。②

这里，斯大林明确地說出：在不同的时代里，在不同的条件下，語言的融合有不同的公式。有的人因为斯大林沒有在这一段話里說："語言的融合有两个不同的公式，一是…二是…"，而只說"在…中論及語言融合的那个公式…至于說到…在…中論及各种語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語时的另一个公式"，就認为这两个公式是两回事，第一个公式是語言的融合，第二个公式是語言的溶合。这实在是一种極大的誤解。斯大林这一段話是回答霍洛波夫的問題的，霍洛波夫是听了斯大林对語言的融合所作的解釋和斯大林在另一个場合中对語言的融合（当时說成"溶合"）所作的解釋不一致，所以才写信問斯大林的。如果語言的融合和語言的溶合是两回事，前后不同的解釋就不会引起什么問題，而斯大林也就无需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公式来回答。不同的公式必得是同一回事的不同公式，也就是同一回事在不同时代里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所有不同表現的公式。如果不是屬于同一回事的，根本就談不上不同的公式，因为它們根本上是不同的事物。斯大林在回答这个問題时，曾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由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实行了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跟列宁所說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27頁。

② 同上，52—55頁。

單独一个国家內胜利的实例来作比喻，明确地說出：“由此可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問題，我們这里有着两个不同的公式。”可見，不同的公式是屬于同一个問題的，而依类相推，斯大林回答霍洛波夫时所說的两个公式也是屬于同一个問題的不同公式，即語言融合的不同公式。所以，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显然是語言的融合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环境里的不同表現的公式。“融合”和“溶合”原是指明同一現象的两个同义詞。因为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發言中用的是“溶合”，霍洛波夫引証他的話时就用了“溶合”，而斯大林在回答霍洛波夫的問題时，也就用了这个詞。斯大林之所以前用“融合”后用“溶合”，是順着他在不同时候所說的話的来源用的，是叙述他在“小冊子中論及語言融合的那个公式”，他在代表大会的發言中“論及各种語言溶合成…的另一个公式”的口气的。学者們用不同的詞去指明同一个現象是常有的事。就在霍洛波夫給斯大林的信中，他就用了两个不同的詞去指明同一个現象：“…когда социализм окрепнет и войдет в быт,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языки неминуемо должны *слиться* в один общий язык, … я понял, что от скрещивания языков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жет получится новый какой-то язык, а до статьи твёрдо был уверен, 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выступлению на XVI съезде ВКП(б), что при коммунизме языки *сольются* в один общий.”① 曹葆华、毛岸青同志把这一段話里的 слиться 和сольются 都譯作“溶合”。斯大林本人也在他的著作里用另外一个詞去指明“融合”，他在說明語言融合的第一个公式时用的是 скрещивания，但是在回答桑席叶夫的信时却說：“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остальных диалектов таких языков, то они теряют свою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вливаются* в эти языки и исчезают в них.”② 曹葆华、毛岸青同志把 вливаются 譯为“溶入”。这里斯大林講的正是他所明确指出的語言融合的第一公式中的情形，然而他却不用 скрещиваются(融合)，而用 вливаются(溶入)。我們如何能够因为斯大林在第一公式里用“語言融合”，在第二公式里用“語言溶合”，就認为这是两回事呢？可見，斯大林所說的“那一个公式”和“另一个公式”正是語言融合的两个公式，也就是在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不同的語言融合的表現；公式尽管不同，却都是語言的融合。語言的融合既可以有不同的公式，那末，戚雨村同志所說的語言的融合只能是“語言的强迫同化过程，語言的融合只能是阶級社会的产物”这一論点，就是沒有根据的了，至少不是他所說的根据斯大林的理論来做出这个結論的。因为事实非常明显，根据斯大林的理論，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后，語言融合的現象也会产生，只不过是按照一个公式来进行罢了。那时候，旣沒有語言的强迫同化，也不可能有阶級社会的存在，然而却可以有語言的融合。

戚雨村同志誤解斯大林的理論还不止于此，他强調說，“由此可見，斯大林同志所說‘通常’决不可能把詞的借用現象包括在內”(52頁)，又强調說：“詞的借用是丰富和發展語言詞汇的途徑之一”(51頁)。然而斯大林同志怎么說的呢？斯大林同志說：“例如俄罗斯語言便是这样的，它在历史發展过程中，曾与好几个民族的語言融合，并且它总是成了胜利者。当然俄罗斯語言的詞汇由于从其他語言中取得了許多詞而充实起来了，但是这不仅沒有使俄罗斯語言削弱，相反地，使它丰富和加强起来了。”③这里，斯大林明明說語言的融合包括詞的借用，并且可以使在融合中的胜利的語言的詞汇丰富和發展起来。可是戚雨村同志却認为斯大林不把詞的借用看成語言融合的現象，却認为馬克思主义把詞的借用看成和語言的融合有本質上不同的两种現象，而詞的借用的特点就在于能使語言的詞汇丰富起来；不消說，与詞的借用有本質上的不同的語言的融合就只是語言的强迫同化，換言之，就只是破坏語言詞汇的丰富和發展的現象。这就和斯大林的原意相去甚远了。

戚雨村同志有什么理由認为詞的借用和語言的融合是两种不同的現象呢？他的唯一理由是：“詞的借用就是指直接从外国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詞的一种現象”(51頁)，而語言的融合則“指語言的强迫同化过程”。这种論調，在我看来，正是戚雨村同志誤解語言融合的主要原因。戚雨村同志憎恶語言的强迫同化，欢迎在他看来能使語言詞汇丰富起来、發展起来的詞的借用。这种用心是好的，但是他沒有能够实事求是地处理科学問題。当然，“詞的借用”的概念并不等于“語言的融合”，我在《現代汉語外来詞研究》中也只說，“这种情形就使我們了解吸收外語的詞是語言融合的一个問題”，④“总之，吸收外語的詞是語言融合中的一个現象”，⑤并且認为“語言是由語音、詞汇、語法三种要素組成的。这三方面都可以引起語言的融合”；⑥

---

① И. Сталин,«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1950, стр. 45.

② 同上，стр. 37.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文本，28頁。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④ 高名凱、刘正埮：《現代汉語外来詞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5頁。

⑤ 同上，7頁。

⑥ 同上，3頁。

我并沒有說詞的借用就等于語言的融合。然而"語言的强迫同化过程"这一个概念也并不等于"語言的融合"。不用說，斯大林的語言融合的第二个公式已經說明了語言的融合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采取合作的方式，不必都得采取强迫同化的方式。就是認为語言的融合必得是由"强迫同化"所引起的，"語言的融合"也不等于"語言的强迫同化"。語言的强迫同化只是語言融合的原因，而語言的融合則是这原因所引起的結果，不論它是否引起語言融合的唯一的原因。把原因和結果混为一談，正是戚雨村同志在这个問題上所犯的邏輯上的錯誤。正如我們說水和糖發生融合的現象时，我們所說水的成分和糖的成分在某种原因的推动下，發生了融合現象似的，当我們說两种語言融合的时候，我們所指的也只是这两种語言的成分在某种原因的推动下，發生了融合的現象。有沒有融合要看这两种語言的成分是否融合在一起，而不是看是不是有促成这种融合的某一特定的原因。一个現象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原因，水和糖的融合可以是某一厨师把糖放在水里的結果，也可以是風过处把糖吹入水里的結果。然而无論是何种原因，只要水和糖融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說水和糖融合了。同样的，不論是什么原因，不論是不是只可能有一种原因，只要两种語言的成分融合在一起，它就是語言融合的現象。当然，在研究語言融合的时候，我們除了要認識清楚两种語言的成分是否融合了，換言之，要确定地查明到底有沒有語言融合的現象产生之外，还要研究这种融合現象是什么原因所产生的結果；但是，我們却不能够因此而拿一个固定的原因来作标准去判断两种語言是否發生了融合現象。

有一定的原因当然要产生一定的結果，但是在原因和結果之間有时間先后的順序。作为原因的現象是在前的，作为結果的現象是在后的。如果在这前后两段时間之中，有别的因素干預其間，这原因的出現也可能不产生預期的結果，而同一个結果的产生也可能是别的同类的原因所引起的，不一定非是一个特定的原因不可。强迫同化当然是語言融合的一个原因，但語言是否發生融合現象却不一定非有强迫同化不可，而强迫同化也不一定就会引起語言的融合，还要看是否有别的原因的干扰。强迫同化固然可以产生語言的融合，合作互助也可以产生語言的融合，尽管这两种融合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表現。然而戚雨村同志却拿語言融合的原因来作为規定語言融合的标准。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强迫同化的过程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原因的互相滲透才算是語言的融合，这就好象說只能認为厨师把糖放在水里所产生的結果才算是水糖的融合，而由風把糖吹入水里所产生的結果就不能算是水糖的融合似的，这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推理。

語言的融合原是十九世紀語言学家們所提出的一个理論。远在1897年，德国的語言学家維因迪施(E. Windisch)就在他的《混合語和借詞的理論》(Zur Theorie der Mischsprachen und Lehnwörter)里提出語言融合的理論，認为語言之間彼此吸收对方的成分的現象就是語言的融合。两种語言由于历史的原因發生彼此的成分的相互吸收是人們所常看到的現象，这种現象所以称为語言的融合，因为被融合的是語言的成分，不是别的。但是，語言学家对語言融合的規律或其結果則有不同的看法。齐列龙学派沒有認識到語言特点的本質是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他們以为只要两种語言彼此吸收語言成分，它們就是混合的，就是不純粹的；因之，認为世界上沒有純粹的語言。馬尔受了这一学派的影响，以为两种不同的語言彼此吸收語言成分的时候，就产生了第三种新的語言；換言之，他認为純种的語言并不存在。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語言一开头就是种类繁多的，这些类种繁多的語言一开头就彼此吸收彼此的成分，因之，随时产生第三种新的語言，并認为这种产生第三种新的語言的情形是語言發展的基本規律。这种理論当然是錯誤的，但是齐列龙和馬尔的錯誤并不在于他們承認有語言融合这一現象(斯大林也承認有語言融合的存在)，而是在于他們誤解了語言融合在語言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誤解了語言融合的結果。其实，在以往的历史中，語言的融合虽然是常見的現象，却不是語言發展的唯一趋势，相反地，語言的分化也是語言發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語言的融合并不能引起第三种新的語言的产生，至少目前的語言学家还沒有証明有由語言的融合而产生第三种新的語言的情形。齐列龙和馬尔事实上也并沒有看見过語言的融合曾經产生过第三种新的語言，他們所以这样的主張，因为他們沒有了解到語言特点的本質是語言的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在語言融合的过程中發生接触的語言虽然彼此吸收了对方的成分，但这些成分却多半是一般詞汇，不是基本詞汇或語法結构。有的时候，其中的一种語言也可以在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方面吸收对方語言的成分，如果在这些方面吸收对方語言的成分过多的話，这种語言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因为它已經失去了它的語言特点的本質，然而它的对方却不因此而失去存在，因为它的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沒有受到什么影响，它还要按照其內部發展規律發展下去。換言之，新的第三种語言并不因此而产生。齐列龙学派和馬尔学派的錯誤，已經受到斯大林和苏联的語言学家的批判；但这不等于說語言融合这一个概念是錯誤的。

語言的融合既然是两种語言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發生接触时所产生的語言成分的融合，那末，这些成分

到底是什么呢？戚雨村同志尽管認为語言的融合是語言的强迫同化，但他也不能不承認，“語言的融合的結果，也可以使一种語言中出現一定数量的外来詞”（51頁）。問題很明显，如果語言中沒有出現任何其他語言的成分，就是有过强迫同化，也不能构成語言的融合。土耳其人占領希腊的时候，曾經用政府的政令和法律企圖消灭希腊語，强迫希腊人說土耳其語，但是由于希腊人的反抗，那时候的希腊語却沒有吸收土耳其語的成分，也沒有被消灭。然而，如果沒有强迫同化，而語言中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斯大林所說的合作的原因，出現有其他語言的成分，甚至于产生了新的語言，我們也只能承認有語言融合的現象产生。語言成分，除了語音、語法、詞汇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你問主張必得是强迫同化才能有語言的融合的人，到底在語言身上，什么东西被融合了，他也不能不回答：被融合的是語言中的詞，或語音或語法成分。那末，吸收別的語言的詞还能不是語言融合的一个現象嗎？如果說“强迫同化”指的不是政令法律或其他的手段强迫說別一种語言的人放弃自己的語言，而指的是語言之間的强迫，那末，这种强迫同化到底是什么呢？它只能是在另一种强有力的語言之下讓这另一种語言的成分流入語言之中。这么一来，在自己身上缺乏某种成分而在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吸收其他語言的成分就是語言的强迫同化，而詞的借用也不能不是这种强迫同化的結果。我們知道，各語言之間彼此吸收对方的成分时，語音成分的吸收是罕有的，語法成分的吸收也是少見的，一般的情形是詞汇成分的吸收。就是在一胜一敗的情况下，胜利的語言所吸收的，一般的情形，也只是对方語言的詞汇成分。戚雨村同志既然認为胜利的語言产生有語言融合的現象，甚至于認为沒有完成的胜敗，即两个語言还沒有得到最后胜利或失敗的情形也是語言的融合；那末，他又有什么理由否認詞汇的吸收是語言融合的一个現象呢？难道被融合了的胜利的語言就必得在吸收別的語言的詞汇成分之外还要吸收別的語言的什么別的东西嗎？如果它吸收了別的語言的詞汇以外的东西（例如全面地吸收別的語言的語法結构），它还能在融合中成为胜利的語言嗎？可見，在融合的过程中，就是在有一胜一敗的結果的情形下，被融合了的語言也可以只吸收另一个語言的詞汇成分，当然，还吸收其他語言的語法成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詞汇成分的吸收（即借用外来詞）不但是在被融合胜利的語言中出現的現象，而且是唯一的現象。在被融合的失敗的語言中，它也可能是被融合的唯一的語言成分，因为只要詞的借用大量地涉及基本詞汇，它就損失它的特点的本質，而宣告失敗。非常明显，語言的融合只能被理解为两种發生接触的語言的彼此吸收对方語言成分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被融合的东西也只能是对方語言的語音、語法或詞汇的成分，其中幷且是以詞汇成分的吸收为最常見和最主要。就是在得到最后胜敗的情形下，詞汇成分的吸收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之下，語言的融合从来也沒有过两个語言的所有成分都溶而为一的情形，語言的融合只能是某些語言成分的融合，被融合的成分到底多少，只是数量的問題，幷不影响其为融合，正如水多糖少，或水少糖多都是水和糖的融合一样。所以，詞的借用不但是語言融合的一种現象，而且是語言融合的一个主要的現象。

当然，融合的情形可以不同，融合的結果也可以不一样，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其为融合。正如水多糖少或糖多水少的融合可以产生不同的結果，糖多了太甜，可以敗胃口，糖少了太淡，沒有味道，但我們不能因此而說水和糖沒有融合。两个語言在詞汇上的融合，如果涉及于基本詞汇的范圍，就可以使在基本詞汇方面吸收过多其他語言成分的語言失去它的特点的本質，如果是在違反本語言的內部發展規律的情形下吸收其他語言的成分，这种融合也会破坏語言的純潔性，但这不等于說融合的現象一定是坏現象，也不等于說融合的現象一定是好現象。无論是融合也罢，或是借詞也罢（如果象戚雨村同志似的認为借詞不是融合的一个現象），它都既不是絕对的好現象，也不是絕对的坏現象。問題在于这种吸收外来詞的現象是否按照語言內部發展規律进行的。按照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去吸收外来詞，只能使語言的詞汇丰富，不会損失語言的純潔性；沒有按照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去吸收外来詞，就算是借詞不是語言融合的一个現象，借詞也会破坏語言的純潔性。如果在吸收外来詞方面，大量地吸收基本詞汇的詞，使自己失去了語言特点的本質，这就損害了本語言的正常發展，甚至于可以使本語言趋于死亡。戚雨村同志沒有理解这种辯証的道理，也沒有理解我的論点。他說：“可是主观的臆測是經不住事实一駁的，詞的借用决不会引起語言特点的本質的消灭”（52頁）。为什么詞的借用就决不会引起語言特点的本質的消灭呢？如果詞的借用涉及了基本詞汇的詞的大量的借用，語言特点的本質还能存在嗎？我在我的《普通語言学》中說：“尽管英語的一般詞汇包含有百分之四十的法兰西-諾曼地語的詞，还包含有許多丹麦語的成分，尽管英語在語法上也受有一些丹麦語語法的影响，但是英語始終保存其特点的本質部分，根深蒂固，不受动搖。……英語的这一个基本的部分沒有受損害，所以仍然成其为英語，幷不因为其他部分受外来語的影响以致丧失其独立存在的条件。这不可損害的部分就是它的基本詞汇和語法构造的基础以及它的內部發展的規律。外来

的成分只能使語言①越加丰富，不能使語言損害它的特点的本質，影响它的独立性。"②又說："失敗者就失去了它的特点的本質，以致于死亡。"③这两段話清清楚楚地指出，在詞的借用沒有涉及基本詞汇(語言特点的本質之一)的基础的情况下，詞的借用能使語言越加丰富，但是在語言特点的本質的基础受到損害的时候，語言就要灭亡。这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来估計借詞的，并且認为在沒有損害基本詞汇的基础的情况下，借詞是使語言丰富的一种手段。然而戚雨村同志竟至于把我的話誤解了。他說："然而在語言学界却还有一部分有狹隘民族主义情緒的人，借口詞的借用会'損害'民族語言的純潔性，反对正常的吸收外来詞。而高名凱先生恰恰肯定了詞的借用是語言的融合，說什么，在本語言不能抵抗外来詞成分的侵襲，而終于損失了語法結构和基本詞汇的时候，它就不再成为原来的一种語言，而宣告'寿終正寢'了，既然詞的借用会引起語言的混合甚至灭亡，反对吸收外来詞豈不'振振有詞'。"并且下了一个判断："高先生在这里不自覺地为殖民者充当了义务辯护士"(52頁)。戚雨村同志担心狹隘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吸收外来詞，他的用心值得欽佩，但是我并沒有反对吸收外来詞，而且主張在正常的条件下尽量地吸收外来詞。我不是在《現代汉語外来詞研究》中說过，"这些外来詞成分反映出汉族人民在近百年来如何和世界各角落的各族人民有过頻繁的接触，也說明了現代汉語如何在詞汇方面随着社会的發展，由于汉族人民的創造力的运用，而日益丰富起来"嗎？④然而我也并不同意濫用外来詞。詞的借用或語言的融合在某种条件下，对語言是有益处的，它可以使語言丰富起来，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即濫用外来詞，使其破坏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和語言特点的本質的情况下)，却对語言是有害处的。語言学家的任务正是要把根据不同的情形来处理外来詞的問題，不是一味地反对外来詞或一味地濫用外来詞。戚雨村同志的思想方法，正是毛主席所批評的"好的就絕对的好，坏的就絕对的坏"的思想方法，因为他只看到詞的借用对語言的丰富作用，沒有看到詞的借用在另外的情况下会产生破坏語言純潔性的作用，因而拒絕把詞的借用看成語言融合的一个現象。因为在他看来，語言的融合是絕对坏的，他就急于拿語言融合以外的东西("强迫同化")来作为規定語言融合的标准。其实，"强迫同化"只是語言融合的一个原因，語言的融合只能拿語言的成分是否相互吸收来規定，在不同的原因之下，語言的融合甚至于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同情形的語言融合甚至于可以产生丰富語言或破坏語言的不同結果，但是，表現尽管不同，却一样的是語言的融合。

有的人由于斯大林只說到語言融合的两个公式，就認为語言的融合只能有两种公式，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前，語言的融合只能指"强迫同化"的語言之間的相互影响。戚雨村同志就是这些人之中的一个。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斯大林在《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时，只談到語言融合的第一个公式。我們是不是可以因此就認为斯大林否認語言的融合有其他的公式呢？显然不能的，因为等到霍洛波夫問到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就在他給霍洛波夫的回信中提到語言融合的第二个公式。斯大林是不是还可以提出語言融合的第三个公式呢？在斯大林逝世之前，还沒有人問过他这个問題，我們沒有能够从他口里得到回答。然而我們是不是就因此而不能研究这个問題呢？显然不是这样的。斯大林虽然提出了語言融合的两个公式，但是他并沒有說語言融合的公式只有两个。說"語言的融合有两个公式"这句話，在邏輯上并不排斥說語言融合有其他公式的可能性，正如說"我有两管金笔"这句話并不排斥"我还有第三管金笔"似的。研究了斯大林的論著之后，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語言的融合可能还有其他的公式。斯大林說："在两种語言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有其中某一种語言成为胜利者，保存自己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詞汇，并繼續按其內部發展的規律發展着，另一种語言就逐漸失去自己的本質，而逐漸衰亡。"⑤这里斯大林說的是"通常"的情形，他的話已經意味着还有不完全是这样的情形。事实証明，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前的时代里，語言的融合也可能有其他的情形，即失去存在的語言并不一定要失去自己的特点的本質。姑不論沒有得到最后胜敗的英語和法兰西-諾曼地語的融合，沒有使英語和法兰西-諾曼地語發生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上的改观，就是在已經胜敗分明的两种語言的融合中，失敗了的語言也并不一定要丧失它的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它的灭亡并不是失去自己的特点的本質的結果，而是不再被人們所运用。这种情形当然也有它的特殊的社会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人們还沒有理解到語言同化政策的作用时，尽管他們侵占了其他部族的土地，成了其他部族的統治者，他們却往往不但不强迫被統治的部族来說統治者的語言，相反地，要学習被統治者的語言。佛兰克人侵入法兰西的时候，他們不但不强迫拉丁部族的法兰西人說日耳曼語的佛兰克話，反而学習法兰西語，終于放弃了佛兰克語；但在佛兰克語

① 这里所說的語言由于上下文的关系，指的是英語。

② 高名凱：《普通語言学》(修訂本)，1957，94頁。

③ 同上，95頁。

④ 高名凱、刘正埮：《現代汉語外来詞研究》，109頁。

⑤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文本，1953年，28頁。

和法兰西語的融合中，佛兰克語只吸收了少量的法兰西語的成分，在保存自己的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的情形下不再被人們所应用，而失去存在。鮮卑人也曾統治过我国，在我国建立了北魏王朝，但是統治我国的鮮卑人并沒有强迫汉人說鮮卑語，相反地，倒是他們学習了汉語，鮮卑語在和汉語的融合中，并沒有失去它們的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而是不再被人們所运用。这里当然也有語言与語言之間的竞爭，但这竞爭却不是由于"强迫同化"的政策，这里当然也有一胜一敗的結局，但这一胜一敗却不是通过其中的一个失去特点的本質而趋于死亡的方式来告終的，而是以不再被人們所运用的方式来告終的。这种情形并且不是少見的。可見，語言的融合还有不同于第一、第二的公式的情形，但它們却仍然都是語言的融合，因为在融合着的語言都在語言成分上彼此吸收。尽管斯大林說語言融合的第一个公式适用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前的时代里，但是这时代指的显然不是在此以前的人类的全部历史。斯大林接着就描写这个时代，認为是"剝削阶級是世界上統治的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被国家的区别所巩固着，民族底平等还不存在"① 的时代。这一段描写說明了斯大林所說的話指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胜利以前的整个人类历史，而只是"剝削阶級是世界上統治的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的时代。不消說，沒有阶級的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甚至于对民族和殖民地开始压迫（不是仍然压迫）的时代，換言之，沒有奉行压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的时代，語言的融合就不見得都是其中一个成为胜利者保存其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繼續按照其內部發展規律發展下去，其中一个失去其特点的本質，趋于死亡的一胜一敗的公式，要看具体的情形如何。这种一胜一敗的公式然是奉行压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所促成的，那末，在可能奉行压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內各民族語言之間的融合就不是这种一胜一敗的公式而是彼此丰富，彼此促进，然而却仍然沒有使任何对丧失其特点的本質的融合公式。在这个情形下，語的融合不会使其中的一个語言失去它的基本詞汇和法結构，然而却会彼此采取彼此的精华，在沒有破自己的內部發展規律的条件下尽量地吸收基本詞汇語法結构以外的語言成分来充实自己。斯大林是从世界当前的局势和将来的前景来說明語言融合的两公式的，他沒有談到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內的言融合的情形，但是他的理論已經給我們提出这一式的可能性，他指出語言融合的不同公式决定于社的不同条件。所以在既不同于第一公式的社会条件又不同于第二公式的社会条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条件之下，融合的公式也就不同于第一公式或第公式。因此，尽管斯大林沒有說到第一、第二公式外的其他公式，斯大林的理論原則却已經給我們解了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現不同于第一、第二公式語言融合的情形，甚至于还有其他的融合公式的形。不过，尽管有这些不同的公式，它們却都只是語融合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的表現，不能因为公式有不同，就否認其为語言融合，因为无論在任何情形下，語言的融合都必得有在接触的語言之間的語言分的彼此吸收，不論吸收得多少，不論这吸收的結果否影响到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的面貌的改观。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文本，19年，53頁。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語教研組的科学研究

为了迎接偉大的国庆十周年，华南师范学院汉語教研組全体同志积極响应党的号召，訂出科学研究規划，准备以丰碩的果实向国庆献禮。

他們的規划是以繼續深入批判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和广东方言研究为中心。为了更好地發揮集体力量，在語言学領域內树立起馬克思主义紅旗；大家决定进一步深入地批判王力和高名凱两位先生的語言学著作。同时还决定利用学院設在广东地区的有利条件，对广东方言作一次全面的系統的研究。这两个中心問題，同志們都已訂入个人規划。此外还有个人提出的項目若干篇，下面的題目就是这些項目中的一部分：

1）十年来汉語語法理論的發展；2）論現代汉語語法的精密化；3）論汉語語法的稳固性和变动性；4）詞汇和語法規范化的一些問題；5）《論衡》的詞汇語法研究；6）《世說新語》的詞汇和語法研究；7）广东地区北京語音教学；8）在广东方言区教学普通話的几个問題。（**郑玉春**）

現代藏語和汉語在构詞方面的共同特点

韓 鏡 清

我們社会主义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汉藏两个民族很早就有着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公元第七世紀，藏族剛創造文字的时候，文成公主就把汉族文化、工匠、蚕种等作为陪送，带給了藏族人民；其后又有金城公主也作为文化、政治、經济方面的使节嫁往西藏，西藏也派有子弟来內地留学，学習詩書文学；从十三世紀起更正式隶屬中国版圖，成为祖国民族大家庭成員之一，政治、經济、文化的关系更形密切。中国共产党領导各民族人民在全国范圍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又于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締結十七条协議，中央帮助西藏大力發展西藏的政治、經济、文化事业；但由于西藏大农奴主、反动上層分子种种阻挠，协議不能順利执行，并且屡次阴謀破坏协議策动叛乱，最近更变本加厉，公然全面叛乱，劫持达賴喇嘛，中央代表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意志，迅速平定叛乱，徹底鏟除了民族败类，給祖国統一，民族团結更鋪平了道路。今后在汉族帮助之下，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必然突飞猛进，在語言上也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反映，这由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新詞术語和借詞的成批地增加，就可以証明。

我們知道，藏語不仅很早就从汉語借入很多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用詞，并且在語言、語法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特点。这些特点絕非偶然，除語言来源外，还有两个民族彼此政治、經济的密切往还、互相影响的关系。

我們只把拉薩話作为現代藏語的代表，同汉語的构詞法进行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有不少特点是共同的。

首先談談詞头、詞尾的問題吧，称謂亲屬的名詞在汉語里往往有个詞头"阿"字，如"阿姨""阿爹"等；在藏語里也有这种情况。例如：

ཨ་ཕ་　qa pha　爸爸　　ཨ་ནི་　qa ni　姑姑

ཨ་མ་　qa ma　媽媽　　ཨ་ཁུ་　qa khu　叔叔

ཨ་ཇོ་　qa jo　哥哥　　ཨ་ཞང་　qa zhang　舅舅

在汉語里动詞表示否定时，一定在詞根前加上詞头"沒"或"不"，在藏語里动詞也用这种方式表示，例如：

མི་འདུག་　mi hdug　沒有，不是　　མ་ཕྱིན་　ma phyin　沒去

མ་རེད་　ma red　不是　　མ་བལྟས་　ma bltas　沒看

在汉語里有些四音节詞有的中間有襯音，并沒有意思，有的仅是双音节詞前后各自重迭一次，如"糊里糊塗"、"晃里晃蕩"、"零零碎碎"等，在藏語里这种詞为数也不少，結构很相近。例如：

ཚ་གི་ཚི་གི་　tsha gi tshi gi　慌里慌張

ངག་གེ་ངོག་གེ　ngag ge ngog ge　秃里秃魯（口齿不清）

ཧ་རི་ཧུ་རི་　xa ri xu ri　馬里馬虎

ཀ་རེ་ཀོ་རེ་　ka re ko re　拖拖拉拉

ཙ་གི་ཙི་གི་　tsa gi tsi gi　零零碎碎

ཉ་རི་ཉོ་རི་　nya ri nyo ri　磨磨蹭蹭

ཛ་རེ་ཛོ་རེ་　dza re dzo re　乱七八糟

ཁྱ་རི་ཁྱོ་རི　khya ri khyo ri　搖里搖晃

ཐབ་བི་ཐིབ་བི་	thab bi thib bi	阴里阴沉
ཨ་ཀྱོག་སྦ་ཀྱོག	qa kyog sba kyog	歪里歪斜
ཐ་རེ་ཐོ་རེ་	tha re tho re	稀稀拉拉
ར་དེ་རོ་དེ་	ra de ro de	坑坑洼洼
སྡ་རེ་སྡོ་རེ་	sda re sdo re	粘粘糊糊

在汉語里形容詞常常带有音节重迭的詞尾,如"紅通通""白花花""黑呼呼""热騰騰"等,在藏語里也有同樣情况。例如:

དམར་ལྷོང་ལྷོང་	dmar lxong lxong	紅东东
ལྗང་ཐིང་ཐིང་	ljang thing thing	綠油油
རྒྱག་སང་སང་	rgyag sang sang	胖敦敦
ནག་ཤུར་ཤུར་	nag shur shur	黑須須
དགའ་སང་སང་	dgah sang sang	喜洋洋
སེར་ཧུར་ཧུར་	ser xur xụr	黄呼呼
འོད་ཐིང་ཐིང་	hod thing thing	亮堂堂
ཕྲ་སིལ་སིལ་	phra sil sil	細溜溜

在汉語里形容詞可以重迭,表示語意加强并且多作副詞用,如"多多地""好好地", 藏語里形容詞也可以連詞尾整个重迭,也表示語意的加强,但多数还作形容詞用。例如:

མང་པོ་མང་པོ་	mang po mang po	很多
མཐོ་པོ་མཐོ་པོ་	mtho po mtho po	很高
ཆུང་ཆུང་ཆུང་ཆུང་	chung chung chung chung	小小的,很小
སྔ་པོ་སྔ་པོ་	nga po nga po	很早,早早地
མགྱོགས་པོ་མགྱོགས་པོ་	mgyogs po mgyogs po	快快地

汉語里形容詞加上附加成分"点兒",变成副詞,表示动作在某方面的程度更形增强一些, 藏語里也有这个附加成分 "—ཙམ"。例如:

མགྱོགས་ཙམ་	mgyogs tsam	快点兒
མང་ཙམ་	mang tsam	多点兒
ཆེ་ཙམ་	che tsam	大点兒

汉語里动詞加上附加成分"的"或"者"便变成了名詞,如"卖报的""游园的""劳动者""提問者"等,都成为动作者的名詞了,藏語里也有这样一种附加成分,就是 མཁན (口語里用 ངན)。例如:

ཚག་དཔར་ཚོང་ངན་	tshag dpar tshong ngan	卖报的
སྐད་ཆ་འདྲི་ངན་	skad cha ndri ngan	提問者
ཡི་གེ་བཏང་ངན་	yi ge btang ngan	發信人

ངལ་རྩོལ་བྱེད་ངན་　ngal rtsol byed ngan　劳动者

汉語里动詞加上附加成分“的”还可以变成表示这种动作所享用的东西或材料，如“吃的”“喝的”等，藏語里有一རྒྱུ་ rgyu 和 ཡག་ yag，也可以起同样作用，并且使用得更广泛。例如：

ཟ་རྒྱུ་　ཟ་ཡག་　za rgyu, za yag　吃的

འཐུང་རྒྱུ་　འཐུང་ཡག་　hthung rgyu, hthung yag　喝的

སྡོད་ཡག་　sdod yag　住的

རྩེད་མོ་རྩེ་ཡག་　rtsed mo rtse yag.　玩的

藏語里并且可以用 ས་ sa“处所”，ཁང་ khang“房舍”一些名詞或名詞詞根，同动詞直接連用造成复合名詞，汉語里也有类似情况而不及藏語里广泛。例如：

གློག་བརྙན་བསྟན་ས་　glog brnyan bstan sa　放映电影处

ཡི་གེ་བཏང་ས་　yi ge dtang sa　通訊处

ཟ་ཁང་　za khang　食堂

སློབ་ཁང་　slob khang　教室

汉語里动詞直接加上“法”（有兒化、不兒化两个）也变成复合名詞，表示某一动作的方式或方法，藏語里也有一སྟངས་ stangs —ཐབས་ thabs 等，同汉語里的“法”相当，但不單独使用。例如：

སློབ་སྟངས་　slob stangs　教学法兒

བྱེད་སྟངས་　byed stangs　作風，作法兒，

ཡི་གེ་འབྲི་སྟངས་　yi ge hbri stangs　書写法兒

བསམ་བློ་བཏང་སྟངས་　bsam blo btang stangs　想法兒

ཡི་ཙི་བཟོ་ཐབས་　yi tsi bzo thabs　造胰子法兒

རྡོ་སོལ་སྒོགས་ཐབས་　rdo sol smgogs thabs　开采煤炭法

汉語里可以把“时”同动詞直接連在一起，成为名詞詞組或复合名詞，表示动作的时間，如“煉鋼时”“插秧时”“出嫁时”“用时”等，也可以說“幼时”（或“少时”）“多时”“少时”“热时”“冷时”等，（这些看作“插秧的时候”“出嫁的时候”等詞組的省略也可以），在藏語里这种結构經常使用。例如：

འོ་མ་བཞོ་དུས་　ho ma bzho dus　（牛奶挤时）挤牛奶时

གངས་ཆེན་པོ་འབབ་དུས་　gangs chen po hbab dus　（雪大下时）下大雪时

ལོ་གཞོན་དུས་　lo gzhon dus　年青时

གནམ་གཤིས་ཡག་དུས་　gnam gshis yag dus　天气好时

由以上所列現象可知动詞不但可以直接同附加成分粘合，还可以同“处”“时”“法”等粘合，在藏語里动詞甚至可以同一部分形容詞粘合起来成为形容詞結构。

在汉語里复合名詞的构成常用两个意义相近的詞联合的方式，如乡村、城市、思想等；在藏語里也有这样情况。例如：

སྐད་ཡིག་	skad yig	語文	ལྷག་འཕྲོས་	lxag hphros	剩余
བསམ་བློ་	bsam blo	思想	བདེ་སྐྱིད་	bde skyid	幸福
དོགས་འདྲི་	dogs hdri	疑問	འདྲ་མཉམ་	hdra mnyam	平等
ཉོ་ཚོང་	nyo tshong	买卖	ཐབས་བྱུས་	thabs byus	計策
ནོར་འཁྲུལ་	nor hkhrul	錯誤	ལྟོ་གོས་	lto gos	衣食；生活

在汉語里复合名詞的构成，还常用两个意义对立的詞联合的方式，如"大小""动靜""冷暖""甘苦"等；藏語也是一样。例如：

ཆེ་ཆུང་	che chung	大小
ཚ་གྲང་	tsha grang	冷暖(溫度)
སྔ་རྟིང་	snga rting	先后，次序
སྔ་ཕྱིས་	snga phyis	早晚
སྐྱིད་སྡུག་	skyid sdug	苦乐(疾苦)
ཉིན་མཚན་	nyin mthsan	晝夜
ཡག་ཉེས་	yag nyes	好坏(質量)

以形容詞詞根联合成的名詞都可以充当疑問代詞用，汉語里也有这种情况，如"多少"。而汉語构成疑問代"多長""多短""多大""多小"的"多"，藏語里正有一个—ལོས་ los 和它的作用一样，只是用在形容詞詞根的后边，而不用在前边。例如：

ཚ་ལོས་	tsha los	多热	རིང་ལོས་	ring los	多長
གྲང་ལོས་	grang los	多冷	ཐུང་ལོས་	thung los	多短

用两个名詞通过前修飾后的关系构成双音节的复合名詞的方法，汉藏語也是共同的。例如：

རས་ཡོལ་	ras yol	布帘	ཏིལ་སྣུམ་	til snum	麻油
རྩྭ་ཐང་	rtswa thang	草原	ཤ་ཁུ་	sha khu	肉湯
ཆུ་དྲེག་	chu dreg	水銹	ལག་རིས་	lag ris	手紋

前边用形容詞(藏語用形容詞詞根)后边用名詞，通过前修飾后的关系可以构成双音节的复合名詞。例如：

སྐམ་ས་	skam sa	陆地
དྲག་ཆར་	drag char	暴雨
མཁྲེགས་ཤིང་	mkhregs shing	硬木
དཀྱུས་འབྲས་	dkyus hbras	糙米

前边用动詞后边用名詞通过前修飾后的关系可以构成双音节的复合名詞。例如：

ཐོན་རྫས་	thon rdzas	产品
སྒྲིལ་རས་	sgril ras	包袱皮兒

རྒྱུགས་ཆུ་	rgyugs chu	流水
འགོས་ནད་	hgos nad	傳染病
འཁྱིལ་ཆུ་	hkhyil chu	积水
སྐྱེལ་སྐར་	skyel skar	生辰，生日

另外，汉語里有几个动詞，意义很广泛，只看什么宾語同它發生关系，就可以有具体的不同的意义，因此也就同宾語构成动宾結构的复合动詞，如“打”“开”“放”“弄”“搞”等，而藏語里也正有这么几个。例如：

བརྒྱབ་	brgyab	打…
བཏང་	btang	开动，發放，打…
བྱས	byas	弄，搞

我們可以再举些复合动詞作例証：

མེ་མདའ་བརྒྱབ་	me mdah brgyab	打槍，放槍
སྦག་བརྒྱབ་	sbag brgyab	打牌
འབྲུག་སྐད་བརྒྱབ་	hbrug skad brgyab	打雷
ལའན་ཆིའུ་བརྒྱབ་	lahn chihu brgyab	打兰球
ཁ་པར་བཏང་	kha par btang	打电話
ཆུ་བཏང་	chu btang	放水，澆水
ཡི་གེ་བཏང་	yi ge btang	發信
གཙང་མ་བྱས	gtsang ma byas	搞干净
ཉོག་དོ་བྱས་	nyog do byas	弄渾

数詞的結构也有許多同汉語相似的地方，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由以上詞的結构和构詞法，可以看出現代藏語和現代汉語的共同特点是很多的。我們可以再进一步从語言發展史和民族关系的历史方面研究这些現象，找出它的原因或規律来。由語言上的各种特点是可以反映出过去民族間的关系的，这种关系已經成为两个民族互相学習上的有利条件。

（上接218頁）

原则是不是会有抵触？我們認为，尽可能靠攏汉語的原則作为一个总的方向是不可动搖的；但首先应該讓广大群众多快好省地掌握文字。这两者之間并无矛盾，更不应該把它对立起来。少数民族群众掌握了文字将能更好地提高文化，也更便于学習汉語汉文。（当然，有条件通过汉字或汉語拼音方案直接学習汉語汉文的，应該在民族自愿自擇的基础上坚决地貫徹本民族关于选擇文字的决定，那不在我們論述的范圍之內。）怎样对学習汉語汉文有利，不能單純从拼法上是否标調看問題。汉語拼音方案是为汉字注音、帮助推广汉語普通話的有力工具，但还不是拼音的汉文。将来汉語拼音文字的标調問題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在尽可能靠攏汉語的原則下把自己語言中的汉語借詞肯定下来，并在借詞的語音上尽量向普通話靠攏，就为本民族語言的發展和学習汉語文創造了有利的条件，不能認为在借詞的拼法上比現在的汉語拼音方案多几个調号，就算是跟尽可能靠攏汉語的原則有什么出入。我們希望从事民族語文工作的同志們大家都來参加有关这一問題的討論。

少数民族文字中借詞的語音标准和标調問題

馬学良　王　均

語言的借用是任何語言里常有的現象，也是每个民族使自己的語言不断丰富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隨着社会的發展，新的事物和新的概念不断涌現，需要用新的語詞來表达这些新的概念。一个民族在跟其他民族交际的过程中，从对方获得一些新概念，吸收进一些借詞來充实自己的詞汇，这是很自然的現象，也是符合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以我国的情况來說，我国的少数民族过去長期以来就和汉族有經常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在共同生活和共同斗爭中互相学習語言，借用詞汇，各民族的語言在互相影响和互相吸收、丰富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發展。例如在朝鮮語和白語等民族語言里，汉語借詞早就达到了全部詞汇的一半以上。借詞并沒有使这些民族語言的特点受到任何損害，相反地，却使其語言具有更丰富的生命力，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的發展。解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各民族团結合作，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經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出現了嶄新的面貌；尤其是从去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这种民族間大团結大协作的进一步的發展更促进了語言的發展和互相丰富，每个民族語言中的汉語借詞都大大地增加了。由于大量吸收借詞，在少数民族文字中产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本文准备就有关少数民族文字中借詞正字法的两个問題——借詞的語音标准和标調問題，提出我們的一些初步看法，来和大家一同研究。

借詞的語音标准問題

毫无疑問，考虑民族文字中有关借詞正字法的語音标准問題的出發点应該以有利于祖国的統一和民族团結，有利于本民族社会主义經济文化的發展繁荣为前提。从这样的前提出發，在借用汉語詞汇的时候，就应該以音譯为主，并采取尽可能与汉語普通話相靠攏的形式拼写。这一原則是大家同意的，也符合各族人民的要求与意愿。但是目前在各民族地区，普通話一般还沒有普遍推广，还沒有为各族人民所掌握；少数民族口語中的汉語借詞一般还是根据当地汉語方言借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該怎样来解决文字中借詞的拼写問題呢？

我們知道，少数民族語言中的汉語借詞，往往因借入的时代不同而分做好几"層"：有老借詞，有新借詞，老借詞又因借入时代的先后不同而有語音的差別。僮語"分成几份"的"份"是pɐn^{1}*，"一分錢""一分[illegible]""一分重"的"分"是fɐn^{1}，"分会"的"分"是fɐn^{6}；pɐn^{1}和fɐn^{1}都是老借詞，pɐn^{1}比fɐn^{1}借入的时代早。[illegible]借詞一般都适应了本民族語言体系的規則和規范，[illegible]方說，它的声韵母和声調系統在各地方音中的表現[illegible]往都跟本民族詞一样，跟本民族詞的語音变化对应[illegible]律相合。新借詞則情况比較复杂：它們未必都适应[illegible]本民族固有的語言規范，比方說，可能增加了若干新[illegible]音位，它們在各地的讀法也未必能符合各地語音对[illegible]規律，等等。这些新借詞，有一些已經被群众掌握，[illegible]为日常說話不可缺少的基本常用詞，有的还不够穩定[illegible]例如青年跟老年，社会活动积極分子跟一般群众，由[illegible]他們的汉語水平不同，在發音上、用詞上都可能有些[illegible]同。显然，那些老借詞已經跟本民族"固有的"語詞[illegible]有什么分別了，在文字上自应跟本族語詞同样处理[illegible]借詞因为有以上种种复杂的現象，应該根据具体的[illegible]况分別处理。我們認为，在处理这些問題的时候，应[illegible]既有整体观点，从联系和發展中看問題，又得有群众[illegible]点，尊重群众口語中的客观事实。关于新借詞的拼[illegible]問題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当地汉語方言屬于官話区即普通[illegible]系統，本民族語音系統跟汉語音系沒有太大的分歧，[illegible]本民族群众中已有不少人学会或兼通汉語的，这就[illegible]該尽可能根据汉語拼音方案用普通話的語音来拼写[illegible]借詞。尽管当地方音未必能和普通話标准音相吻合，[illegible]例如西南官話往往把卷舌音声母 zh、ch、sh 并入舌[illegible]音声母 z、c、s，鼻音韵尾的韵母 in、ing 不分，en、en[illegible]不分，等等，估計兄弟民族学習一些新借詞的拼写[illegible]式，不会比当地汉族学習普通話更感困难，因为少数[illegible]族已經熟習自己民族文字的拼音方法，这些文字的[illegible]法和讀法跟汉語拼音方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固然，[illegible]起初也許免不了要記誦一些跟当前口語不尽相合的[illegible]的拼法，但是学習一种文字，总难免有一些字是需要[illegible]

* 本文所举少数民族語言例字注音右上角的阿拉伯数[illegible]是指調类，不是調值，以下同此——編者注。

記忆来掌握的；对这一部分新借詞下一番工夫，按它們的普通話讀音来拼讀，能够帮助兄弟民族更好地掌握汉語文。少数民族普遍都有学習汉語文的愿望，他們將乐于采用这样的办法。比如苗族和侗族文字中的汉語新借詞就是按这样的原則拼写的。經过試驗教学，一般反映效果是好的，到目前为止，还沒有听到由于文字中汉語新借詞按汉語拼音方案的拼写而行不通的反映；只是有些地区反映，汉語借詞不标調，不知道該怎么讀。

第二种情况是当地汉語方言虽屬普通話系統，但本民族語音系統跟汉語相差較远，目前群众兼通汉語的还相当少，普通話中有相当多的音是本民族群众目前很难發出的。为了不过分加重群众学習文字的担負，使群众很快地掌握本民族的文字，也可以在尽可能靠普通話的精神下参照本民族的發音習慣和語音結构規律做适当的处理，而不要求一下子完全按照汉語拼音方案的拼法来拼写。应該考虑到，脫离現实地完全不管某一民族語言的特征及其發展的內在規律，过于性急地强調一致，忽視文字正字法的統一原則，就会影响拼写的正确性，給文字的学習和掌握带来困难。因此，正确估計每一民族語言的具体情况，包括它的現况及其發展前途，来建立这一文字的正字原則，值得我們很好地重視。例如，僮語的語音系統和汉語音系差別較大，它除南部方言以外，一般沒有送气音声母，汉語借詞的声母 p、t、k、c，在僮語里（北部方言）分別和 b、d、g、z 合并了，同时它又沒有 j、q、x、zh、ch、sh、r 等声母（僮語本民族詞的 r 和汉語的 r 讀法不同），也沒有元音 ü，如果僮文中的汉語借詞一律按汉語拼音方案来拼写，則大部分的借詞都将跟僮族人民群众的口語脫节，必須逐字拼記才能掌握。如果为拼写借詞，突然一下增加十多个新音位，是会增加学習僮文的困难的。

又如彝語支的許多語言，一般都是單元音韵母，沒有鼻尾韵的音节；对于那些不是普遍兼通汉語的地区来說，如果規定一律按照汉語普通話来拼写借詞，也是有困难的。例如，云南哈尼族曾經采用北京音拼写借詞，結果群众不会發鼻尾韵，也記不住哪些字該加鼻音韵尾，于是許多不該加鼻音韵尾的也加上了，終于在教学中發生困难，不得不采取两步走的办法：除政治术語和重要的專用名詞按普通話拼写外，一般借詞仍按本民族当前的实际讀音来拼写。自然，必須同时指出：过分地强調民族語言的特点，完全被本民族的語音結构型式束縛住，也是不对的。例如，彝語支的一些語言，"中国"和"中共"常常都念成一样，假如把它們都拼成 zhogo，当然是不妥当的，文字里的拼写法，从原則上講，应該能不依靠上下文独立地表达意义；彝語支的汉語借詞如果完全按照本民族的讀音拼写，就做不到这一点。况且，語言的音位系統和音节結构規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許多語言都已發生了并且还正在繼續發生变化。在确定拼写法的标准的时候，固然不能忽視語言本身的特征，同时也有必要考虑到民族語言和文化發展的長远利益。一个民族文字的拼写法，在一定的程度上作一些合理的加工应該是可以的。

第三种情况是当地汉語方言屬于非官話区，跟普通話語音相差很远，如海南島黎族地区的汉語方言是屬于閩南方言的海南話，民族文字中借詞拼写法的处理就要看普通話在当地推广的程度如何。应該辯証地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目前的語言环境和它的發展趋势：超越現实固然"欲速則不达"，看不見發展也会使我們走弯路。民族語文工作（包括其中借詞的处理問題）必須按照語言的具体情况，既落实，又跃进。如果本民族人民对当地汉語方言和汉語普通話熟悉掌握的情况不是相差很远，或是二者对他們來講都是新的，而汉語普通話有可能較快地推广的話，无疑地，按普通話标准音来拼写是正确的。如果有一批借詞已按当地汉語方言借入，并在群众的口头活跃地使用着，則这一批借詞既已在群众口語里巩固下来，也就和本民族的語詞沒有分別了；这一部分借詞除政治术語和一些全国通用的人地名的拼法外，未尝不可按本民族实际讀音拼写。要末一律按本民族或当地汉語讀音拼写，要末一律依照汉語普通話，这种机械的千篇一律的做法，对于某些民族來說，也許是可行的，对于另一些民族就未必完全行得通了。重要的是应該考虑語言的丰富、發展，以及如何在当前的条件与可能下帮助少数民族迅速提高文化，至于某些詞的讀法和拼法，虽然不容忽視，却不是不可变易的根本性的問題。比如僮語里过去从汉語吸收了一个老借詞"办法"：$pa:n^6fa:p^7$，后来普通話的势力扩展了，又按普通話吸收了一个 $pa:n^6fa^2$，后者正在逐步替換前者。少数民族語言中新借詞代替了老借詞或者和老借詞并存并用的例子很多，但并不造成混乱。又如汉文里过去由于翻譯家的方言習慣，比方林紓（閩南人）把法国文学家 Hugo 譯做"嚣俄"，后来又有人依普通話改譯做"雨果"，"雨果"即"嚣俄"，并沒有引起多大問題。另一方面的例子如印度的 Bombay 譯做"孟买"，法国文学家 Dumas 譯做"仲馬"，从普通話的語音来看，明明欠妥，由于習用已久，也就沿用不改了。但是可以設想，如果将来汉字改用拼音文字，而这一类人地名的拼法要按原文讀音拼写的話，大概也未必会引起多大的困难。

总之，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在确定借詞拼写的語音标准和正字原則的时候，必須首先按照党的民族政策的精神，坚持有利于祖国統一和民族团結、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和各民族共同發展繁荣的原則，必須政治挂

帅，从实际出發，使民族文字能多快好省地为少数民族經济文化建設服务。应該指出，社会科学特別是政治方面的新詞术語，一般都是汉語借詞，对于这些借詞必須分外严肃对待。尤其是党的方針政策和指示决議中的一些新詞术語，它是各民族人民共同使用的語言，更应該尽可能求其与汉語普通話达到最大限度的一致，因为它和党的方針政策的正确貫徹执行是有直接关系的。

借詞的标調問題

这个問題主要是跟汉藏語系諸語言的民族文字拼写法有关。

过去許多民族的文字方案曾規定汉語新借詞一律不标調号。这是由于：1)新借詞的声調同老借詞或本民族詞的声調有一个主要的不同处：老借詞或本民族詞尽管各地調值不同，但同一个字在各地的調类是一致的；新借詞則由于各地都按当地汉語現代讀音吸收，所以調值能基本上相同或相近，但同一調值在各地未必能是同調类，因此同一个字在各地調类不一。以僮語借詞为例：

老借詞：

汉字	武鳴	来宾	宜山	龙津
金	kim^{1}˨˦	kim^{1}˧˥	kim^{1}˦˨	kim^{1}˧
銀	ŋɐn^{2}˧˩	ŋɐn^{2}˨˩	ŋɐn^{2}˨˦	ŋɐn^{2}˧˩
海	ha:i^{3}˥	ha:i^{3}˧	ha:i^{3}˧˨	ha:i^{3}˨˦
馬	ma^{4}˦˨	ma^{4}˩˧	ma^{4}˧	ma^{4}˦˨

（由上例可見：各地老借詞調值不同，調类相同。）

新借詞：

汉字	武鳴	来宾	宜山	龙津
中	ɕuŋ^{6}˧	tsuŋ^{3}˧	suŋ^{5}˧	tɕuŋ^{1}˧
华	wa^{2}˧˩	wa^{2}˧˩	fa^{6}˩	wa^{2}˧˩
水	ɕɐi^{3}˥	sei^{1}˧˥	swɐi^{3}˦˨	ɬɐi^{5}˦˨
利	li^{5}˧˥	li^{4}˩˧	li^{4}˨˩	li^{3}˩˧

（上例說明各地新借詞調值相同或相近，調类不同。）

这样，本民族詞和老借詞标上調类，各地群众可以按标准音来学习它，也可以通过語音对应規律按自己的方言土語去学習掌握它；新借詞如果依标准音来标調，在不同的方言土語区要不是掌握了标准音的讀法，就可能产生混乱。这种情况不独僮語里有，在其它許多語言里也都同样地存在。2)我国許多民族文字都采用字母标調，而汉語拼音方案則不采用字母标調法；如果在少数民族文字中新借詞也象本民族詞和老借詞一样用字母标調，就不能和汉語拼音方案的拼写形式一致。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規定新借詞一律不标調号。

但是这样做的結果，又产生了一些問題。第一，讀音上的困难：有声調的語言每一个音节都必然和一个声調相結合。現在有一部分詞不标調号，据实驗的結果，群众往往不知道該按哪个調来讀。有的文字(如
文)同时規定了第一調不标調号，于是群众看到不标
的詞就都念第一調，結果又不对。第二，理解上的困
新借詞由于不标調号，有时离开上下文，就不知道它
意义。第三，辨詞上的困难：有一些語詞，在汉語里
非同音詞，由于借詞不标調，吸收进少数民族語以后
文字上仿佛就成了同音詞，如“同志”和“統治”。“民
和“民主”（西南官話 z、zh 不分）；如果說有对立的
調，群众又不知道哪些个詞有对立，哪些个詞沒有，
果还得死記。第四，掌握标准的困难：規定新借詞
标調，但是群众未必能分辨自己嘴里哪些詞是本民
詞或“老借詞”，哪些是“新借詞”。有些甚至于連語文
作者也沒有把握，如僮語的“和平”，无論按老借或新
的讀音都該是 ho^{2}piŋ^{2}，要不要标調？問題就不容易
决。第五，一部分詞标調，一部分不标，在新借詞和
民族詞与老借詞之間划下了一道鴻沟。鴻沟的存在
能在吸收借詞时使人有“外来”之感，在吸收以后不
和本族語詞融为一体，成为該語言詞汇的有机部分。

上述种种情况，多数是本来估計到的，但当时
到，少数民族語言中的新借詞絕大多数是多音詞，
詞中对立混淆的情况是不多的；汉語拼音文字如果
不标声調（这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假設如此），为什么
族文字中就非标不可呢？更何况标上声調，各土語
又調类不一，深恐反而造成混乱。現在根据各地文
教学的經驗，不少人反映，除非一些最常見的詞，如
民”“共产党”“社会主义”，等等，一般的詞不标声調
讀和写上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你說“社会主义”“公
“社員”不标調，單音节的“社”字标不标呢？如果單
节的“社”字要标，跟它密切相关的“合作社”“公社”
員”等詞里的“社”要不要和标調的“社”字取得詞形
法上的一致？

看来服从民族文字正字法統一的原則对于文字
学習和掌握是有利的，这一点不容忽視。我国新創
字的少数民族都在普遍調查方言的基础上为創立文
和建立民族标准語选定了基础方言和标准音，为了
进少数民族方言土語的集中为民族共同語，使少数
族标准語加速形成、發展，少数民族学習文字是应該
習它的标准音的。如果新借詞必得要标調，当然只
按标准音的調类来标。广西僮族自治区在《僮文报
把全部語詞（包括新借詞）都按本民族統一的原則标
調号，作为一种試驗，讀者的反映一般都表示滿意，
一經驗值得我們重視。

有人会說，新借詞也都标調，跟尽可能靠攏汉語

（下轉 215 頁）

試談僮語語法中的新詞序

曹广衢

很久以来，僮語語法虽然表現得很稳固；但是同其他語言一样，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就是想以僮語里修飾关系的次序問題来論証語法的变化和發展的。①

僮語里有修飾关系的詞或詞組，各成分之間的次序，有这样两种：

被修飾成分＋修飾成分（以下簡称僮式）

修飾成分＋被修飾成分（以下簡称汉式）

几千年来的汉語都用的是这样格式：

長衫	紅花	木魚

可是僮語固有的次序却是：

bwɜrəiɛ	*bɯnda*	*vadiŋ*
（衣長）	（毛眼）	（花紅）

不过現代的僮語也出現了大批和汉語次序相同的詞，例如：

Huŋɿgiɿ Yinɿminɿguŋɛse5	紅旗人民公社
Se5vei5cuɛyi5 gəɿmiŋ5	社会主义革命
lieŋɿsiɿ canɛlieŋ5	粮食产量

下面我們利用僮語各方言土語的材料，探討僮語中汉式詞起源和發展的痕迹，并且說明它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一

要是拿Z代表僮語固有的語言成分，拿H代表借詞的語言成分，那末所有修飾关系的詞可以分为四个类型：(1)ZZ；(2)ZH；(3)HZ；(4)HH。現在依次来說明一下。

(1) ZZ

这是为数最多的一个类型，例如：

rəm4da	眼泪	*naɜmo5*	陌生	*bjəkhau*	白菜
noɜ vaiɿ	牛肉	*bakdou*	門口	*gen buɜ*	衣袖
ca4fɯnɿ	柴刀	*mənɿfəi4*	木磬	*naɿfɯɿ*	荒田

都用僮式，沒有例外。

(2) ZH

*bu*ɜhau5	孝服	*hau4*bieg	白米
*bjək*dəŋɿhau	茼蒿菜	*ɓəɯ*caɿ	茶叶
*meɜ*moiɿ	媒婆	*bou4*sai	师公
*bəŋ*ɿsɯlin	士林布	*rθg*vameiɿ	画眉鳥

也是用僮式；但是我們發現有个别的詞采用汉式，下面是例外：

*rəm4*ŋənɿ	水銀	*rin*banɜ	石板	*dieg*gyai5	地界

(3) HZ

这一类型的詞比（1）（2）两类型少得多，例如：

do*ɯvenɜ*	挂圖	hai*ɿnəŋ*	皮鞋
mauɜ*diem4*	草帽	dəiɜ*buɜ*	衣袋

这类也是用僮式。

(4) HH

这一类型是本文討論的重点。它还可以細分为两小类。

1. 用僮式的，例如：

cienɿleiɜ	利錢	cieŋɿsiŋɿ	城牆	səɯgiŋ	經書
gieŋma4	馬繮	səɯ miŋɜ	八字	gən hau5	孝巾
diŋdiet	鉄釘	mauɜlieŋɿ	凉帽	caŋhaiɿ	鞋匠
hauɿdeŋɿ	銅号	dəiɜsən5	信袋	buənɿcaŋb	秤盘

2. 用汉式的，例如：

gaŋdiuɿ	鋼条	gθŋ səiɜ	公事	dθŋ səɯ	通書
ŋənɿ baiɿ	銀牌	cau5 vueŋɿ	灶王	madbou5	抹布
lieŋɿ fənɜ	凉粉	dəŋcauɜ	灯草	cienɿdan	傳單
lieŋɜ va4	亮瓦	heŋɿdiuɿ	桁条	sieŋ5dəiɛ	相底

这两式的例子，几乎各占一半。③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較早的僮語，HH采用与汉語相同的次序，已开始萌芽，但不稳固。不过有以下的語言事实表明，它已有压倒僮式的趋势。

僮語里的同义詞要是其中有一个是 ZH 或 HZ，另一个就是 HH 汉，只有極个別的例子才是 HH。僮現在举例如下：

		HH 汉	HH 僮	
ZH	*lθŋ4*sən5	san5sieŋ		信箱
	*mid*dəi5	dəi5dau		剃刀
	*dieg*biŋɿ	biŋɿdeiɜ		平地
	*dɯen*nyinɜ	nyinɜnyied		閏月
	*da*cəŋɜ		siŋcəŋɿ	秤星
HZ	sim*hamɿ*	damsim		貪心
	sim*mauɿ*			
	hai*ɿrəm4*	siɜhaiɿ		水鞋
	hanɜ*heu*	leŋ4hanɜ		冷汗
	gieŋhenɜ	vueŋɿgieŋ		黃姜

① 这里所說的修飾关系是指被修飾成分是名詞性的，修飾成分是名詞性的、形容詞性的或动詞性的。

② 这种統計是不够科学的，这里只是說明它們的比重差不多，而不是要求准确的数字。

最富于啓發性的一个例子是 yienъ (县) 和 yen5 (县)。从声調来看，前者是較早的借詞，后者是較晚的借詞。它們作被修飾成分时，次序也不同。較早的 yienъ 只能构成 "HH僮"，例如:

Yienъ Vuзmiŋɩ　　武鳴县

yienъ 只能构成 HH 汉，例如:

Vuзmiŋɩ Yen5　　武鳴县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領导下，僮族人民同国内各族人民一样，获得了空前的团結，政治、經济和文化建設事业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通过对新事物新知識的接触，通过各項政治运动和学習，僮語里吸收了大量汉語新詞，例如:

Myauɩcuɩ se5yenɩ	苗族社員
se5vei5cuзyi5 cuŋзlu5sen5	社会主义总路綫
guŋъnuŋɩyeɩ cuŋзcanзciɩ	工农业总产值
Yen5veiз Ban5guŋъsiɩ	县委办公室
Yiɩsanъ dai5byauз	宜山代表
sɯ5ci5giъ daŋзvei5	自治区党委党
daŋзvei5 suъgi5	党委書記
dai5byauз vei5yi5	代表会議
ciɩgiɩ fɯn5sɯз	积極分子
senъcin5 danъvei5	先进單位

这些新詞是不胜枚举的。不过，从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例子来看，满可以說明这样一条規律: HH 都已采用汉式，而不再采用僮式了。

对于 HH 來說，僮汉两式并存的現象維持了一段时期，到現在汉式已超过了僮式。汉式發展了，巩固了，并且將繼續發展下去，巩固下去。

	僮	汉
ZZ	最多	
ZH	多	
HZ	少	
HH	早½	晚½ (优势)

綜合这一节所說的，我們可以列出如左的一个簡明表，并得出以下一些結論:

1) 僮式作为僮語的特点，而跟别的語言 (如汉語) 区别开来的这条基本規律，一方面表現得極为稳固，另一方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2) 新的語法規律的产生和發展，如同整个語言的發展和变化一样，"不是經过爆發，不是經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式，而是經过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构的要素的积累，經过旧質要素的逐漸衰亡来实現的"。①

3) "HH 汉"在較早时期就已萌芽，到現在才肯定下来，并且将会繼續發展和巩固。

4) 僮汉两式并存，不但沒有給僮語的基本語法規律带来了混乱，改变了僮語的特点，相反地，它們有严整的規律，ZZ, ZH, HZ 三式用僮式，HH 用汉式，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僮語的基本語法規律。

5) 語法的發展和社会的發展一样，有它内部的發展規律，任何个人的主观願望都不能叫它改变。

二

这里我們再討論一下僮文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

僮文的推行工作和編譯研究工作，几年来在党的領导下，同国内其他民族語文工作一样，获得了不少成績，取得了不少的經驗。但是在一些知識分子当中，特别是在一些僮文工作同志当中，却出現了脫离群众、脫离实际、强調民族語言"純潔性"的偏向和錯誤，不按着語法發展的規律进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民族标准語的丰富和發展。1958 年 3 月由中国科学院与中央民族事务委員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少数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上，对上述这些資产阶級思想提出批判后，僮文工作因而也得到了很大的进展: 廢除了三千多个杜撰的新詞术語，改用汉語借詞；改动了一些詞的写法，如"陝西省"，以前写做 "Seŋз Senз…"，現在写做"Senзşiъ Seŋз"，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詞写法的改动，似乎是为改动而改动，并沒有找到可靠的理論依据，因为在改动的同时，还重复地出現了同过去同样性質的錯誤，下面是 1959 年 3 月分僮文报上的一些例子:

hagseŋ	giɩsuɩ	yoɩyau5	(技术学校学生)
学生	技术	学校	
meъбɯk		iŋyuŋɩ	(女英雄)
女		英雄	
Bou4cueŋъ		guŋъyɯnɩ	(僮族工人)
僮族		工人	
səɯcueŋъ		lau4səi	(僮文老师)
僮文		老师	

因此，为了使今后僮文工作得到进一步發展，有必要用一些过去和目前的例子，就我們的一些粗浅認識，分析产生这种偏向和錯誤的历史根源，請同志們，特别是僮文工作的同志們批評和指正。

僮汉两式的結构規律，一般地說，在僮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語中是很健康地在發展着。可是有部分同志不承認这一語言事实。他們主張只有按照于僮語語法基本規律去处理，"才能使我們的标准語得到健康的發展，不致受到歪曲，不会發生紊乱，而能很好地表达僮族人民的思想情感和使人們容易理解。僮語語法是僮語本質特征之一，它是最稳固的語言因素，不按照僮語的基本規律来發展僮語，不但是錯誤，而且是不可…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頁。

的”。①

正因为有这些不正确的指导思想支配，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有以下这些缺点或錯誤。

(1) 类型相同的詞，而处理不同。

以下这些詞，口語里都同汉語的次序相同，可是書面語言里，过去有的要写成僮式，有的要写成汉式：

doiъ sien fuŋ 先鋒队
Nuŋnese Siŋ5li5 胜利农业社
Yinmin—Gvaŋbo—Dendai Gueŋsai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Siusi Namniŋƨ Sinvase 新华社南宁消息
Govuyen Cuŋva—Yinmin—Guŋhogo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Cuŋjaŋ—Veijenvei Cuŋgo Guŋcanda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

(以上是僮式)

Cuŋjaŋ—jinmin—Ciŋ fu	中央人民政府
sinmincucuji—gəmiŋ	新民主主义革命
gaugi—nuŋnese	高級农业社
nuŋne—mofan	农业模范
doncibu—veijien	团支部委員
sinjuŋ—hocose	信用合作社
gəmiŋ—ganbu	革命干部
nuŋne—gigaiva	农业机械化
guŋŋan—gi'gvan	公安机关

(以上是汉式)

他們認为“社务委員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改造”等詞，可以在当中加短横作为一个不加分析的整体借入。写做“sevu-veiyenvei”，“Cuŋva—Yinmin—Guŋhogo”，“seveicuyi—gaicau”。凡按本民族基本語法規律排列，經分析解釋群众便能接受的，仍按僮語基本詞序排列。如“中国人民”应写做“Yinmin Cuŋgo”。②

目前还写作僮式的，例如：

hagseŋ giƨsuƨ yoƨyauƨ (技术学校學生)
學生 技术 学校
goƨmiŋ5 yuunƨminƨ (人民革命)
革命 人民

上列这些例子中采用僮式的，当中加短横也好，当中不带短横也好，僮族广大群众說話中都是汉式，可是一到僮文工作者編著的書刊上就出現了僮式，因此分析解釋都是規律以外的分析解釋，群众当然沒法接受。

这样做，不但群众覺得难学，就連僮文工作者也覺得沒有規律可尋，不好掌握。“国歌”写作“goguek”，“国族”却写做“guek geiƨ”。就是一个很好的証明。此外，在最近的僮文报上，也有把 HZ 錯誤地写作汉式的，如“iŋyuŋƨ meƨбшk”，写作„meƨбшk iŋyuŋƨ”。例子很多，不再一一討論了。

(2) 不同类型的詞，却用类推法。

“我家|在|武鳴县|灵源乡|西門村”这句話，口語里都說成 *Ranƨ gou*|*jou5*|Uзmiŋƨ jen5|Liŋəjenƨ jaŋъ|*бan*з Saimonƨ”（家我|在|武鳴县|灵源乡|村西門）。可是有些同志認为：“村名的詞序是僮語語法的基本形式，而县名和乡名的詞序又按照汉語排列，造成了語法上的混乱。”③“我們又全按僮語語法的基本形式排列，把它譯成 *Ranƨ gou*|*jou5*|*бan*з Saimonƨ|jaŋъ Liŋƨjen|jienъ Uзmiŋƨ。”④

“*бan*з saimonƨ”是 ZH，要用僮式，“Liŋƨjenƨ jaŋъ”是 HH，要采用汉式，怎能用前者来类推后者呢？因此現在書面語言采用同口語一致的写法，这是符合客观語言規律的，例如：

Liuзcouъ Giъ 柳州区
Gvaŋзsiъ Sɯ5ci5giъ Denƨyaŋƨ Yen5 广西自治区田阳县

(3) 重迭名詞修飾語的处理，也沒有根据。重迭名詞修飾語，如“楊祖露|是个|勤劳的|老实的|汉族农民。”在僮語里，这样的句子是少見的。可是有些同志，他們一方面承認：“僮族人民的口語中，在一句話里用两个以上的重迭修飾語共同修飾一个名詞的表达方式比較少，遇着比較复杂的概念，一般是用几句話去表达的。”⑤ 另一方面又主張按僮語語法的基本形式，“由小到大”的次序排列。如上面所列举的“*Ranƨ gou*|*jou5*|*бan*з saimonƨ|jaŋъ Liŋƨjenƨ|jienъ Uзmiŋƨ”。由于这一标准沒有实际語言基础，因此連他們自己都不能掌握，出現了矛盾。如“1949年10月1日”到現在都要写成“*bi* 1949|*dшen* 10|ŋonƨ 1 hauъ”，不能写成“ŋonƨ 1 hauъ|*dшen* 10|*bi* 1949”。

总之，僮語受汉語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由于以往僮族沒有文字，汉語影响了僮族語言（因为适合僮語本身的需要）；但是，語言習慣是历史因素占着主要的地位，語言習慣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过来的。書面語言要是不按口語的基本規律来發展，不但是錯誤，而且是不可能的。

本文引用例詞出处：«僮汉詞汇»（初稿）；«僮語語法概述»；«Fшen Cueŋъ»（僮族山歌）；«Səшhagciъ Vunƨguъnaƨ»（农民識字課本）；«Səшson Ganbu»（干部課本）；«Bau5 Səшcueŋъ»（僮文报）；«僮文工作参考資料»第一輯；«僮語常用詞汇簡編»（初稿）。

---

① 广西省僮文工作委員会編：«僮文工作参考資料»第一輯，145頁。

② 参看«僮汉詞汇»（初稿），附录，6—7頁。

③④⑤ 广西省僮文工作委員会編：«僮文工作参考資料»第一輯，146—147頁。

論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語

周定一

在我国当代的著名作家里面，周立波同志爱在作品里使用方言土語是有代表性的。我們有些作家很爱使用方言，例如梁斌同志的《紅旗譜》就用了許多冀中一带的方言，可是比起周立波同志的《暴風驟雨》用东北方言和《山乡巨变》用湖南方言来，它还不算是頂突出的。

周立波同志非但在他的長篇巨著里表現了这种語言上的特殊風格，而且在許多描写农村的短篇作品里也是这样，例如《周立波选集》①的《盖滿爹》《腊妹子》等篇，就用了許許多多似乎是湖南北部的方言。

周立波同志不止一次地談論过这問題。有些人該还記得，1951年《文艺报》曾經有过一場“关于方言問題”的辯論，②在这場辯論里他提出过鮮明的主張：

> 我認为我們在創作中应該繼續的大量的采用各地的方言，繼續的大量的使用地方性的土話。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潑的，适宜于表現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話，我們的創作就不会精彩。…③

1952年周立波同志又談到：

> 語言是文学表达的手段，作家要精通祖国的語言，要善于运用語言来精确地反映客观的事物，要写啥象啥。写农民的对話，就得用农民的口語，要不写不象…④

这是周立波同志在語言問題上的理論，而且是堅决地長期地貫徹到創作实踐中去的。

“要写啥象啥”，这是个創作原則，單就这个原則来說，大約不会有人反对；但是这句話若是跟語言問題合在一起来談，大家的理解就会有些出入。比如說，“写农民的对話”，是不是一定得用“地方性的土話”，才算“写啥象啥”，才“适宜于表現实际生活”呢？

假若我們理解“农民的口語”不被“地方性的土話”这一涵义限制住的話，而是指的能够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内容的用語，反映农民的阶級特点和个人特点的用語，那末，許多地方就不一定非用方言土語不可；因为农民的实际生活不会跟方言平行，不会因为方言差别到什么程度，生活也差别到什么程度。写湖南农村，为了表現地方特色，用上“扮桶”“茶子”“擦菜子”这样的一些名称，以至“竹脑壳、燉猪脚，两魯碗、三蒸鉢”这样的一些諺語，这是适宜的，因为这些說法很难用普通話的詞句去代替（“茶子”在报刊上多半写成“油茶”，不知是什么地方的話。“魯碗”也許可以用“海碗”代替）。可是，表示“騙”就不一定要用“詒試”，“为什么”不一定要用“何解”，“常常”不一定要用“流水”，因为普通話里可以找到完全相当的詞。不能認为“詒試”等等才足以表現农民的实际生活，而“騙”等等却不能表示。这是对于用“农民的口語”表示“实际生活”的一种理解。

另一种理解是，用周立波同志更明显的話来說，就是，“写对話时，書中人物是哪里人，就用哪里的話，这样才能够傳神”。⑤那末，“扮桶”等等固然必要，“詒試”等等也不能缺少。

持前一种意見的可以举老舍先生为代表，他說过：

> 我将尽量地选用普通話的詞汇，不故意卖弄土話。我应当把卖弄自己改为替群众服务。假若“油条”比“油炸鬼”更普通一些，我就用“油条”。同样的，假若“犄角”比“嘎栏兒”更普通，我就用“犄角”。地方色彩并不仗着几个方言中的詞汇支持着。不深入一个地方的生活，而只用几个地方的特殊字眼兒，如“油炸鬼”和“嘎栏兒”之类去支持，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它們适足以增加語言的混乱与紛歧。⑥

此外，侯宝林先生的話也有代表性。⑦大家都爱听他的相声，并不因为他在相声里很少用北京的土話而感到不“傳神”。

持后一种意見的除了周立波同志，还可以举王西彦同志为代表。他說：

> 描写农民生活和斗爭的作品，当然应該采用农民的語言，这样才能写得具体生动，能够准确地表現农村生活，表达农民的思想感情…⑧

---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

② 見《文艺报》第3卷的第10、12等期。

③ 同上，10期，16頁。

④ 《“暴風驟雨”創作經过》，原載1952年4月18日《中国青年报》，轉引自《作家談創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第1版，10頁。

⑤ 周立波：《方言問題》，見《文艺报》第3卷，第10期，37頁。

⑥ 老舍：《大力推广普通話》，見《人民日报》，1955年10月31日。

⑦ 侯宝林：《在汉語規范化运动中作一个勇敢的有心的宣傳員》，見《现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文件汇編》，170頁。

⑧ 王西彦：《讀“山乡巨变”》，見《人民文学》，1958年月号。

他所說的"农民的語言"就是方言土語，称許"立波同志一向很重視这一点，在《暴風驟雨》里，就大量地使用了东北地区的方言土語"。

此外，方明、楊昭敏两同志也認为：

> 群众的語言，多数是通过方言土語的形式表現出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把方言土語完全翻成普通話，就失去了色彩。小說并不是推行普通話的課本。①

文艺作品里的方言問題本来是个老問題，从"五四"时期以来，就有过大大小小的爭論；但是直到現在，大家对这問題显然还存在許多互不相同的看法，从而体現在創作的实踐里。为了求得大家的認識互相接近，看来还有必要再討論一下这个問題。

方言和普通話之間沒有一条絕对的鴻沟，可是大致总有个界限。能叫一般人都听得懂、看得懂的詞句是普通話，只限于某一地区的人能懂的是方言，这就是大致的界限。对某些具体的詞句一定会有些爭执，你認为是普通話，他却認为是方言。但是这不会妨碍我們討論問題，因为大家总不会認为"羊肉床子"(牛羊肉店)"老爷兒"（太阳)等等是普通話，也不会認为"搞""扯皮"等等还是方言。只要我們不在方言与普通話的"边緣地带"一味糾纏就便于討論問題。当然，我們也碰到过这样的一些看法：一种是，把普通話的涵义扩大到包括全部"官話"，从东北到西南，"官話"的全部詞汇都認为屬于普通話。另一种是，把普通話死死限制在一个狹小的框子里，而且門禁森严，非但不允許任何方言語詞进来担当必要的語言职务，而且把那些方言色彩本来已趋淡薄的語詞也加以排斥，庸俗地理解"为祖国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奋斗"这句話的意义。

前一种看法是在語言問題上的自然主义，后一种看法有人称之为在方言問題上的"学究的态度"，②都不利于問題的討論，我們必須把它們撇开。

我們首先要問：是否要用方言土語才能傳神，才能达到文学上的眞实境界呢？

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的家乡話里有些說法很难在普通話或別的方言里（普通話也是在方言基础上發展而成的)找到恰好相等的說法，云南的"餌塊"，广东的"艇子粥"，北京的"老头兒乐"，都沒有法子改成"年糕""蕓粥""厚棉鞋"什么的，因为那是那，这是这，东西并不一样。其实"餌塊"之类的"方物"名称，并非严格意义的方言，因为在普通話里找不到相对的說法。要牵涉到这个地区特有的"方物"，为了"傳神"，就只能用这个地区的特有的名称，加上注解說明一下。我想这样做讀者是会同意的。除了这样的一些"方物"名称，流行在一定地区的諺語、民謠，因受方言性質的限制（特殊涵义、音节、押韵，等等)，要完全改为普通話有时也很为难；可是也并非絕对不能更动。《詩經》包括广大地区的民歌，而方言色彩并不濃厚，恐怕許多詩是編纂者用当时的"雅語"加工过的。汉魏"乐府"，六朝民歌，也都类似《詩經》的情况。去年以来，反映大跃进雄偉气势和輝煌成績的民歌成千成万首产生，而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就詞汇而論，这些农村詩歌很少方言土語的成分，然而也足以傳神。可見"風謠"一类的作品并不一定要固定在方言的形式上，創作者或引用者都可以給語言适当地加工，不过，怎样掌握分寸，不露斧凿，旣能委曲尽情，又要形式优美，确实不是很簡單的問題。这就需要艺术的匠心去着意經营了。

假若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关系完全是平行的，方言有个什么說法，在普通話里也一定有个意思相等的說法，問題就簡單得很，只要一对一地把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就行了。可是事实上語言与語言之間，方言与方言之間在詞义上的关系总是錯綜复杂的。北京的"mōgu"，不等于普通話的"麻煩"，或"搗乱"，或"糾纏"，而是隨文生义，包括了普通話的这些意思。普通話的"蘿卜"，在福州話里只指紅色的一种，白色的却叫做"菜头"。說的都是"乖"，在普通話里包括"違碍""机灵""不乱吵乱鬧(指小孩)"等等意义，而有些地区却可以指人或物的"美丽"(如云南云县，湖南慈利)：

> 这姑娘眞乖！（这姑娘眞美）
>
> 这花瓶眞乖！（这花瓶眞美）

显然，"美丽"的用法与"机灵""不乱吵乱鬧"等意义相关連。同样一个詞，在各个方言里涵义的范圍互有出入；同样一个概念，在甲方言是用一个詞来表达的，在乙方言却需要用一两句話才說得明白。这种方言之間的在意义表达方式上的錯綜复杂現象，大約就是許多人覺得只有自己的家乡話最"細致"、最能傳神的心理基础，也就是許多作家主張"大量地使用地方性的土話"的重要理由。

然而，我們認为，正是因为有这种方言間的錯綜复杂現象，所以在文艺作品里应当尽量控制方言土語的运用。写湖南慈利农民的对話，把"这姑娘眞美"一定要写成"这姑娘眞乖"的話，当地人看了也許認为很"傳神"，外地人看了却很可能引起誤会，那末它非但不能傳神，而且难以达意。

> 我看算了吧，老弟，不是姻緣，霸蛮是空的。
>
> 她爱精致，爱素淨，总是把房間里，灶門口，桌土里，都收拾得熨熨貼貼。

---

① 方明、楊昭敏：《山乡的巨变，人的巨变》，見《評"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9年1月，35頁。

② 苏联裴定在《作家的技巧》一文中所称，見《論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5月，201頁。

这些«山乡巨变»里的湖南方言，外地人看来，“霸蛮”可能誤会为“蛮横”，其实是“勉强”“硬来”的意思；“素淨”并不指顏色，是指“干淨”。这是我的体会，也許錯了。

一般文艺作品的讀者总不能限于某个地区的。“霸蛮”之类的詞固然叫湖南某些地区的讀者感到“傳神”，却叫这些地区之外的广大讀者感到晦澀。从总的效果看来，“傳神”倒是很有限的了。而且，即使在当地，也未見得使人人眞的感到“傳神”。这是因为：我們現在的作品沒有完全用方言写的，也不会有人再提倡用方言写。完全用方言写，像解放前有些人主張过的并实踐过的那样办，倒可以叫当地讀者通篇按照方言的讀音和意义去了解，而現在我們所談論的作品不是，这些作品是在普通話的基础上摻入大量方言。不懂这个方言的人讀起来固然感到困难、晦澀，懂得这个方言的人对某些詞句要按普通話的意思去理解，对另外一些詞句又要按方言的意思去理解，也会感到吃力，有些地方恐怕眞是“要默一默神”才能領悟过来。群众看慣了用普通話写的書报，現在要用另一种尺度去讀文艺作品，要把那些方言詞句按照汉字的方音翻成口語去体会文意，也就更会使作者牵涉到这么一个技术問題：許多方言字眼到底該用什么汉字来写？我看«山乡巨变»的时候，就常常有这么个疑問，不知道某些方言字眼是不是能眞切地表达那个方音。假若能，那末当地人由眼到口，是会懂得，而且“傳神”的，縱然头一回碰在眼前不很熟悉。假若不能，即使当地人恐怕也要拐弯抹角猜想一陣才能体会吧？用汉字轉写方音有时确实为难，我想立波同志在这方面費过不少心力，有过丰富經驗。

汉字是超方言的文字，所以也給作家們許多方便，正如立波同志所說：“有些方言，字同音不同，如‘拆壁补壁’，照这地方的土音（壁音 bia）講起来，恐怕只有本地人能懂。但写了出来，別的地方还是看得懂。这样的方言，我主張多用，因为它們可以丰富普通話的語汇，加强它的表現力，又不难理解。”①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些話。可是，汉字的超方言，又給作家們帶来不便，那就是，容易“望文生訓”，引起誤解。例如有个“俗”字，«山乡巨变»里常常用到：“俗样子都装出来了”，“眞是出俗相”，等等。这“俗”字就很容易叫人誤会到“俗气”什么的意义上去。作家們本来是一番好意，想在这些地方想些办法“傳神”，而效果是适得其反。与其这样，我認为还不如从普通話里多找些出路。比如說，“俗样子”是否可以說成“丑样子”，“出俗相”是否可以說成“出洋相”？跟原意也許有点出入，但是总比叫讀者隔靴抓痒地摸不到是处或引起誤会好些。又如“一天到黑，只曉得到外边去仰”这句話里的“仰”字，我体会意思，是完全可以改成“晃”的。

根据的是同样的事实，但是因为考虑的方向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誰都会承認方言之間有交錯綜复杂的事实，可是从方言本身去考虑，就会得出要尽量采用方言土語来表达的結論；从普通話来考虑，就認为应当要多从普通話里去找办法。我們和立波同志等人的分岐点就在这里。

至于那些方言与普通話的涵义完全相等的詞，我們認为更沒有采用方言的必要。“实其要这样，只好依你了”的“实其”，为什么不可以写成“实在”？“何解”为什么不可以写成“怎么”？“黃竹筒”为什么不可以說成“黃鼠狼”？如此等等，在«山乡巨变»里这样的例子很多。难道这些字眼一换成普通話的就不能“傳神”？我看未見得。关于这点，許多人早巳在文章里談到，这里就不必多說了。

以上只是就詞汇现象說，語法方面也不是沒有問題，只是因为汉語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語法差异不像詞汇差异那么大，所以問題不显得那么突出。“我是一个撑了石头打浮湫的人，还是看年把子着。”“这段姻緣，当初我就打过破。”我看这样的方言語法，很容易改成普通話的說法，而且一点也不会因此失去“傳神”的效果。

当然，周立波同志运用方言也并不是毫无选擇，不加洗煉。这層意思他自己的文章一再提到。而且每当他提出采用方言土語的主張时，总是一再强調“写对話时”“特别是小說里的人物的对話”要多用，也就等于說在非对話的叙說里可以少用些。可是他并沒有很好地在实踐中貫徹自己提出的原則，即使在叙說部分，我們看来，也还是有許多不必要的方言土語。看到这些地方，我們深深感到，周立波同志对于方言土語是何等偏爱！

其次要談到的問題是，我們怎样正确地体会毛主席在語言問題上的指示。毛主席說：

> 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說，顚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詞，一套“学生腔”，沒有一点生动活潑的語言，这豈不是語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②

因此他劝一切“宣傳家”，包括“文艺作者”在內，都要下苦功去学習語言，而首先“要向人民群众学習語言。人民的語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潑的，表現实际生活的”。可見毛主席所指的知識分子“語言无味”的原因，在于詞汇貧乏，語句呆板，表現脫离实际生活，等等，而根本的原因在于生活脫离群众。所以毛主席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指出：

> 許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脫离群众，生活空虛，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显得語言无

---

① «关于“山乡巨变”答讀者問»，見«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

② «毛澤东选集»，III，858頁。

味，而且里面常常夹杂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①

这說的是十七八年以前的情况。在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指导下，許許多多与群众生活密切相結合的文艺工作者已經鍛煉出来了，因而在語言方面，也已經根本改变十七八年以前的那种情况。

然而有的作家（像周立波同志这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在貫徹毛主席的关于語言問題的指示时，似乎只偏重于从方言的角度去了解，尤其偏重于从农村方言土語的角度去了解。不錯，在抗日战爭时期，在抗战胜利以后，大部分国土还在国民党政权統治下的时期，那时偏重于从方言土語的角度去了解，去表現，是符合当时的形势，适合当时文艺的宣傳方式的。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尤其是在普通話在全国范圍內积極推行的今天，在方言土語只有日漸縮小使用范圍的形势下，在这个时候还强調在文艺作品里尽量使用方言土語的話，非但对毛主席关于語言問題的指示的理解具有片面性，而且也不符合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总的要求，与語言發展的趋势也是背道而馳的。

周立波同志說过：

語言要新穎、生动，对話要切合人物的口吻。曹雪芹和魯迅都是运用語言的能手，我們从他們的作品的对話中，可以看出人物的身份和性格。…

文学是語言的艺术。…描写人物的对話，要根据他們的阶級特征和个人性格，設身处地，摹拟他們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傾吐的言語，不能單憑臆測，不宜尽撥書上的陈言。②

这段話是立波同志的經驗之談。在当代的許多重要作家里，立波同志是眞正关心語言問題，而且眞正熟悉群众語言的。但是我們学習群众語言的总目的应該是为了丰富和提高普通話的表达能力。也只有为了这个目的，作家才有充足的理由把必要的方言、古語、外来語等介紹到普通話里来。按說，一个作家在語言上越能下功夫，他使用語言时就越能取精用宏，得心应手，越能不受方言土語所拘束。魯迅、曹雪芹确实都是"运用語言的能手"，然而魯迅写阿Q或閏土并沒有用多少紹興方言。《紅楼梦》里的人物有好几百，并不都是一个地方的人，然而曹雪芹也并沒有在对話里写"哪里人，就用哪里的話"。可見写现代农民的对話也不一定要用当地方言才能做到"新穎、生动""切合人物的口吻"，少用方言土語跟"向人民群众学習語言"并无矛盾。

最后，要談談文艺作品对民族語言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問題。"小說并不是推广普通話的課本"，这話不会有人反对，但并不能拿这理由作为擋箭牌，为文艺作品和作家擋住推广普通話有关的任何責任。

普通話并不是汉民族中某一社会阶層或某一特定地区單独說的話，比如說，不是知識分子阶層或北京地区單独說的話，而是汉民族共同使用的語言。普通話是符合当前全民族的交际需要，会不断扩大它的作用，而且会不断壮大它的內容的。因此，每一个民族成員都有机会为普通話的發展尽一份責任。会說普通話的，在日常交际中会有意或无意地扩大普通話的影响；还不会說普通話的，只要他一旦自願学着說，也就起了一点滴推广的作用。全民性語言的發展依靠民族的每一个成員的实踐、支持，首先是依靠在語言使用上有示范作用人們的实踐、支持。1955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論里指出过："語言的规范必須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因为語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傳播开来的。作家們和翻譯工作者們重視或不重視語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計的，我們不能不对他們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希望作家們尤其是对方言土語有偏爱的作家們再閱讀一下这篇社論，体会它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来貫徹党的語言政策。文艺作品虽然不是推广普通話的課本，可是它应当能够集中反映某个时期的民族語言，而且成为發展民族語言的积極推动力量。一部好的（从內容到語言）作品，它对推广普通話所起的作用不知要胜过課本多少倍。老舍先生有一段話能說明这道理：

我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听說过：有許多人拿《紅楼梦》当作学習北京話的課本。

这說明了一个問題：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而外还有一种責任，就是教給大家怎么說文章和說話。…③

《紅楼梦》和它前后的許許多多用北方話写的文艺巨著，确实对普通話的形成和推广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④ 根据《紅楼梦》来学習北京話的年代已經过去了，生活在这个偉大时代的人民作家难道不可以也考虑一下作品在語言方面的作用？这要求不算过分吧？

"在文学中与'方言主义'进行斗爭，这就是要求作家不許在任何借口之下使用多余的、古古怪怪的詞句把語言弄得烏七八糟。但这个要求并不排除方言的使用，如果那个方言很难或者不能用大家知悉的誰都能理解的詞句代替的話，如果它在丰富語言上能發生准确的功效的話。"⑤ 斐定的这段話，也正是我們的結論。

---

① 《毛澤东选集》，III，872—873頁。

② 《周立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273—274頁。

③ 老舍《大力推广普通話》，見《人民日报》，1955年10月31日。

④ 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分析，請看前举的《人民日报》社論和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語规范問題》一文（見《现代汉語规范問題学术会議文件汇編》）。

⑤ 斐定：《作家的技巧》，見《論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203頁。

战后苏联的东方語言研究

〔苏联〕 Г. 謝尔久琴柯

（本刊特約稿）

东方語言的研究在苏联有着悠久的傳統。远在十八世紀后半叶，就出現了俄罗斯几位院士——吉尔簡什切特(Гильденштедт)和帕拉司(Паллас)所写的有关高加索語、伊朗語、突厥語以及东方某些其他語言的巨著。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是著名的俄罗斯印度学学家列别捷夫(Герасим Лебедев)的活动时期，他曾在印度住了十二年(1785—1797)，在那里研究了不少的地方語言，編写了欧洲最早出版的梵語語法之一(1801年)。

畢秋林(Иакинор Бичурин)是卓越的俄罗斯东方学家，他在十九世紀的前半叶就全面地展开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活动。他熟諳汉語，曾編写过汉語語法、华俄大辞典，并且还研究过和用汉語翻譯过許多在今天还保有科学价值的中国历史和地理著作，因此而享有盛名。

从畢秋林生活的时代开始(他死于1853年)，汉学家的俄罗斯学派得到了国际的承認。十九世紀最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除了畢秋林以外，还有卡法罗夫(П. Кафаров)、瓦西里耶夫(В. Васильев)、喬奥尔基耶夫斯基(С.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伊万諾夫斯基(А. Ивановский)、察哈洛夫(И. Захаров)。

十九世紀最优秀的俄罗斯印度学-語言学家是梵文雅語学家彼得洛夫(П. Петров)，还有梵文雅語、梵文俗語、巴利語和新印度語方面的專家米那耶夫(И. Минаев)，他編写了当时最好的巴利語語法，并建立了俄罗斯印度学学家(奥里簡布尔克〔С. Ольденбурк〕、謝尔巴茨基〔Ф. Щербатский〕、庫德良夫斯基〔Д. Кудрявский〕等人)的学派。

由于有这些优秀的俄罗斯突厥学家，如别列金(И. Березин)、卡杰姆别克(А. Казембек)，特别是拉德洛夫(В. Радлов)、梅里奥兰斯基(П. Мелиоранский)、卡达諾夫(Н. Катанов)等人的劳动，突厥学才能成为独立的科学学科。这一时期在俄罗斯的蒙古学家中，史密特(Я. Шмидт)、卡瓦列夫斯基(О. Ковалевский)、勃普洛夫尼科夫(А. Бобровников)、波波夫(А. Попов)、戈尔司东斯基(К. Голстунский)及其他一些学者都是很著名的。他們写出了蒙古諸語言的語法和詞汇方面的巨著并以此丰富了科学。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俄罗斯的伊朗語学[illegible]其中首先应当提出的是，勃尔德列夫(А. Бордырев)[illegible]多倫(Б. Дорон)、柯索維奇(К. Коссович)、茹可夫[illegible](Б. Жуковский)、扎列曼(К. Залеман)、柯尔什([illegible] Корш)和米列尔(В. Миллер)等人大力地展开了研[illegible]活动。

与此同时，許多卓越的俄罗斯学者，如仙柯夫[illegible](О. Сеньковский)、撒布魯柯夫(Г. Саблуков)、[illegible](Х. Фрэн)、赫沃里逊(Д. Хвольсон)、罗錢(В. Розе[illegible]及其他一些人，在塞姆学(семитология)的研究上都[illegible]很大的貢献。在俄罗斯东方学的發展中，还有一些高[illegible]索学家，如烏思拉尔(П. Услар)、察戛列里(А. Цагаре[illegible]ли)、帕特加諾夫(К. Патканов)、馬尔(Н. Марр)、[illegible]尔揚茨(Л. Мсерьянц)及其他一些人，也都起了不小[illegible]作用。

苏維埃年代，苏联科学家們在研究东方語言[illegible]的主要注意力，首先是集中在研究現代的活語言上[illegible]但他們同时也对古老的書面文献进行語言学的研究[illegible]他們对撒别語、粟特語、哈尔多-烏拉尔語、古突厥語[illegible]很早的其他書面文献的研究（馬尔、墨山宁諾夫〔[illegible] Мещанинов〕、弗列伊曼〔А. Фрейман〕、馬洛夫〔С. Ма[illegible]лов〕、切列捷里〔Г. Церетели〕等人），都具有重大的[illegible]学意义。

在苏維埃年代里，第一次全面地、認眞地研究了[illegible]多地区的方言，編写了許多关于突厥語、蒙古語、伊[illegible]語、高加索語、閃語、远东語言（日語、朝鮮語）和汉語[illegible]科学語法。这一时期內，領导对东方語言和古文献进[illegible]科学研究的是这样一些最优秀的东方学家：苏联科[illegible]院的克拉乞柯夫斯基(И. Крачковский)院士、巴兰[illegible]柯夫(А. Бараников)院士、阿列克塞耶夫(В. Алексе[illegible]ев)院士、馬尔院士、墨山宁諾夫院士、戈尔德列夫斯[illegible](В. Гордлевский)院士、康拉德(Н. Конрад)院士、柯[illegible](С. Козин)院士、德米特里耶夫(Н. Дмитриев)通訊[illegible]士、别尔捷尔斯(Е. Бертельс)通訊院士、弗列伊曼[illegible]訊院士和其他一些人。

近年来(1945—1958)苏联在掌握了更多的語言[illegible]且在研究日漸更新的語法和詞汇問題的同时，又以[illegible]

的力量展开对国外及苏联东部語言的研究。下面我們只是对由苏联科学家近年来完成的和有关国外（对苏联来說）东方語言的主要著作，作一些評述。

这一时期，汉学-語言学家的研究兴趣的中心是汉語語音和語法問題。1952年，龙果夫發表了專著《現代汉語語法研究》。①在这本專著里，作者依据俄語語法学派的傳統，提出了对汉語詞类問題的新的解釋。他还和他的夫人龙果娃一起發表过一篇很長的文章《汉語普通話的音节結构》。②在这篇文章中，被看作是汉語中最小的語音單位的不是話語的各个語音（音位），而是被賦予抑揚頓挫的音节（силлабима）。

1957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曾發表了專門的論文集《汉語語法的某些問題》。③其中發表有龙果夫著的《关于現代汉語簡單句的分类問題》（5—22頁），宋采娃（Н. Солнцева）著的《論汉語动詞主語句的划分标准》（22—47頁），賈布基娜（Н. И. Тяпкина）著的《現代汉語中的后置詞》*（48—88頁），魯勉斋（М. К. Румянцев）著的《現代汉語中句子語調的某些实驗材料》（89—127頁）。

同年，列宁格勒大学出版了雅洪托夫（С. Яхонтов）著《汉語的动詞范疇》④一書。国际关系学院出版了宋采夫著的《現代汉語概論》，⑤它的主要內容是評述現代汉語的詞法和句法。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出版了魯勉斋的《現代汉語的主語句》，⑥伊三克（Б. Исаенко）在所編《拼音汉俄辞典試編》里作为附录的一篇文章是有关确定汉語詞的界限的。⑦1958年出版了罗日捷斯溫斯基（Ю.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所写的《汉学历史中詞形的理解》⑧一書。

同汉族全民共同語的形成和發展問題有关的文章，有康拉德院士写的：1）《論汉語》，⑨ 2）《論中国和日本的标准語》，⑩还有謝尔久琴柯用汉語發表的著作《汉語規范化的重要性及一些原則》。⑪关于汉字的現狀及其改革的問題，謝尔久琴柯教授也写了一些文章，如《关于汉字的某些問題》⑫《关于汉字的改革問題》⑬等論文，这些論文在他所写的《中国的文字及其改革》⑭一書中也都曾談到。

近年来，苏联出版了一些华俄和俄华辞典。其中主要的是：1）鄂山蔭（И. Ошанин）編的《华俄辞典》，2）陈昌浩、伊三克合編的《俄华辞典》，3）伊三克編的《拼音汉俄辞典試編》。

在未發表的一些專著中，这样一些文章是很有意思的：鄂山蔭著《汉語中的詞和詞类》，郭路特（Н. Коротков）著《汉語句子發展的阶段性及区别动詞的方法》，宋采夫著《汉語中的詞和詞根問題》，宋采娃著《現代汉語标准語中的被动态范疇》，罗日捷斯溫斯基著《現代汉語中的助詞"的"》及其他。

在印度学方面，苏联語言学家的注意力在描写語言时期也首先是放在詳細分析新印度諸語言的語法和詞汇的各个問題上，同样也放在对印度阿利安諸語言和古印度語的历史發展的研究上。在这一組工作中，最主要的是現在已去世的巴兰尼柯夫院士的研究《新印度諸語言中的詞尾变化》，⑮《印度学的語言学傳統中的历史比較法成分》⑯及其他，还有他在許多年里講授的諸印度語的方言学問題，同样还有他的專門論著：《諸印度語的比較語法》，《印度諸語言》，《茨崗語》（是該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这些著作都在印刷中。

在一些年輕的印度学家的著作中所反映的，首先是印度語中詞汇构成的問題和动詞的結构問題（复合口語动詞及复合动名詞〔сложновербальные и сложноотыменные〕）。有关于前一問題的是巴尔胡达洛夫（А. Бархударов）的候补博士学位論文——《印地現代标准語中的后綴构詞法》，聶扎維茨卡婭（Е. Недзавецкая）：《現代印地常用語詞汇的發展道路》，佐格拉夫（Г. Зограф）：《十九世紀初烏尔都常用語的主要特

---

①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按中譯本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編者。）

② 《苏联东方学》1955年第1期，57—74頁。（按《中国語文》1958年11月号載有譯文——編者。）

③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共128頁。

* 这篇譯文見《中国語文》1957年12月号及1958年1月号——編者。

④ 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56年，共181頁。（按本書本刊已譯出，1958年由中华書局出版單行本；本刊本期介紹有高列洛夫写的关于本書的書評——編者。）

⑤ 国际关系学院出版社，莫斯科，共207頁。（按本書已由本刊譯出，正校訂中——編者。）

⑥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1957年，共79頁。

⑦ 見《拼音汉俄辞典試編》，莫斯科，1957年，239—319頁。（按这篇附录《論汉語中詞的界限問題》，已譯載于《中国語文》1958年5月号至9月号——編者。）

⑧ 国际关系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20頁。

⑨ 《語言学問題》，1952年第3期，45—73頁。（按中譯本于1954年由中华書局出版——編者。）

⑩ 同上，1953年第3期，莫斯科，25—40頁。

⑪ 見《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文件汇編》，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年。

⑫ 見《关于創立民族文字及标准語的問題》，民族出版社，北京，1956年，176—202頁。

⑬ 《苏联中国学》杂志，1958年第1期，莫斯科。

⑭ 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

⑮ 《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49年第1期。

⑯ 《語言学問題》，1952年第2期。

点»，切雷謝夫（Е. Челышев）：«印地現代社会政治术語»，宋采娃：«現代烏尔都語中的社会政治术語»，等等。談到后一問題的也有一系列的学位論文——里东（Дж. Литтон）：«关于現代孟加拉語中的复合口語动詞問題»，卡洛布柯夫（И. Коробков）：«現代孟加拉語中的动詞(詞法)»，达維多娃（А. Давидова）：«現代印度斯坦語中的复合动詞»，貝科娃（Е. Быкова）：«現代孟加拉語中的主語和謂語»，等等。所有这些著作的主要論点，都在各作者不久前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專門性語言文集里發表的文章中説明了。①

这时更大地注意到詞的詞汇-語法范疇的构成問題和句法。出版有沃洛布耶夫-捷夏多夫斯基（В. 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的專題論文：«諸印度阿利安語人称代詞的發展»。②还有这样一些著作：阿列克謝耶娃（Е. Алексеева）著«孟加拉标准語的副詞»，帕梅兰采娃（Л. Померанцева）著«現代印地标准語中后置詞“ко”在句法中的运用»，等等。

近年来所积累的关于諸新印度語的材料，使有可能进行各語言之間的比較并闡明印度諸死語言和活語言發展中的最主要規律。这些問題現在正有不少人在研究，这些人中包括：卡里雅諾夫（В. Кальянов）——曾写过关于史詩梵文中过去时的形式和表达方法；③巴尔胡达洛夫——在專門的研究中，闡明了关于印度阿利安諸語言中附加前綴的消失問題，以及在諸新印度語中对它們説来是新的、完全可以补偿前綴消失的語法手段的出現問題。④

苏联的印度学家在辞汇学和辞典編纂法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印地語和烏尔都語的构詞法»論文集已准备出版。1951 年出版了«烏尔都語-俄語辞典»，⑤ 1953 年出版了«印地語-俄語辞典»，⑥ 1957 年出版了«俄語-印地語辞典»，⑦ 1958 年出版了«孟加拉語-俄語辞典。⑧此外，还出版了許多簡明辞典——印地語-俄語，俄語-印地語，烏尔都語-俄語，俄語-烏尔都語，孟加拉語-俄語，俄語-孟加拉語。目前准备出版的有旁遮普語-俄語大辞典，塔米尔語-俄語大辞典，俄語-孟加拉語大辞典，以及其他一些辞典。

苏联的阿拉伯語言学近年来得到很大的發展。这一时期，用苏联各族人民不同的語言編輯和出版了一系列阿拉伯語教科書和文选。（用俄語出版的有：巴兰諾夫〔Х. Баранов〕、卡勉斯基〔Н. С. Каменский〕、柯瓦略夫〔А. Ковалев〕和沙尔巴托夫〔Г. Шарбатов〕；用阿塞尔拜疆語出版的有：穆赫塔尔·艾芬吉-扎捷〔Мухатар Эфенди-заде〕和馬勉多夫〔А. Мамедов〕；用烏孜别克語出版的有：戛尼耶夫〔С. Ганиев〕，等等。）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都列捷里（Г. Церетели）編写了«阿拉伯文选»，⑨其中包括很多从阿拉伯闡述整个格魯吉亞和高加索过去文化的各种史料中选出的材料，还包括 ал-фарики 的«馬伊阿法里金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Майфа-фарикина)»的摘要，馬卡利·安吉奥西斯基（Мака Антиохийский）手稿的片段及其他。

与教学書籍同时，还編輯着阿拉伯語科学語法“学院式”大著作，其中占有特殊位置的是正在东方学出版社出版的格兰德（Б. Гранде）教授著«阿拉伯語法»（49印刷頁）。这部語法是以历史比較为主，它广地利用了其他閃語和含語的，特别是句法方面的材料。格兰德教授在 1950 年就已出版了«阿拉伯标准語語表»。⑩格魯吉亞的科学家列吉阿什維里（А. Лекиаш-вили）于 1953 年出版了«阿拉伯語动詞形式变例»⑪單行本。

1957 年再版了巴兰諾夫教授的巨著«阿拉伯語-俄語辞典»（四卷本）。

过去几年間，对中亞地区阿拉伯方言的研究給了很大注意。研究这些方言的有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切列捷里（梯比利斯）和維尼柯夫（Н. Винников）教授（列宁格勒）。每一位研究者都仔細地研究了这些方言，詳細地描写了它們，并且把研究的結果和原文一起整理出来，以便出版。切列捷里著的关于中亞地区«布哈尔阿拉伯方言»的四卷本專著的第一卷已經出版了。⑫沙尔巴托夫（Г. Шарбатов）的候补博士学位論文是有关阿拉伯語埃及方言的，他还編輯了埃及方言选集。⑬

許多年輕的阿拉伯語言学家的候补博士学位論文中，都研究了阿拉伯古代語和現代标准語的語音、語

---

①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學术札記»，第 13 卷，1958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

②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1956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③ 东方学研究所«学术札記»，第 13 卷，1958 年。

④ 同上。

⑤ В. Бесĸровный, В. Краснодембский 合編；外國和民族文辞典出版局，莫斯科。

⑥ В. Бескровный 編；出版者同上。

⑦ И. Рабинович, В. Горюнов, М. Грызунова 合編；出版者同上。

⑧ Е. Быкова, Е. Алексеева, И. Колобков 合編；出版者同上。

⑨ «阿拉伯文选»（Араб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梯比利斯大学出版，1949 年，120 頁。

⑩ 莫斯科大学出版，178 頁。

⑪ 格魯吉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梯比利斯。

⑫ 同上，1956 年，343 頁。

⑬ 軍事外語学院出版，莫斯科，1959 年。

和詞汇。这些学位論文有：列基阿什維里（А. Лекиашвили）的«阿拉伯古代語詞根的語义学和形态学比較»，阿赫弗列吉阿尼(В. Ахвледиани)的«現代阿拉伯諸方言中的咽头輔音的反映»，别尔金（В. Белкин)的«現代阿拉伯标准語中动詞詞干的扩展类型»，柯瓦略夫(А Ковалев) 的«現代阿拉伯标准語中时間范疇的表現»，馬勉多夫(А. Мамедов)的«論現代阿拉伯标准語中的簡單句»，齐摩非耶夫(С. Тимофеев)的 «阿拉伯語中带有副句的从屬复合句»，以及其他这类著作。

在諸閃語中，除去阿拉伯語以外，还在繼續研究古犹太語，新教科書是由沙皮洛(Ф. Шапиро)編写的。沙尼澤（М. Шанидзе）的学位論文是关于古犹太語的咽头輔音的。現在已付印的叙利亞語語法是阿良夫金(А. Алявдин) 写的。切列捷里的学位論文中描写了阿拉美語的烏尔米方言；阿西里(阿拉美)諸方言的比較語音学綱要也是这位作者編写的。

在伊朗語方面，近年来苏联科学家的研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很少有人研究的普式圖（пушту)語。阿斯拉諾夫（М. Асланов）已将篇幅很大的普式圖語科学語法(約 40 印刷頁)整理出来准备出版，并結束了普式圖語-俄語大辞典(100 印刷頁)的編纂工作。

阿富汗学-語言学家写出了有关普式圖語法問題的一系列学位論文和文章：如，列別捷夫(К. Лебедев)的«論普式圖語的內部屈折»，德沃良科夫(Н.Дволяков)的«論阿富汗現代語中助动詞的語义和功能»，奥兰斯基(И. Оранский)的«論普式圖語中体的語法范疇和簡略性»，黎福什茨(В. Лившиц)的«論普式圖語的代詞»，雅切維奇(Л. Яцевич)的«論普式圖語簡單句的詞序»，戛尼耶夫（А. Ганиев）的«論普式圖語中的被动态»，等等。

«阿富汗語-俄語辞典»①«俄語-阿富汗語辞典»②已經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不少关于普式圖語的教科書。

关于波斯語的学位論文也写了不少。其中最主要的有：盧宾奇克(Ю. Рубинчик)著«現代波斯語中带有限定副句的复合句»(在印刷中)，穆拉夫耶娃(Л. Муравьева)著«現代波斯語和塔吉克語的冠詞»，别西柯夫(Л. Пейсиков）著«試談波斯（捷格兰的）俗語的語音語法特点»，奥弗契尼柯娃(И. Овчинникова)著的«波斯語史中后置詞“ра”的句法上运用»，等等。

在过去这一时期里，两次發行了米列尔(Б. Миллер)教授編的«波斯語-俄語辞典»。③这部辞典中附有拉斯塔尔古耶娃（В. Расторгуева）編写的«現代波斯語語法綱要»。

关于庫尔德語方面，庫尔多耶夫(К. Курдоев)写出并出版了«庫尔德語語法»，④ 此外还出版了楚凱尔曼（К. Цукерман）的有关庫尔德語語法的著作⑤和巴卡耶夫(Ч. Х. Бакаев)編的«庫尔德語-俄語辞典»。⑥

在国外东方的突厥語中，战后这一时期很注意于土耳其語。除了一系列的土耳其語教科書（艾良洛夫〔Ш. Айляров〕、麦捷尔〔С. Майзель〕、斯塔洛司托夫(Л. Старостов)及其他人編)外，近几年还出版了許多專著——謝瓦尔佳(Э. Севортян)著«土耳其标准語的語音»，⑦麦捷尔著 «土耳其語中的名詞組合»，⑧米哈伊洛夫 (М. Михайлов) 著«土耳其語中的婉語形式和体的范疇»。⑨ 同样还有关于現代土耳其标准語語法巨著⑩——柯諾諾夫 (А. Кононов) 的著作和已故的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德米特里耶夫 (Н. Дмитриев)所著«巴什基利亞語語法»，⑪ 这本書是諸突厥語的一般理論語法。

1954 年出版了 «土耳其語-俄語辞典» ⑫的第二版，这是馬戛扎尼克(Д. Магазаник)編的。

逝世不久的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馬洛夫 (С. Малов)近几年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都是关于古突厥文字問題和現代維吾尔語言的。1951年出版了他的專著«古突厥文字的文献»，⑬ 1952 年出版了«叶尼塞文字»，⑭ 1954 年出版了«維吾尔語 · 哈密方言»，⑮1956 年出版了«罗布泊語—原文、翻譯和辞典»，⑯1957 年出版了«黃維吾尔語»(即裕固語——譯者)。⑰ 馬洛夫的著作大大丰富了現代突厥学。

在有关維吾尔語的著作中，应当指出的是：那吉

---

① П. Зудин 編，Е. Э. Бертельс 校訂；国立外文和民族文辞典出版局，莫斯科，1950 年，563 頁。

② П. Зудин 編；同上，1955 年，1176 頁。

③ 出版者同上，1950 年第 1 版；1953 年第 2 版。

④ «庫尔德語語法：語音和詞法»，苏联科学院出版局，1957 年，343 頁。

⑤ «庫尔德語法綱要»II. 見«伊朗語»論集，1950 年，73—144 頁；«庫尔德語語法綱要»，III.，見«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 卷，5—56 頁。

⑥ И. А. Орбели 院士校訂，莫斯科，1957 年，618 頁。

⑦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1955 年。

⑧ 同上，1957 年。

⑨ 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 Н. Дмитриев 校，莫斯科，1954 年。

⑩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1956 年，莫斯科。

⑪ 同上，1948 年。

⑫ 外文和民族文辞典出版社，莫斯科，1945 年。

⑬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列宁格勒。

⑭ 同上。

⑮ 同上。

⑯ 伏龙芝出版。

⑰ 阿拉木圖出版。

普(Э. Наджип)編的大型«維俄辞典»(在印刷中),以及1954年出版的«維語»①选集。1955年还出版了寸瓦澤(Ю. Цунвазо)和莎米耶娃(А. Шамиева)主編的«俄維辞典»。②

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德米特里耶夫整理付印的三卷本集体著作«諸突厥語現代語法的研究»,是有关突厥語的历史比較研究的。③

战后时期还写出了大量有关蒙語的教学参考書、研究論文和專著。195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林奇內(А. Ринчинэ)編著的«蒙語教科書»是最有价値的参考書。④

在这一时期中,关于蒙語的專著已出版有:托达叶娃(Б. Тодаева)著«現代蒙語語法:語音和詞法»,⑤«現代蒙古标准語語法講义»(用汉文出版),同样还有桑热耶夫(Г. Санжеев)教授著«諸蒙語比較語法»第一卷。⑥在«中国語文»1957年9月号上,托达叶娃發表了«研究中国各蒙古語和方言的初步总結»。在苏联的科学家中,她是第一个研究了土族語一系列土語和东乡語及保安語的。

林奇內編纂的«蒙俄簡明辞典»是1947年出版的。⑦

在无数論文和專著以及学位論文中,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諸蒙語的語法問題,特別是詞类和复合句的問題上,对这些問題的闡述在蒙古学家中一般是沒有統一的看法的。这几年来,蒙古学中的新东西是对諸蒙語語音的实驗研究。这些研究的結果在卜拉耶夫(И. Бураев)和佐勒賀耶夫(В. Золхоев)等人的几篇候补博士論文中得到总結。此外,还有对蒙語中非胶着現象的研究。从事这一研究的有別尔塔戛耶夫(Т. Бертагаев)、桑热耶夫、切列米索夫(К. Черемисов)及某些其他蒙古学家。

托达叶娃的两种專著——«蒙古衛拉特方言格的語义和句法»⑧和«中国的衛拉特方言»(用汉文印出)都是有关卡尔梅克語的。

在有关朝鮮語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霍洛多維奇(А. Халодович)的关于朝鮮語語法的著作,这一著作于1954年以«朝鮮語語法綱要»⑨为題在莫斯科出版。«朝鮮語-俄語辞典»⑩也是他編纂的,烏撒托夫(Д. Усатов)、馬祖尔(Ю. Мазур)和摩茲德柯夫(В. Моздыков)合編的«俄朝辞典»⑪已發行三版。在为数很多的研究論文和学位論文中,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朝鮮語語法問題的研究上,首先是鑒定謂語、变位的形容詞和动詞,各別詞类和研究句子的結构。同时开始了朝鮮語的語音实驗研究,这一工作是在金德尔(Л. Зиндер)和霍洛多維奇諸教授的領导下,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实驗語音实驗室进行的。

战后苏联在日本語言学方面,进行了相当重要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既同語音和文字問題有关,也同語法和辞典問題有关。研究不仅包括現代日語情況,同时也包括日語的历史。同日本民族标准語的形成和發展問題有关的著作有:康拉德院士發表于«語言学問題»杂志⑫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术札記»⑬中的文章。出版于1956年的柯勒帕克奇(Е. Колпакчи)的專著«日語史概述:动詞的形态»⑭一書中詳細地闡述了日語动詞的历史。关于日語語音和語法問題的研究,有塞洛勉特尼柯夫(Н. Сыромятников)、⑮費尔德曼(Н. Фельдман)、⑯霍洛多維奇⑰等人的著作。巴什柯夫斯基(А. Башковский)教授的博士学位論文和一系列的文章中闡述的是日語詞汇問題。

最近几年来,出版了这样一些篇幅相当大的辞典:

1) 科瓦連柯(И. Коваленко):俄日辞典,⑱

2) 格魯斯金娜(А. Глускина)和察魯宾(С. Зарубин):日俄辞典,⑲

---

① 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② 阿拉木圖出版。

③ 現已出版两卷:I. 語音学,1955年;II. 詞法,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

④ 外語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2年。

⑤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1951年,莫斯科,192頁。

⑥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1952年,240頁。

⑦ 外文和民族文辞典出版社,莫斯科,1947年,424頁。

⑧ 手稿。一部分在埃利司特-卡尔梅克自治省出版。

⑨ 外語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319頁。

⑩ 外文和民族文辞典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604頁;第2版,1959年,890頁。

⑪ 同上。第1版,1951年;第3版,1954年,1050頁。

⑫ «論中国和日本的标准語»,見«語言学問題»杂志1953年第3期,25—40頁。

⑬ «論中国和日本的民族語»,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术札記»,第4卷,1952年。

⑭ 苏联科学院出版局,莫斯科,1956年,234頁。

⑮ «日語音位系統»,見东方学研究所«学术札記»,第4卷1952年;«研究日語中的某些爭論問題»,見«东方学研究所簡报»,1955年第7期;«論新日語中的时間体系»,同上,第24期,1958年;以及其他。

⑯ 辞典中的«日語語法綱要»;«現代日語中来自名詞或形容詞的后置詞»,(按此文已有譯文,收在中华書局出版的«語言学論文选譯»第八集——編者),見«語法結构問題»論文集,1955年;以及其他。

⑰ «日語所具有特征的屬性»,見«語言与思維»論文集,1948年,第11卷;«日語的語言行为和主体»,見«列宁格勒大学学术札記»128期,1957年,以及其他。博士学位論文«日語結构概述»正准备出版。

⑱ 外文和民族文辞典出版社,1947年,855頁。

⑲ 同上,1950年,1000頁。

3) 涅姆捷尔(Л. Немзер)和塞洛勉特尼柯夫: 日俄辞典,①

4) 費尔德曼(Н. Фельдман): 日俄象形字典,②

5) 弗尔克曼(Е. Фелькман): 日本姓名辞典。③

关于研究日語的大多数文章和專著以及学位論文(在战后时期出版的約二十种)的特点是: 在这些著作中,語言現象的研究都是严密的历史的研究,并且采用了很多經过詳細分析的語言材料。

近几年来,苏联的科学家开始發表关于中国南部和东南亞語言的研究材料。謝尔久琴柯教授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南部民族語言的語音、文字問題的小册子和文章。其中多数是用汉文出版的。他还在《苏联东方学》杂志上發表了《关于中国各民族和語言的分类問題》④的文章。

在《中国南部語言和东南亞的語言》論文集中,收有关于中国汉藏語系語言的著作: 謝尔久琴柯教授的总結性論文《論僮傣語族語言》、列里赫(Ю. Рерих)的《論藏語中的形动詞結构》、普吉茨基(Е. Пузицкий)的《論景頗(克欽)語的語音結构和构詞法》,等等。安德列耶夫(Н. Андреев)在《苏联东方学》杂志上發表了《論越南語的發生》⑤一文。穆希塔良(Т. Мхитарян)进行了越南語的实驗語音研究,研究的結果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正在印刷的專集中得到闡述。列科姆采夫(Ю. Лекомцев)結束了对越南語簡單句結构的研究。埃普什簡(В. Эпштейн)的一系列关于緬甸語語音的文章已付印。关于印度尼西亞語个别語法問題的專著也正在結束。还有許多有关东南亞語言(越南、傣、印度尼西亞、高棉及其他)的語音、文字和語法問題的文章都收在印刷中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南部語言和东南亞語言》文集里。

对苏联的东方学来說,中国南部語言和东南亞語言的研究还是一个新的部門。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的,但是現在已經完全有根据設想,在最近几年里,就是苏联东方学的这一部門也会得到应有的發展。(吳 乐譯)

① 同上,1951年,828頁。
② 同上,1956年,1349頁。
③ 同上,1953年,1071頁。
④ 《苏联东方学》杂志,1957年第4期,117—124頁。
⑤ 同上,1958年第2期,101—111頁。

中山大学中文系語言組兩項研究著作脫稿

中山大学中文系語言組全体师生在党总支的領导下,今年一月进行了比較深入、全面、系統的教学改革,拟訂出了六分新的教学大綱之后,接着一边編写新的教材、講义,一边又大搞科学研究。經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毛澤东語言研究》和《汉文字学》均已脫稿,各有十五万字左右,目前正在大力修改中。

《毛澤东語言研究》共分为六章: (一)緒論,(二)毛主席关于語言問題的指示,(三) 毛主席如何吸收和运用人民口語和古語,(四)毛主席在語法修辞上的特色,(五)毛主席的語言風格,(六) 毛主席語言在汉語中的地位和影响。本書有这些特点: 1) 材料丰富、广泛。編写时几乎翻閱了毛主席的所有著作,因此分析問題比較客观、深入、可靠; 2) 把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和語言实踐紧密結合起来研究,看出毛主席不但对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有着重大貢献,而且是一位偉大的使用語言的巨匠; 3)本書用丰富的材料証明毛主席运用語言的成功,不仅因为他具有高度的語言艺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着鮮明的立場、观点和博大精深的革命思想; 4) 在研究毛主席語言的同时,对目前使用語言上存在的不良現象进行了批判,富有战斗性; 5)全面論述,但又重点突出。本書重点放在毛主席語言中語法修辞特点和語言風格的研究上,在談問題时避免了一般化。

《汉文字学》,这是在批判了旧的《文字学講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全書分为八章: (一)緒論,(二)文字与語言,(三)文字的起源,(四)文字的發展,(五)汉字的性質和結构,(六)文字改革,(七)历代汉字研究概况,(八)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偉大成就。本書力求擺脫前人在研究文字学上的窠臼,跳出"为学术而学术"的圈子,試圖用新的观点方法来闡述汉文字学上的基本問題。本書的特点是: 1)目的性明确。本書研究汉字的产生、發展及其規律性,并指出其今后發展方向,目的是为促进汉字改革的徹底实現,使汉字更好地为无产阶級文化教育事业服务; 2)研究汉字的产生發展等能密切結合着社会生产、文化發展及語言發展来进行; 3) 試圖用馬列主义观点来批判和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如劳动人民創造文字的論証等。全書自始至終貫串着两条道路的斗爭; 4) 材料丰富、內容充实,对文字改革問題作了比較深刻,全面的論述。

(中山大学中文系語言战斗小組)

汉語的結构單位[①]

〔苏联〕A.A. 龙果夫

一

§1. 汉語和欧洲語言体系不同，欧洲語言的基本語言單位是詞組，是詞和詞的成分(詞根和詞綴)，也就是質方面的因素，而在汉語中，基本的結构單位則首先是單音节詞和双音节詞，也就是量方面的因素，

§2. 在汉語中，不变的單音节詞根是最小單位，小于此單位在意义上(从而在形态上)就不能再分。

汉語中音节的可分性同基本意义單位的可分性一般是相合的。例如："昨|天‖晚|上‖我‖作|完|了‖一|件‖要紧|的‖事|情"。

这里有着汉語与欧洲語言一个最重要的原則性区别。我們知道，在欧洲語言中詞义的可分性和音节的区分是沒有关系的，甚至一个个的音素(輔音和元音)也可以有意义，例如：с|дел|а|л|и*(做完了)。

从这一点看来，汉語可以叫做音节(слоговой)語，或者音节形素(слогоморфемный)語。

§3. 在汉語中，單独用一个不变的單音节詞根，②或者把它当作不完全句来用，这种情况是很少見的，用得最多的是把一个單音节詞根同另一个單音节詞根結合起来，构成一个双音节詞。

汉語單音节詞的独立性之所以有限，首先是由于汉語的音位結构特殊，因此汉語中存在着非常多的同音詞。把單音节詞結合而成双音节詞，自然就使同音詞的数量大为减少，因此在汉語中，双音节詞乃是数量上最多的最小單位，人們听来一般都能懂，可以独立使用。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就在双音节詞乃是表达下述两种关系所必需的、充分的語言最小單位：1) 某种句法关系(平等的和不平等的)，2) 韵律-語調关系(有重音和无重音)。

§4. 現代汉語无論口語或書面語(白話)都有一种趋势：双音节詞作为語言的最小單位用得越来越多。这不仅表現在把單音节詞結合而成双音节詞上，而且还表現在多音节詞大量被簡化为双音节詞这一方面。

現在我們来举几个例子加以說明。

例如俄語"друг"和"родственник"这两个詞，在汉語中就是用两个同义的單音节詞根組成的："朋/友"(照字面譯成俄語就是 друг/друг)和"亲/戚"(照字面譯成俄語就是 родственник/родственник)。但是如果把这些詞用作宾語同某个單音节的动詞詞根結合起来，那就只能用一个單音节而不能用双音节，例如："投亲，亲戚不叫进門；訪友，朋友不見面"。俄語的"гость"这个詞在汉語里也是一个双音节詞，是由两个單音节詞根"客"+"人"結合而成的。但是当我們要說 далекий гость, гость из далека 这个意思的时候，不能說"远客人"，而应当說"远客"…同样，俄語的"стол"在汉語中也是双音节詞，是由詞根"桌"加上單音节的輔助詞素"子"(表示事物的后綴)而成的。也就是說，应当說"桌子"。但是如果在这个詞上再加一个單音节后置詞，那"子"还可以省掉，亦即不但可說"桌子上"(на столе)，而且还可說"桌上"…。

§5. 双音节詞作为語言的最小單位之所以趋向于越来越多，还由于在汉語中这样很容易构成略語和簡称，例如，湖北的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鎮簡称为武汉，工人和农人簡称为工农，等等。

二

§6. 汉語中除了量方面的結构單位以外，也还有質方面的結构單位：詞組、詞和詞的成分(主要是詞根，很少是詞綴)。但是同欧洲語言不同，在欧洲語言中，

---

① 本文是龙果夫未發表的專論《現代汉語口語語法体系》的一部分，包括專論中的两章：第二章(汉語的結构單位)和第四章(詞的結构)。本文原拟在1941年付印，这次發表删去了作者在《現代汉語語法研究》(中譯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58——譯者)中叙述得很詳細的几节，个别地方也稍有删节。

② 凡是在語音上与音节相合的基本意义單位，不管在質的方面是不是詞根或詞綴，龙果夫都称为"單音节詞根"(关于單音节詞根的分类，詳見本文 §15 和 §39—40)。在龙果夫的后期著作中，他把 Е. Д. Поливанов 所說的"單音节詞根"改称为"詞素"；給"詞素"下定义为：具有某种意义而不能再分的詞的部分(見龙果夫为王了一著《汉語語法綱要》一書所加的評論，中譯本，1957年，19—20頁，注1——譯者)。

* 在俄語 сделали 这个动詞形式中，с 是表示完成体的前綴，дел 是詞根，а 是由名詞构成动詞的构詞后綴，л 是表示过去时的后綴，и 是表示复数的詞尾——譯者注。

質方面的結构單位是自在的，而在汉語中，質方面的結构單位則是以量方面的結构單位系統为基础的，亦即是以單音节詞和双音节詞为基础的。

§7. 我們往后就会知道，汉語中双音节詞的句法結构同双音节詞組的結构一样，因此这就有个很大的困难，不容易找出可供在具体情况下判断那是双音节詞还是双音节詞組的語法标准。

到底把某个双音节看作是詞还是双音节詞組，在汉語中一般是靠两个标准来决定，这两个标准乃是缺一不可的：1)看它是否可以拆开(主要标准)，2)看重音的位置何在①(补充标准)。

§8. 汉語中的双音节詞組，特点就是它的两个成分在意义上結合不严，中間可以添入別的詞和語法标志，重音落在第二个音节上。例如：

馬跑——馬又跑了
看报——看了报了，或看中国报
大狗——很大的那只狗
他哥——他的哥哥(同义)
很好——很不好；等等。

§9. 与此相反，双音节詞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两个成分意义結合紧密，中間不允許添入別的詞和語法标志(否則就要改变整个意思)，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例如"知道"不能象"看了报了"那样說成"知了道了"；"長虫"(蛇)在这个意义上也不能說成是很長的虫(試比較上面說过的"大狗")；"父母"可以說成"父亲和母亲"，但是不能說"父和母"；再如"道路"、"大小"、"松树"和"哥哥"(重迭詞)，等等。

§10. 属于双音节詞的还有象"看見"这一类型的复合动詞。尽管同"看見"并存的还有在"看見"插进中間成分构成的形式"看不見""看得見"，那和上述双音节詞的定义也沒有什么抵触。中間加进去的"不"和"得"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实詞，而仅仅是詞嵌。在复合动詞的成分中，它們不是以实詞的意义起作用的，这就是有力的証明。"看見"这类动詞的中間，是不允許插入任何單音节詞的。

§11. 我們知道，和动詞"思想"并存的还有"左思右想"，这类情况和上述双音节詞的定义也沒有矛盾。問題在于我們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并非簡單地把双音节"思想"的成分拆开加进別的詞，而是构成四音节詞的一个特別方法，关于这点，我們在下面§38再来詳談。因此，双音节"思想"仍算一个完整的詞，就象§9中所列举的所有双音节詞一样。

汉語中除此两种極端类型以外，还有一种居中現象，那就是只具备§7所列的条件之一。

§12. 有种双音节虽然不允許拆开，但是重音落在第二个音节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認为那是詞，不过是和前身詞組沒有断絕最后联系的詞。这种双音节詞我們就称为詞組-詞。

这一类詞包括：

1)由动詞和宾語构成的許多名詞(如"革命"、"結果")和动名詞〔nomen agentis〕(如"念書的"或"送信的")，这类詞組詞有些已經完全轉为詞，与此相应的，重音也轉到第一个音节上，例如"知府"、"将軍"、"指南"。有些还在詞組詞和單詞之間搖擺不定，例如："管事"、"管事的"。

2)由两个相对概念結合而成的双音节："工农"、"中外"、"桌椅"，等等。这类双音节大多数也已完全轉为詞的一部分，不过改变了意义，重音由第一个音节移到了第二个音节上，例如"父母"、"山水"、"买卖"和"多少"，等等(見§29)。有些这样的双音节則仍然起着詞組詞的作用，例如"笔墨"(重音在第二音节上，意即"笔"和"墨"；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則表示"文才")、"骨肉"(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意即"骨"和"肉"；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則表示"軀体")和"东西"(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意即"东方"和"西方"；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則表示"物品")。

3)象"吃飽"之类的許多結果动詞(§24)(至于"吃不飽"这类型式請看§10)，这类双音节有些已經完全轉为詞，因此重音移到了第一个音节上。例如"打死"。

4)"三国"、"四声"和"万物"之类的名詞。有些这样的詞組-詞也已經完全变成詞，重音相应地轉到了第一个音节上，例如："四川"和"百姓"。不过有的詞还沒有完成这个轉变过程，因此"四書"的重音可以落在第一个音节上，也可以落在第二个音节上。

---

① 由于对汉語的重音还研究得很不够，龙果夫在后期著作中談到詞不是把它同重音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同"輕音"(即弱化的)声調联系起来，他說："'輕'声在某个双音节的末尾也是标志之一，它表示这个双音节是独立的詞而不是仂語(見王了一著《汉語語法綱要》，中譯本，A. A. 龙果夫注，10頁注6——譯者)。但是两个音节都有声調的双音节并不一定就是詞組(仂語)，因此龙果夫又說："这里困难在于汉語中有两类复合的双音节詞：其中一类就其形式——更确切地說，就其声調結构——和仂語沒有区別，而另外一类則和簡單詞沒有区別。第一类两个音节都有声調，例如，"火³車¹"…，第二类只是开头的音节有声調，末尾的音节非重音，發成所謂輕声或弱化声…例如，"工¹錢"…(比較"桌¹子"——带詞尾的詞，"葡²萄"——在构詞上不能分析其来源的詞)。在复合詞还沒完全由第一类变成第二类的情况下，發音不同是可能的，例如："老²虎³"、"老²虎"…(同上書23－24頁，注7——譯者)。

5）"年輕"之类的形容詞，我們可以說"不年輕"，但不能說"年不輕"，試比較結构类似的詞組"胆大"，也可以說"胆不大"。

§ **13.** 有的双音节可以拆开，但是重音必得落在第一个音节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認为那是詞組，不过是在本質上同詞十分接近的詞組。理由不仅是因为这类双音节的重音必須落在第一个音节上，而且因为这类双音节大多数的編插能力是有限的，同 §12 中所說双音节詞不同，我們把这种类型的双音节詞称为詞-詞組。

这一类包括：

1）象"拿来"和"跑去"之类的許多复合动詞。这类动詞允許插入任何宾語（例如說，"拿水来"）。但是"拿去了"不能說"拿了去了"。在这类动詞当中插入"不"，永远表示动作不能完成。

2）象"看看"之类的許多重迭动詞。这类动詞虽然可以拆开，不过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可以說"看了看"，但不能說"看了三看"或"看了四看"。

3）表示姓名的許多双音节，如李白，杜甫。这类双音节很容易拆开，試比較"范德"和"有一个人，姓范名德"。

§ **14.** 綜上（§ 9—13）所述，可見"双音节詞"这个术語可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如果狭义地理解这个术語，就要把那些两可現象除外，根据 §9，它的定义便是：所謂双音节詞，在狭义上講，就是不允許拆开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的双音节。

如果广义地理解这个术語，它便包括那些两可現象在內（見 § 12—13）。因此，定义就稍有不同：所謂双音节詞在广义的意义上講，就是或者不允許拆开的，或者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或者同时兼有这两种特性的双音节。

在以下的叙述中，除非特别声明，我們所指的双音节詞都是广义的。

§ **15.** 以上我們談的只是双音节內部的区分。現在回过来談單音节內部的区分。这里可能有三种基本情况。

1）單音节仅是詞根而不是詞。它不能脫开在它前后的別的單音节，不能用定語后綴"的"来构形，也不能單独使用。例如"父亲"、"父母"、"朋友、"桌子"等詞中的單音节詞根"父"、"朋"、"桌"，等等，以及一切附加成分。

这种名符其实的單音节詞根在汉語中是不多的。

2）單音节可以是詞根，也可以是詞；不过作为詞的独立性是有限的。它可能脫开在它前后的別的單音节，但是不能用定語后綴"的"构形，也不能單独使用。这里包括所有的虛詞，如"在"、"从"、"就"、"不"，以及双音节詞"投亲"、"訪友"中的"亲"或"友"（§ 4），等

这种單音节在汉語中为数很多，可以称为独立有限的根詞。

3）單音节可以是詞根，也可以是独立詞。它作为独立詞同它前后的別的單音节脫离，也可以用定語后"的"构形，并且能單独使用。汉語單音节詞絕大部都屬于这一类。例如："人"、"馬"、"好"、"跑"，等等类單音节詞可以称为根詞。

把上述 1、2、3 条加以比較，就可看出只能当詞不能当詞根用的單音节在汉語中是沒有的。

三

§ **16.** 在現代汉語中，能够分解为形态学要素双音节詞，按其句法結构可分为三大类：

1）由詞根复合构成的；

2）由詞根重迭构成的；

3）由附加成分构成的。

§ **17.** 詞和詞組。我們已經說过（§ 7），汉語詞部的句法关系同詞組內部是一样的。不过尽管汉語和詞組結构一样，在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也还有的区别。

詞与詞組之間質的区別就是：詞的两个成分之的句法关系总是用簡單附加（примыкание）的办法构成的，而詞組两个成分之間的句法关系則除上述法以外，还利用一些語法标志，包括停頓在內，例如"鳥"（但"飞的那只鳥"），"父母"（但"父亲和母亲"）"父亲、母亲"。

詞与詞組之間量的区別則在于，在詞中是这型的句法关系占主要地位，而在詞組中却是那些类的句法关系占主要地位。例如詞組特具一种謂語关系（"他走"、"桌子不大"、"他是一个学生"），可是这詞的結构中几乎是不起作用的（个別的例外，如"的"、"年輕"）。相反地，詞的結构特具一种补充关系（例如"吃飽"、"看完"），这种关系在白話和方言都很普通，詞組結构中虽然也有（見 § 24），但那显然方言詞汇。

§ **18.** 句法关系的基本类型。單詞的两个成分間的句法关系和詞組两个成分之間的句法关系有种，一种是不平等的关系，另一种是平等的关系，前即所謂"从屬关系"，后者即所謂"并列关系"。

这两种句法关系之間的語法差别有两个：

1. 在平等关系下，只能結合屬于同一詞类的根。在不平等关系下則也可結合屬于不同詞类的根。例如：

平等关系

朋友 （名詞＋名詞）

高低 （形容詞＋形容詞）

喜欢 （动詞＋动詞）

并且 （副詞＋副詞）

不平等关系

大門 （形容詞＋名詞）

飞机 （动詞＋名詞）

四書 （数詞＋名詞）

2. 如果詞根平等地結合，它們的詞序在理論上并无关紧要，基本上根据習慣用法而定。有时改换詞根的位序也不会变动整个意思，例如說“要紧——紧要”和“喜欢——欢喜”。相反地，詞根不平等結合的特点則是詞序固定：定語一定要在被限定詞之前，宾語一定要在謂語之后，謂語則一定要在主語之后。平等的句法关系同不平等的句法关系之間的区别，在詞組中表現得特别清楚。

§ **19.** 混合句法关系除了前节所說的两种基本的句法关系以外，汉語还特具第三种句法关系——混合句法关系。这里指的是一种同位关系，(приложение, аппозиливная связь)亦即如“鯉魚”、“松树”、“李白”“拿来”之类的双音节詞。

这类双音节詞的句法关系的混合性質（即兼有平等关系和不平等关系）表現在：

1) 它們也同在平等关系下一样，只有属于同一詞类的詞根才能結合：名詞＋名詞，动詞＋动詞；

2)它們也同在不平等关系下一样，定語一定要在被限定詞之前(“鯉魚”)，宾語一定要在謂語之后(“拿来”)。

不过在这类双音节詞中，不平等关系不起主要作用。它是从属于并列关系、平等关系的。这种并列詞组是按平等的类型构成就是証明。它們的特点就是有停頓存在，并且它們中間不允許插入任何其他为不平等詞組所特具的語法标志(如“的”)。例如：“王老三，太原人”(王老三〔生于〕太原)。

四

§ **20.** 詞根不平等結合的句法关系，可能是：1)定語性的关系，2)宾語性的关系，3)謂語性的关系。

§ **21.** 定語性的关系。詞根按照定語-被限定語这个原則結合，在汉語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大多数汉語詞是按这个結构型式构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量新詞和新术語也这样产生。例如：“房頂”、“鉄路”、“紅軍”、“飞机”、“四川”，等等。

在这类双音节詞中，詞根的不平等关系表現在定語性詞根总在被限定的詞根前面。在詞組中，定語性关系此外还表現在具有表示屬性的后綴“的”上。

这类双音节詞的重音，可以落在第一个音节上，也可以落在第二个音节上。

§ **22.** 宾語性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宾語性关系，特点也在于它的組合成分的位序：宾語一定要在謂語之后。在詞組中，宾語性关系，此外还表現在它具有某些語法标志上。謂語可用体-时后綴构形，宾語前面可以放上計量詞“个”或者数詞定語。

按照这种形式构成的双音节詞又可分为两种：用名詞表示宾語的(“結果”型)和用謂語变来的名詞表示宾語的(“念完”型)。

§ **23.** “結果”型。这种双音节詞按其組織应当算是动宾結构的名詞，而同时仍然保持其为动詞，这在現代汉語的口語中实际上是沒有的。

但是，这种結构形式在名詞的构詞中用得很广泛，在这方面仅稍逊于定語-被限定語的形式。例如“結果”、“革命”、“指南”和“将軍”，以及其他名詞，就是按照这种結构形式构成的。

这种結构形式还特别多用在結构更为复杂的名詞中；甚至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單詞，而是作为一个組成部分(定語)，例如“防毒面具”。这种詞的結构是混合型的，它們可以分解为两个双音节，其中第一个双音节按动宾結构的形式构成，用在复合詞中作为第二个双音节的定語。

最后，动詞＋宾語(名詞)这种結构形式还可加上构形后綴“的”，广泛用来构成各种动名詞(nomen agentis)，例如“念書的”、“送信的”，等等。

这类名詞大多数重音都落在第二个音节上，但是如果这种形式的双音节已經完全轉变为双音节詞，那重音就从第二个音节轉移到第一个音节上(§ 12)。

§ **24.** “念完”型。同前节所說的“結果”型双音节詞相反，“念完”这种結构型式在构成汉語复合动詞的构詞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类复合动詞中，詞根的不平等表現在第二个詞根不論是动詞还是形容詞，都是从謂語变来的名詞，起第一个詞根的宾語的作用，不过不是一般形式的宾語，而是結果型的宾語，例如“吃飽”、“花淨”、“念完”，等等。

我們把“念完”型的双音节詞看作謂語＋結果型的宾語，还因为在現代汉語的方言(热河、河間府的方言中)具有与此相当的詞組，例如：“四邻八家的那些个房子都燒了个干淨”(河間府方言)，“你先吃个頂飽，再走”(热河方言)。一方面在詞“干淨”和“頂飽”前面有个表示物体的标志“个”，另一方面又可使用后綴“了”构成謂語，这便十分确凿地表明，“干淨”和“頂飽”在詞組中是名詞，是动詞“燒”和“吃”的宾語，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宾語，它表示的不是行为的受事，而是行为的結果。

可在复合动詞的成分中用作結果性宾語的动詞和

形容詞詞根，在理論上說，数量是无限的，但是在实际上也不过20—25个。

这类动詞的重音是落在第二个音节上(如“吃飽”、“花凈”、“念完”)，但是如果这个詞已从詞組的成分詞(§12)完全轉变为單詞，那重音便總移到第一个音节上，例如“打死”、“淹死”，等等。

§25. 按照宾語性关系构成的还有这样的双音节詞，如：“好看”、“可恨”，等等。同前几节所說的双音节詞不同，在“好看”之类的双音节詞中，謂語或者是用副詞，或者是用能願动詞来表示，宾語則用不定式。这种詞組的特点，就是可以拆开插进否定詞“不”。例如“我能走，也能不走”。根据这种形式构成的双音节詞是为数不多的，只有几个例子。这种双音节詞的重音是落在第二个音节上面，例如：“好看”、“可恨”。

§26. 謂語性关系。同定語性和宾語性关系构成的双音节詞不同，謂語性关系对于詞組来說是非常重要的(§17)，不过在汉語的构詞中并不起什么显著的作用。例子也仅有几个：“年輕”、“老年”、“时常”、“时常的”和“国有”及其他等等。这类双音节詞的重音落在第二个音节上，也就是說，它不是詞而是詞組(§12)。但是目前这种形式的双音节詞有增多的趋向，例如“胆大”这个詞組，在語义上这类双音节詞組大都不是用于原义而是用于轉义，在語法上这类詞組則具有过渡的性質，証明就是否定詞“不”可以放在这种双音节詞的前面或者中間，說“不胆大”——“胆不大”，意思都沒有什么改变。而如果这种双音节詞轉为詞組的成分詞，中間那就不能插入否定詞“不”(§12)。

五

§27. 詞根的平等結合有两种：1) 同义詞根的結合，2) 相对或反义詞根的結合。

§28. 两个同义詞根的結合。例如：“朋友”、“干凈”、“喜欢”、“明白”、“并且”，等等。这种結构形式的特点，就是在許多情况下(但远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可以允許詞根换位(§18)。过去这类詞的詞根似乎在一切情况下都可换位，但是后来有些这样的詞把詞根的位序漸漸固定了下来，而別的詞还沒有固定…。

这种形式的詞重音总是落在第一个音节上面：“朋友”、“干凈”、“明白”，等等。

按照这种結构形式組成的詞，是为数很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至今这种型式还沒有完全丧失能产性，虽然它的来源是很古的。按照这个形式构成的复合詞，早就見之于《論語》、《孟子》之类的經書中(例如“朋友”、“道路”)。

§29. 两个相对或反义詞根的結合。例如：“父母”、“山水”、“笔墨”、“高低”、“多少”、“买卖”、“晝夜地”，等等。

按照这种結构形式构成的詞，为数不算太多，现在有向一种增加的趋势，因此沒有充分理由… 結构形式根本沒有派生能力；例如，在現代汉語中，… 是在白話中，就很容易构成这样的双音节詞：“… “工农”、“中外”，等等。誠然，这类双音节与其算… 詞，不如算作是詞組。〔証明就是它們的重音落在… 个音节上，例如工/农，而如果是双音节詞，那重音… 落在第一个音节上，例如“大小”(§12)〕，不过可… 样构詞却是相当明显的。汉語有一种变双音节詞… 双音节詞的总趋势，它們在今后也很可能变成整个…

六

§30. 詞根的平等-不平等(同位)关系(§19)… 种：1)同位詞是定語，位在被限定詞之前(称为… 位)，2)同位詞是宾語，因此位在謂語之后(称为… 同位)。

§31. 屬于第一种形式的有許多双音节詞，… 树”、“鯉魚”、“父亲”、“汉江”、“李能”(姓李名能)，… 見”、“曉得”，等等。

这种形式的語义結构是双重的。一方面合成… 此之間的关系是部分概念与总体概念的关系，是… 念与类概念的关系(不平等关系)，但另一方面，每… 成詞表示的却又是同一事物，同一行为(平等关系)…

我們已經說过，这种双音节詞在語义上的二重… 也表現在語法結构上(見§19)。它們有不平等关… 是因为定語放在被限定語之前；它們有平等性关系… 因为两个成分都必須是屬于同一詞类的。

这种双音节詞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例如… 树”、“汉江”、“看見”。

§32. 屬于上述第二种形式的有許多复合动… 在复合动詞的成分中含有一个表示动作方向的动… 根，例如“跑来”、“拿去”，等等。

这种形式的双音节詞，結构特点就在于表示… 方向的动詞詞根乃是主要动詞詞根的宾語。在我… 举的例子中，那詞根就是“来”、“去”。

我們所以要这样解釋，理由就是：1)“来”和“… 可以同主要动詞詞根隔开而加进别的詞，大家知道… 是后置詞的特征之一；例如“拿来”，还可以說“拿… 子来”，中間就插入一个宾語；2)在“来”和“去”之… 能加上一个表示物品的計量詞“个”，因为“来”和“… 本身就是附加語，必須与主要詞根屬于同一… (§19)。例如，不能說“拿个来”(試比較“吃个頂飽”… 里“个”把“頂飽”变成了名詞)。

另一方面，这种附加語的宾語性質还表現在… 相当的詞組上，例如：“我們就連忙用桨划了过去，…

个人救了出来"。

后置詞"过去"和"出来"如果同时用表示动作完成的后綴"了"来构成主要动詞，便确凿地表明"过去"和"出来"在这里应当看作是确定主要动詞动作方向的宾語性附加語(試比較"吃了飯"，"燒了个干净"，等等。这里宾語性关系在同时用后綴"了"构成动詞时也是通过后置詞"飯"和"干净"表現出来的。区别仅在于，这里我們遇見的是宾語，而在"划了过去"或"救了出来"的情况下，"过去"和"出来"則是宾語性附加語)。

能够在双音节詞的成分中用作宾語性附加語的动詞詞根，数目只限于几个表示动作方向的动詞。①

这种形式的双音节詞，重音是落在第一个音节上，例如"跑来"、"拿去"，等等。

汉語中(如"念完"、"看見"、"拿来"等形式)的复合动詞，特点就是具有許多共同性的語法特征。②

七

§ 33. 詞根的重迭結合的方式，在汉語(无論白話或方言)中都起很大的作用。重迭就是簡單的附加，不要改变詞根的語音結构，例如"哥哥"、"看看"、"快快的"、"天天"。除了形容詞以外，这类詞的重音总是落在第一个音节上："哥哥"、"看看"、"天天"。在重迭法构成的形容詞中，重音則落在第二个音节上：例如"慢慢的""快快的"。其所以如此，还有韵律方面的原因：重迭形容詞一般是加后綴"的"构成的，因此它們不是两个音节，而是三个音节。

重迭所引起的詞义变化，主要是量方面的变化，要看这个重迭詞是屬于那一詞类而有所不同。

§ 34. 重迭名詞。重迭名詞表示的是分別性(разделительность)和个別性(дистрибутивность)，例如："人"——"人人"、"天"——"天天"。由数詞加名詞組成的詞根重迭結合也是这样，例如"一句"——"一句一句的"。

§ 35. 表示亲屬关系的叫法是重迭名詞当中特殊的一种，例如："哥"——"哥哥"，等等。这里显然是談不到分別性的。大概这里重迭称呼的原因也同別的語言的同类詞相同，如俄語的дядя(伯伯、叔叔、舅舅)、папа(爸爸)、няня(保姆)，等等。③

§ 36. 重迭形容詞。在这种情况下，重迭形容詞表示的是性質上輕重不同的程度，例如："快"——"快快的"、"恭敬"——"恭恭敬敬的"、"年輕"——"年輕輕的"。这种形式的形容詞可用后綴"兒"构形，例如"快快兒的"。

§ 37. 重迭动詞。同重迭名詞、重迭形容詞不同，重迭动詞在語法上的特征是，虽然从外貌看来它們的成分詞是平等的，但按其內部結构則是不平等的，理由就是它的第二个詞根乃是第一个詞根的宾語(所謂內受事)。如果逐字譯成俄語，那"看看"就是посмотреть смотрение，"想想"就是подумать думание，等等。我們說第二个詞根是第一个詞根的宾語，理由就是"看看"这类双音节詞形式可用时-体后綴"了"构成第一个动詞詞根(謂語)，并且在第二个动詞詞根之前可以加上数詞"一"。如除了"看看"、"想想"以外，还可以說"看了一看"，"想了一想"；若是詞根之間的关系为平等关系，那就不能这样。

"看了一看"这个形式(中間插入"了"和"一")又同"放了一槍"这类詞組很相近。这里"一槍"毫无疑問是动詞的宾語，但是这个宾語显然不是簡單的宾語，而是象"一看"(謂語性数詞)一样表示动作發生了几次的宾語…。④

动詞詞根的重迭，同名詞和形容詞詞根的重迭一样，会引起基本詞义产生各种量方面的变化：或者是加强那个动作(多次体)，或者是减弱那个动作(一次体)，这就要看上下文来决定…。⑤

§ 38. 重迭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所謂"对应重迭"(параллелизм)。这种重迭主要是四个音节的形容詞(伪副詞)，例如"不知不觉的"。在这种情形下，重迭中的第一个双音节成分同第二个双音节成分一样，都屬于同一詞类，都有同样的句法关系。如重迭形容詞一般的形式"对应重迭"也同普通的重迭形容詞一样，表示的是特征的强度。这种結构形式在現代汉語(不論白話或口語)中，用得特别广泛。我們举几个例子来說：

不知不觉的：每个双音节是由否定詞加动詞組成的；

夜靜更深的(时候)：每个双音节是由名詞主語加形容詞謂語組成的；

四邻八家的(那些个房子)：两个双音节都是由数詞加名詞組成的；

左思右想：两个双音节都是由副詞-定語加动詞-謂語組成的。

应該着重指出，在这种重迭形式中，两个双音节詞的第二个成分本身也能根据詞根同义性和相对性的原則构成双音节詞(有时第一个成分也可以，見§ 28—29)，例如在四音节詞"左思右想"中，两个双音节的第一个成分本身可以构成一个双音节詞"左右"，而第二

---

① 詳見龙果夫《現代汉語語法研究》，中譯本，1958年，98节。

② 同上書，94节。

③ 有些人認为汉語中这些詞是以指小表爱的意义(这仍然是数量方面的)为基础的。

④ 詳見龙果夫《現代汉語語法研究》，中譯本，93节，154节。

⑤ 同上書，93节。

个成分可以构成一个双音节詞“思想”。

八

§ **39.** 我們已經說过，汉語大多数双音节詞是按实詞詞根結合的原則构成的（§ 17—38）。加詞綴的办法在汉語中起的作用很小。不能算作实詞詞根的純詞綴，在汉語中是为数極少的。只有“桌子”、“慢慢兒地”等詞中的后綴“子”和“兒”，以及靜詞和屬性后綴“的”等等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同詞綴詞根并存的还有相应的实詞詞根，詞綴詞根同实詞詞根的联系，一般是說話人完全意識得到的。

§ **40.** 詞綴詞根同实詞詞根在外表上的主要区別，就是詞綴詞根沒有重音，也失去了独立的声調，而实詞詞根則两者都有。例如："房子"、"去了"、"看不見"、"第三个"，等等。

还有一些居中的現象，这是很有趣的。大家知道，汉語中有富于計量后綴作用并且詞根意义最广泛的“个”这个詞根，現在已經完全变成了詞綴，而專用的計量后綴同相应的实詞詞根至今还沒有完全断絕联系。这从下述事实就可看出，計量后綴“个”用在一切情况下都沒有独立的声調，而專用的計量后綴“間”或“把”在很多情况下則仍然保持有声調（亦即作为实詞所固有的声調），例如在同这个計量后綴有关系的名詞省略了的場合下就是这样：

这两个人——这两个
zhè liǎngge 'rén——zhè 'liǎngge
三間房——这三間
sānjian 'fáng——zh è'sanjiān

§ **41.** 其次，詞綴詞根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所含的輔音和元音可以簡化和省略，例如，后綴“子”在口語和方言（山东）中是發“zы”和“zʌ”的音。由实詞詞根“了”（表示“完結”）变成的虛詞“了”（表示动作完成的后綴）是發“啦”（ла）的音，等等。

§ **42.** 加后綴。在加詞綴的办法方面，在汉語中占有主要地位的要算加后綴。这里我們可以指出象“子”（表示物品的后綴）、“里”（后置詞）、“們”（集合复数后綴）和“了”“过”（带有体-时意义的动詞后綴）这样一些在口語和白話中用得都很广泛的后綴。

应当着重指出，在現代汉語文学語言（无論是書面形式还是口語形式）中，由于要創造表意确切的新的术語，可以看到一种扩大加后綴的范圍的趋势，扩大的办法有两个：

1）利用口語中已有的后綴：例如，把口語中的后綴“家”（如“人家”等詞中的“家”）用在“飞行家”、“資本家”和“汉語学家”等新詞中；

2）采用口語，特別是書面語言（文言）中的实詞詞根当作虛詞（后綴）使用。例如把“車”、“机”或“学”等詞根用在“电車”，“自行車”、“坦克車”，“飞机”、“[illegible]机”、“打字机”，“哲学”、“化学”和“算学”等新詞中。

俄語后綴-изм,-ация 和-ость 等，在汉語中就是[illegible]这种方法翻譯的，例如 марксизм（馬克思主义），со[illegible]ализм（社会主义）、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集体化），раци[illegible]нализация（合理化）、оĸтивносгъ（积極性）和 созн[illegible]тельность（覚悟性），等等。

在汉語中，創造新术語取得材料的主要源泉就[illegible]書面語言（文言）。文言在汉語中对于創造术語起的[illegible]用是很大的，毫不遜于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对于欧洲[illegible]言的作用。

§ **43.** 加中綴。中綴在汉語中为数非常有限，[illegible]是極少几个，那就是动詞的中綴“不”和“得”，表示[illegible]某种动作可能或不可能达到某种結果。

§ **44.** 加前綴。前綴在汉語中数量也不多。[illegible]是序数詞的前綴“第”（例如“第三个”、“第二个”中[illegible]“第”）和动詞前綴“給”、“被”。这两个动詞前綴都[illegible]态意义。其中第一个在發生学上同动詞“給”有关，[illegible]口語所特有，可借以构成中动态。这个前綴的意[illegible]表示动作的完成究竟对有关的人是有利还是有害。[illegible]如，“拄上|棍子|去|央告|街坊，給进|山里|去|找[illegible]找|她的|兒子”。①第二个动詞前綴“被”在發生学上[illegible]动詞“被”有关，同第一个前綴“給”不同，它也用在[illegible]語言（口語和書面）中，具有被动的意义。例如：“他[illegible]名|被革了”。

§ **45.** 我們知道，尽管中綴和前綴在汉語中[illegible]很有限，但是它們却同后綴一起在汉語的动詞結构[illegible]起極其重要的作用，构成一套很有趣的系統，即：

后綴用来表示时-体的不同，例如“跑了”“[illegible]过”；

中綴用来表示語气的不同（或“式”的不同），例[illegible]“看不見”“看得見”；

前綴用来表示語态的不同，例如“給放了”“[illegible]了”。

§ **46.** 在汉語詞綴系統中，詞綴“兒”占有一[illegible]殊的地位。同別的詞綴不同，別的詞綴可以通过[illegible]結构（粘着）的方法实現同实詞詞根的联系和彼此之[illegible]的联系，不会触动实詞詞根的語音結构，而詞綴“兒”[illegible]实詞詞根的关系則是典型的合并（熔合）关系，会破[illegible]实詞詞根的語音結构，不过合并的程度各有不同，在[illegible]种方言中因实詞詞根的語音結构而异…。②

（**郑祖庆**譯自《朝鮮和中国語言学問題》論文集[illegible]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学术札記 No. 236，[illegible]六分冊，1958；**黃振华**校）

---

①高本汉：«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illegible] Pekinese dialect», Upsala, 1917, 70 頁。

② 詳見龙果夫《現代汉語語法研究》，中譯本，50 节[illegible]

语文短評

581 “为紙老虎的戳穿而干杯！”“紙老虎”已經成为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共同語言了。它对于正在挣脱帝国主义枷鎖的殖民地国家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力量，为它干杯，为它欢呼，正是心声的表露。（新观察 1958年23期，9頁）

从語法上看，句中的几个“它”应該是代“紙老虎”的，但是我們当然不会受“紙老虎”鼓舞，也不会为“紙老虎”干杯、欢呼。可把第一个“它”改为“戳穿紙老虎”，后两个“它”改为“这”。（罗忠新）

582 在毛澤东同志文艺思想的光輝照耀下，我国現代文学跨入一个嶄新的阶段，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語文 1959年2月号，27頁）

“使”缺主語，从結构上看是“我国現代文学”；然而要說成“我国現代文学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意思上又不好理解。所以“并使”可以刪掉。（張正寰）

583 看！她对落后的事物的斗爭多么坚决，眞是一点不留情面；可是，她对新事物却特别敏感…。（文学青年 1959年2月号，8頁）

“可是”前后是并列关系，并不是轉折关系，“可是…却”应删，在删去“却”的地方添个“也”字。（王兆麟）

584 不管法国波旁王朝和拿破崙所建立的政权，都不能实現18世紀啓蒙哲学家所力求追寻和优秀的法国儿女所浴血斗爭的理想。（語文教学 1959年3月号，16頁）

“不管”的后面不能有并列成分，“和”应改为“或是”或“还是”，同时在“不管”后面添“是”，組成：“不管是…还是（或“或是”）…”。另外，“力求”和“追寻”意义有些重复，“力求”可改为“極力”。（王兆麟）

585 我們和她（他）們当中的好些人交談中，随时都能感触到这批青年的志气…（人民日报 1958年11月日3版）

1）“在…中”有时表时間、表过程。这里沒有用“在”，意义含混。 2）其实，去掉“中”，反而表达得明白。3）“她（他）們”用“他們”就可以。“他們”不是專指男性，虽然其中女性是多数，也不影响詞义的表达。只有表示选擇性的意思时，才有人用“她（他）們”或“他（她們）”。4）“感触”有“受到感动”的意思，用詞不当。“感触到…志气”，費解。全句可改为“我們和他們当中的好些人交談，随时都能感到这批青年有志气…”。（楊靜仁）

586 馬克思、恩格斯在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中所作出的偉大貢献，在于他們是有史以来运用科学共产主义一般原理和辯証唯物主义观点到文艺領域中来的第一人。（語文 1959年2月号，26頁）

“他們”怎么能說是“第一人”。改法是：删去“第一”，在“运用”之前加上“最先”。（張正寰）

587 从这些地方看起来，他是个很蠢笨，但又令人可笑的一副模样，因为他常常鼓吹七十四师的威風，同时不喜爱他这副可笑的蠢样子，曾有人对張华峰說：“向連長建議調他出去吧！”（吳强：紅日，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5頁）

这句話的毛病很多：1）“他是个…蠢笨”“他是个…模样”都不妥；2）“但”用的不妥；3）“…他常常鼓吹…威風，…又不喜爱他…的蠢样子”，这样看来，“鼓吹…威風”的是“他”，“不喜爱他…的蠢样子”的也是“他”自己。其实作者要表达的本意是“不喜爱他…的蠢样子”的是別人；4）“可笑的一副…”也不順。改法：把“他是个…模样”一句改为“他很蠢笨，模样又長得可笑”；在“同时”和“又”之間添上“別人”。（王昌杰）

588 “那春兰一甩自己脑后的辮子，側歪着臉袋，指了下运濤，…”（电影創作 創刊号，15頁）

說“歪着臉蛋”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加个“側”字。沒有說“臉袋”的，要末是“脑袋”，要末是“臉蛋”。（王存芳）

589 苗康長吁了一口气，接着說：“当时我眞怕！大家告訴我說是在右臂，我想万一勢必要动手术的話…”
（…杯中：我們播种爱情，109頁）

“万一”可能性很小，但“勢必”是必然的，这两个詞用在一起就發生了矛盾。可把“勢必”删去。（沈鴻鑫）

590 本来就坎坷不平的乡村，浸透了雨，浮着一層稀泥浆。（北方文学 1959年1月号，42頁）

說“路”崎嶇、坎坷不平可以，“坷坎”的“乡村”就有些勉强了；再在“乡村”上“浮着一層稀泥浆”就更說不通了。我疑心在“乡村”后面漏掉了“的路”二字。（艾白薇）

作家要注意詞汇的規范

王玉先

在汉語規范化工作中，大家都知道，作家和艺术家是担負有重要的責任的。如果一个作家对使用語言所持的态度不够認眞，那必将直接影响到汉語規范化工作的順利进行。

比如，《电影創作》1959年1月号所載《山里的人》这一篇文章，仅在用詞方面，就很使人难于滿意。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用了一些極不規范的詞句，讀起来很別扭，因而使文章大大地减少了对讀者的感染力量。試看下面这样的例子：

> 老鉄匠黄鉄錘也赶到了小山头，他爱羡的望着远去的鉄道兵…
>
> 鎮街上显得分外热鬧。
>
> 洪虹"这就是你履訂保証合同的嗎？"
>
> 李太无比欽羡地："三面紅旗啊！"
>
> 陈团長与指导員被这情景激动得十分欢快。

上例里"爱羡、鎮街、履訂、欽羡、欢快"等詞，就用得不够妥当。严格地說，这些詞是随便生造的。也許作者会說，"欢快"就是欢欣、愉快的簡化，"履訂"就是履行、签訂，"欽羡"就是欽佩、羡慕…。如果按这样推下去，人人都信手随便把两个詞拼凑来用，那还談什么規范，語言不是将混乱起来么！

提請詩人注意

彭庆达

1959年2月21日《文汇报》發表了蘆芒的一首詩，題为《战鼓，要擂得更响》。为了"从去年跃进的前沿陣地上一起再向前迈进"，詩人喊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意气風發，斗志昂揚。应該肯定，这种飽滿的政治热情是可貴的。然而，我們也不能不如实地指出，这首詩的語言是失敗的。請看下面的例子：

> 1）新的花已經結成新的蓓蕾。
>
> 2）又冲出大地的母胎里茁壮地怒放。
>
> 3）新的車間又象春笋一样伸出削尖的嫩芽。
>
> 4）我們要生产更多的有色金屬来奠基我們国民經济輝煌的大厦。

例1里的"花結成蓓蕾"是不通的，这違反事实的邏輯。作者的意思大概是"新的花已經在树上冒出了蓓蕾"。例2里有两个錯誤：a)既然是"冲出"，后面就不能跟上个"母胎里"，"里"字应該去掉；b)主語"蓓蕾"承前省掉，讀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蓓蕾"怎么是从"大地的母胎里""冲出"来的呢？又怎么是"茁壮地怒放"呢？像这种怪事，客观世界是不会有的。例3的問題在于修辞不当。"雨后春笋"可以形容新事物之多，"象春笋一样伸出削尖的嫩芽"却只能給人以纖弱无力的感覺，用来形容"新的車間"的建立与成長，是不通的。还有"削尖的嫩芽"这个詞組所表示的概念也含糊不清。例4的錯誤最明显，它把"奠基"这个动宾結构当作及物动詞来用，給語意带来了混乱。

当然，詩不同于一般的語言艺术，它要求用最精练而又最富于形象的語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詩人也可以在严謹的格律条件下，創造性地使用語言，詩里面也允許出現較多的无主句、單詞句等單部句，容許有更多的省略和倒装。然而，所有这些都有一定限度，那就是应該不影响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如上所述，《战鼓，要擂得更响》这首詩，在語言上却注意得不够。

評《向宇宙进軍的冲鋒号响了》一文的語病

罗忠新

《向宇宙进軍的冲鋒号响了》（載《人民文学》19…年2月号）是一篇內容丰富而思想性很强的文章，吸引着我讀了一次又一次；但是，从語文的角度来看，它却存在一些毛病。如：

> 1）現在苏联宇宙火箭訪問月宮和第一个人造行星的誕生，这一消息傳来，更轟动了全地球。

"宇宙火箭訪問月宮"和"第一个人造行星的誕生"本是同一件事，用上个"和"，就似乎是两件事了。"…誕生"应改为"并成为第一个人造行星"。

> 2）苏联宇宙火箭的發射成功和第一个人造行星的出現，（按：这是說得通的，因为宇宙火箭"發射"和它的成为人造行星是两回事。）在人类的脑海里波濤汹涌地奔流着，无限美好生活的前景，就将掀起探測宇宙奥秘的高潮。

"…的發射成功和…的出現"怎能在人类脑海里"奔流着"？是誰"就将掀起…高潮"？而"无限…前景"与上文的关系都显得松懈。若把"在"改为"使"、"奔流"改为"涌現"并去掉"无限"前边的逗号，改"就将掀起"为"并将带来"，語意似較紧凑。

一个名詞有几个定語，这几个定語的次序要排得当，否則将發生岐义。例如：

> 3）…繞着太阳飞行，成为第一个太阳系的人造行星，

句中的"第一个"应移置"太阳系的"后边，因为"太阳系"是沒有第二个的。

> 4）这是世界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苏联科学家为它写下了最光輝的一章。

代詞所指代的要明确，而这个句子中的"它"，从語意說是指的"世界史"，从句子結构来說却是代替"大事件"。去掉前一分句的"世界史上"，改"为它"为"在世界史上"，就免除了这种指代不明的毛病。

关于建立新"語言学引論"課程的討論情况

本刊編輯部

整風运动后期，各高等院校的中国語言文学系的語言專业同其他系科一样，掀起了課程改革的高潮，其間对語言学課程教学中存在的問題也揭露得很多。語言課程的教学工作是推动語言科学事业的重要环节，所以本刊从去年七月号起，把語言学課程整改的討論列为編輯任务之一。先是，以"語言学課程整改笔談"的形式，邀請从事具体教学工作的專家和青年教师發表些意見，同时加强了有关各院校語言教学整改情况的报道，以便于交流情况，互相啓發。后来，語言課程改革的討論随着教学計划的逐步修訂和具体的教学实踐，發現"語言学引論"这門基础課程的改革是个突出的問題，于是討論的中心便轉到怎样建立新的"語言学引論"課程上面。这一中心問題的討論是因本刊去年十二月号上發表裴显生、夏錫駿两同志的意見而进一步展开的。

截至本年四月号为止，参加这一討論的同志所代表的面虽不够广，可是对这問題的意見，都是有代表性的。大家都認为"語言学引論"課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样改革的問題，意見的紛歧也就表現在这方面。关于这門課的內容和怎样教法，大家一致要求要有統一的認識，可是截至目前的討論，对具体措施很少一致的看法。現在我們覚得有必要把这一时期参加討論的意見加以整理，以便于供关心这一問題的人参考。

关于怎样建立新的"語言学引論"課程，南京大学**裴显生、夏錫駿**两同志最初的意見是：在目前条件下应大力加强"語言学引論"的教学，要加强語言理論的科学性和指导性，闡明語言学各部門的基本理論，特別闡明党的語言政策，同时从汉語实际出發，講述馬列主义語言学的一般原理。青海师范学院**張成材**同志接着發表意見，認为：关鍵問題在于具体措施，不能光談原則。山东师范学院**孙亘明**同志認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語言学基本理論应該独成一局，不能同現代汉語合并，并且以为"語言学引論"在一年級开設，学生难于接受。山东大学**賀紹兰、葛本仪**两同志除肯定要繼續开这門課外，对怎样教法則認为：因为强調結合学生实际，所以在一年級講不妥当，应在講"現代汉語"以后再講。至于名称也可改为"馬克思主义語言学"。

裴、夏两位同志由于有人不同意他們的个别看法，于是再次發表意見。他們說，从汉語出發，不等于說以汉語代替一般語言学，只是要結合汉語来講党的語言政策，总結汉語的实际成果。他們認为，一年級应先講現代汉語，二年級再开"語言学引論"課。山东师范学院的**李子云**同志認为講授馬克思主义語言学除了应該包括基本理論外，还要有批判部分。南京大学的**許惟賢**同志主張这門課可以在一年級开，但要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并且不主張并入現代汉語課。吉林师范大学的**晶功**同志以亲身学習的体会，不同意低年級学生水平实际接受不了的說法，認为現在有条件在一年級开設这門課，內容可以不必多講語音、詞汇、語法部分。华中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集体的主張是：这門課可設在一年級，內容不必講語音、詞汇、語法，可放到"現代汉語"里。同时也不宜包括音位学、語法范疇等理論。新疆师范学院的**李兆同、徐思益**两同志在归納了各方面的意見以后，也認为所謂結合汉語实际，并不是完全以汉語为例，而是要把汉語研究上升到理論部分。怎样結合学生实际，就要看教材內容和教学方法如何。

总起来看上面这些意見，"語言学引論"这門課到底应該包括些什么內容和究竟在哪一年級开設合适，这两个問題，是討論中比較最突出的；而最根本的問題，即講这門課的目的性是什么，大家的認識也有分歧。

就本刊曾發表过的报道里看，"語言学引論"重新建立的具体措施，各院校也不一致，当然都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加以改进的。比如，**山东师范学院**最初把原来的"語言学引論""現代汉語""古汉語"三門課合并为"汉語"一門，而另設"馬克思主义語言基本理論"作为"汉語"一章。后来通过实踐証明这样改法不妥当，于是又把"語言学引論"独立出来。**北京师范大学**在課程改革后也是把原設的三門課合并为一門，統称为"汉語"，在一、二年級开設，并且把"語言学基本理論知識"放在"汉語"課的最后講。（这門課的《汉語講义》出版后，本刊曾收到一些讀者反映，对这本書的安排表示不同意見。）**北京大学**在整改以后，这門課注意到同"現代汉語"的分工配合，修訂后的教学大綱講授順序作了部分更动。**复旦大学**在本学期深入开展教学改革以后，語言專业从新制訂了教学大綱，开設五門主要課程："党的語言政策"、"資产阶級語言学說批判"、"一般語言学"、"文字改革研究"、"写作理論与实踐"。**南京大学**語言教研組認为"語言学引論"这門課应該解决的是教学目的和教材內容。**兰州大学**本学期新編的"語

（下轉249頁）

評雅洪托夫著《汉語的动詞范疇》

〔苏联〕 B. И. 高列洛夫

編者按： 雅洪托夫这部著作，本刊作为丛書之一已于1958年 11 月出版(陈孔倫譯，罗时豫校，中华書局出版，定价 0.90 元)。为了帮助讀者在閱讀本書时有所参考，这里我們特譯載了苏联友人高列洛夫同志所写的書評。本文中所注頁碼均据中譯本。

本書根据非常丰富的实际語言材料論述了許多有关汉語动詞的語法范疇和形式，以及句法特性和特点的問題。

虽然第一章占全書很小一部分，但是在这一章中却闡述了一个重要的問題——动詞在現代汉語詞类体系中的地位。同龙果夫不同，雅洪托夫 (C. E. Яхонтов) 沒有將动詞和形容詞归为一个更为共同的范疇——謂詞范疇。相反地，在对比了动詞和形容詞所具有的語法特征的基础上，他很清楚地指出了这两个詞类的共同特点以及显著的不同之处。最后他指出了动詞的八种主要特征，而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动詞和形容詞所共有的。雅洪托夫关于动詞在現代汉語詞类体系中的地位問題所持的看法，可以認为是很有根据的。

第二章是对汉語动詞作句法上的描写。为了說明动詞的一些类别的句法特点和确定支配关系的特征，雅洪托夫就不得不进一步明确宾語的概念，同时也就观察了同許多句法現象的特征有关的問題。这样就形成了本章的第二节——"宾語以及宾語和其他句子成分的区别"。为了要使宾語和句中其他次要成分区分开来，雅洪托夫使用了补足語和关系状語的概念；他寻求不同于俄語的另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或許可能作为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宾語的基础。如果不这样，宾語范疇究其語义与語法范圍来說，就会显得太广泛。这一节包含着不少很有意思的观察和結論。但是划分句中次要成分所根据的一些原則以及某些个别的結論，还不能認为是无可爭論的。雅洪托夫將动詞計算詞分出来，作为句中的單独的成分 (28—29 頁)。这种看法未必有益。所謂动詞計算詞仅仅在意义上才不同于指示行为持續的詞，何况它們之間在語义上还有一定的近似。①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这些詞的句法特性也是完全相同的(29 頁)：它們都是名詞和数詞的結合，同时通常放在动詞之后。这样区分句子成分失去了实际的語法特征，因而不一定能使人接受。也很容易看出，由于缺乏解决句法現象的細微差別的統一方法，因而就將指示行为持續的名詞和数詞的結合划为状語，而表示地点的名詞却又称为間接宾語 (26 頁)。

在本章材料中对具有强求意义的动詞的句法
的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为了使以后的叙述更为
起見，我們引一个例子："本村的王安福不止自动
息，还常常劝別人也那样做。"(45 頁) 雅洪托夫
正确地指出：位于句末的动詞在語法上不是从屬
語，而是从屬于由强求动詞(побудительный глагол)
达的謂語。②但是这也沒有完全將問題闡述清楚，
还必須确定两个动詞之間的語法从屬关系。雅洪
將第二个动詞称为补足語，認为它是句中單独的
成分。③ 將补足語看作是在現存的句中次要成分
中用来填补空白的看法，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在
上也可以对該現象的句法实質作另一种解釋。我
为，將第二个动詞看作复合謂語的一部分更为合理
下面的理由可以說明这样来理解两个动詞間句法
关系的性質是有益的。由于强求动詞的意义不完
所以它要求句中使用第二个动詞来充实它的意义，
求动詞和第二个动詞在意思上和句法关系上都極
切地联系着。也应当注意到，第二个动詞也可以
宾語。(順便提一下，这一点被雅洪托夫忽略了。)

---

① 俄語中这些詞屬于表示数量度量和时間度量的
語。参見苏联科学院 1954 年出版《俄語語法》，第二卷
分册，592—595 頁。

② 也有另一种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强求动詞的宾
时也是后一动詞的主語。参見王力著《中国現代語法》，
年上海出版，第一册，183 頁；伊三克、郭路特、苏維托夫
合著《华語教科書》，1954 年莫斯科出版，20 頁。

③ 如果从术語的角度来看，那么应当承認"客体-
成分"是比較恰当的。参見斯米尔尼茨基(A. И. Смирниц
著《英語句法》，1957 年莫斯科出版，251 頁。

④ 例如在俄語中 советую заниматся(劝告作)这
型的动詞組合就分析为动詞性复合謂語。参見季莫菲
(E. A. Тимофеев) 的博士論文《現代俄罗斯文学語言中的
定形式句》，1951年莫斯科出版，190—191 頁。在 на
льник велел вам никуда не уходить (首長命令你們
到任何地方去)中"不定形式是复合謂語的一部分"。参見
基金娜(M. M. Никитина)、苏和秦(B. П. Сухтин)《評"
語法"》，《語言学問題》1955 年第 3 期，120 頁。

比较自然的是提复合謂語的一个組成部分的宾語，而不是补足語的宾語。

作者也将补足語的概念扩大到在动詞謂語之后使用实詞的其他情况上。我們看看下面的例子："我兄弟三个…都在矿上机电股当了学徒。"（33頁）按照雅洪托夫的意見，"学徒"一詞起补足語的作用。同时他又指出，这种补足語是复合謂語的表語。后一种解釋比較正确，因为动詞和名詞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在意义上和句法上統一的整体。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在解釋这种現象的語法实質时，要使用补足語的概念。

在观察"走累了"（34頁）这种类型的詞汇构造时，提到补足語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实际上这不会带来任何东西，相反地，这只会引起錯誤的印象：似乎在詞的結构中也可以划分句子成分。只有在把位于宾語之后的名詞称为补足語的情况下，补足語的看法才是有益的，例如："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33頁）

雅洪托夫将位于动詞之后并在意义上表示所謂非轉讓屬性的詞看作句中單独的成分，称之为关系状語（35頁）。龙果夫将表示非轉讓屬性的名詞划为个别的詞汇-語法范疇是不对的；（我們同意魯勉斎(М. К. Румянцев) 对这个問題的意見。①）但是我們以为将这些詞划为一个特殊的句法范疇——关系状語也是沒有根据的。雅洪托夫写道：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人体各部分的名称或是动詞表示的动作扩張到事物的一部分的名称。"（35頁）大家知道，承受动詞表示的动詞的客体，而客体自然既可能是整个事物，也可能是事物的一部分，通常認为是宾語。因此从作为語法范疇的宾語以及宾語和动詞謂語間的基本意义来看，这些詞都无异于通常划为宾語的那些詞。自然在这些詞中也沒有外部的語法特征能作为将它們划为一个特殊句法范疇的足够根据。

我們以为，在具有表示非轉讓屬性意义的詞和形容詞發生关系的情况下，将它們称为关系状語是很不合适的，例如，"你爸爸那么大年紀…"（35頁），我們認为龙果夫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是对的。他将"大年紀"型的詞的組合划为所謂性質-事物詞組（качественно-предметно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并且認为后者在汉語中可以表示謂語。②

"宾語以及宾語和其他句子成分的区别"一节的材料表明雅洪托夫想在观察許多問題的基础上，找到对不包含在一般結构之內的复杂句法現象的解釋。同时这一节也十分清楚地說明我們关于現代汉語句子次要成分体系的認識是多么不够，我們的結論是多么不完善。

在本章的第三节中按照动詞的語义特点对动詞作了分类。这种分类的基础是将动詞分为及物动詞和不及物动詞。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在«俄語»这一著作的最末一部分中写道："深入地研究动詞的及物和不及物的对应范疇是从語法上来描写动詞体系的中心任务之一。"③这一意見对汉語来說也完全适合。雅洪托夫十分注意地对这个問題所作的观察是本書无可辯駁的优点。我們并不观察整个汉語动詞及物和不及物的問題，而想提出几点意見，因为在一篇短短的書評中即使是稍稍詳細一点地闡述这个最复杂的問題，也是不可能的。

正如雅洪托夫所写的，及物动詞的特征就是要求直接宾語（38頁）。他接受了穆勒（Jos. Mullie）和龙果夫的意見，認为直接宾語不仅可以置于动詞之后，而且也可以置于动詞之前，置于动詞之前时，宾語前面有虚詞"把"（25頁）。根据雅洪托夫的意見，直接宾語还有另一个特点：主动句中的直接宾語相当于被动句中的主語，换句話說，可以构成带"被"字的結构（25頁）。在意义方面"及物动詞表示动作，由于这种动作的結果，这些动詞的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状态、性質、空間的位置，对某一个人的从屬，等等，或者表示由于它的結果，客体产生或者消失的动作…"（38頁）。另一方面，說明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动詞的宾語，当它不表示在动作的影响下改变的事物，而表示反映在意識里的动作主体或在意識里引起某种感覚的事物和現象时，是間接宾語（50頁）。同时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动詞可以相当自由地构成带"把"或带"被"的結构。引用来証明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动詞組成的带"把"和带"被"的結构，"絕不是語言的規范現象"（51頁），这种意見未必有足够的根据。我們有大量的类似雅洪托夫在50頁所举的例子。此外，还可以同时使用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动詞以及带"把"和带"被"的結构，例如："你快点走吧，他会醒的，不要被他把你看見。"④这一切都使人怀疑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动詞是間接-及物动詞。"（50頁）最后一种看法也令人怀疑規則的正确性：只有能构成带"把"和带"被"的結构的宾語才是直接宾語。

我們認为，是否能构成带"把"的最特殊的句法現象，不是由动詞的物質意义来决定的（至少在現代語言

---

① 魯勉斎：«評龙果夫著"現代汉語語法研究"»，見«苏維埃东方学»1955年第4期，162頁。

② 龙果夫：«現代汉語語法研究»第一章"詞类"，195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68頁。（中譯本，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③ 維諾格拉多夫：«俄語»，194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762頁。（中譯本，时代出版社出版）

④ 巴金：«短篇小說集»，1943年長春版，85頁。

中是如此），因而不能根据动詞是屬于某一种个别的詞汇-語法范疇来決定，这首先决定于句子的結构特点以及（在最低限度上）决定于动詞-謂語的結构。因此能否构成带“把”的結构就不一定是用来划分及物动詞和不及物动詞的一种語法特征。

直接宾語和所謂“表示地点意义的沒有前置詞的間接宾語”之間的界綫不清楚（27頁），这就得出：同間接-及物动詞相对立的“眞正的不及物动詞”看来也可能有宾語，这种宾語在意义上同地点状語沒有区別。这一来就得出了“眞正的不及物动詞”还是可以带有表示地点意义的沒有前置詞的間接宾語，同时它們在实际上和間接-及物动詞沒有区別（58頁）。我們以为，企圖寻求直接宾語和間接宾語的区別乃是俄語体系的語法概念的反映；这未必能有助于說明汉語动詞支配关系的特点。对于汉語来說，将宾語分为带前置詞的和不带前置詞的两种还似乎比較有理由。这样区分宾語的具体形式显然是一种可靠的办法。

根据支配关系的特点对动詞作分类的时候，雅洪托夫有时又过于注意个别动詞的意义，这在客观上就意味着傾向于語义而忽視了描写汉語动詞本身的語法特性。例如，雅洪托夫認为：“如果动詞表示不能改变方向的动作（例如，‘掉’‘跳’；掉或跳的方向不能中途改变），宾語或状語就具有动作終点的意义，例如：‘掉地、跳井’。”（61頁）但是不能同意这个断言，因为这个断言違背了活的語言事实。动詞“跳”所支配的宾語不仅可以表示行为的終点，而且也可以表示行为的起点，例如：“黃：唉，你还劝过我跳楼！”①动詞“跳”支配的宾語可以表示事物，借助于这个事物进行跳的动作，例如：“跳降落伞”。由此看来，动詞的具体詞汇意义不能确定被动詞所支配的宾語的意义和特点，因为在汉語中不带前置詞的宾語和动詞-謂語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

第三章是对汉語动詞作形态上的描述。在这一章里对动詞語法范疇的各种現象作了很多細致的、有趣的观察。如果除去某一些值得商榷的意見（这是在广泛研究复杂問題时所不可避免的），那末，这一章就可以算是全書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了。

显然应当認为雅洪托夫在研究动詞时間特性之后所得出的結論之一是正确的。他写道：“汉語动詞的时…是混合体-时的范疇。”（175頁）实际上許多語言事实都証明，借后綴“了”“过”“着”构成的动詞形式不是表示純粹动詞体的意义，而是表示动詞的体与时的混合意义。在这一点上应当指出：祖加諾夫（A. M. Цуканов）在广泛而深刻地研究了借后綴“了”所构成的动詞形式之后，也得出了結論說：这种形式表示体与时的混合的語法意义。②

本書相当充分地闡述了时間形式的相对用法問題，这具有許多科学和实踐的意义。雅洪托夫研究了現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参111—160頁）的相对用法。如果归納这个問題的材料，那么，可以說在汉語中存在着所謂相对时的严格的体系。关于时間形式的情态-轉义用法（модально-перенос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問題很有意思。我們不否認在汉語中存在着动詞时間形式的轉义用法，但是我們認为：这种現象的使用范圍是有限的，同时也未必是在雅洪托夫所指出的所有情况下都有轉义的用法。比如，按照雅洪托夫的意見，現在-将来时形式可以用来代替过去完成时。在这种情况下，强調指出动作的突然、意外或者指出动作剛剛在这一时刻內發生（135頁）。显然，祖加諾夫所提出的解釋是合理的：他認为汉語动詞体系中体与时形式的存在使得无語尾形式的动詞在一定的句法条件下可以表示体与时的意味，而这种体与时的意味就其內容来說是和这些动詞形式的体与时的意义一样。③因而祖加諾夫在这种情况下認为不是动詞形式的轉义用法，而是受一定句法条件所制約的动詞形式的相对用法。

本書对結果动詞特征的問題所作的闡述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大家知道，这些动詞包含着許多在結构和用法的特点上都很有趣的詞汇組合。我們想談一談“走了出去”这一类型的組合，雅洪托夫認为：如果后綴“了”直接附在結果动詞的詞根上，那么，“結果动詞失去了完整的形式，而結动詞虽然仍是虛詞詞素，但在形式上却变成了單个的詞。”（92頁）稍后一点雅洪托夫又写道：“至于談到詞素‘来’和‘去’，那么，尽管我們根据傳統把这两个詞和同它們有关的結动詞連写，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它們在意义上和結动詞組成一个統一体，在形式上它們总是可以用宾語、地点状語或者主語和結动詞隔离开，可是它們不是在它們前面的动詞的組成部分，而是独立的虛詞。”（92頁）解釋是如此复杂而又缺乏說服力，因为雅洪托夫忽略了汉語中除“来”“去”型的虛詞素外，同时还存在“出来”“出去”型的虛詞素。有趣的是指出了这种类型的虛詞素不仅可以同动詞連用，而且也可以同形容詞及整个固定詞組連用。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虛詞素是不能分开的。在所謂表示运动方向动詞的动詞組合中，詞素“出来”“出去”起助动詞的作用，而这些輔助动詞在詞义上是一个詞。

---

① 曹禺：《剧本集》，1955年北京版，320頁。这个句子是Б. С. 伊薩琴科很熱情地介紹給我們的。

② 見所写副博士論文《現代汉語中以“了”結尾的动詞形式及某些体的問題》，1955年莫斯科出版，12頁。

③ 同上，10頁。

«清末汉語拼音运动編年史»簡介

倪海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 1.00 元。

周有光

研究汉字改革問題，不可不研究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汉字改革运动只有六十多年历史。它是“今”，不是“古”。就算它是“古”吧，也得“古”为“今”用，加以研究。汉字改革还沒有最后成功。今天的汉字改革运动正是清末以来的繼續和發展。

倪海曙同志著的«清末汉語拼音运动編年史»，使我們清楚地了解过去的历史，同时也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發展。

著者說：“这本編年史里所整理和記載的，是近代民族汉語拼音运动或汉字改革运动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清末汉語拼音运动或切音字运动的史实。”这里著者把汉語拼音的历史分为四个系統：（一）古代拼音方法反切和改良反切的系統；（二）外族或外国字母給汉字注音的系統；（三）教会方言罗馬字的系統；（四）近代民族汉語拼音运动的系統。最后这个系統又分为四个阶段：(1)清末的汉語拼音运动（又名切音字运动）；(2)辛亥革命后的注音字母运动；(3)五四运动后的国語罗馬字运动；(4)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开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本編年史就是第（四）系統第(1)阶段的历史。

这本編年史是著者对汉字改革运动史長期研究的成果之一。解放初期，著者写了一本«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簡編»(时代出版社出版，1948 年初版，1950 年再版)。后来他又編輯了一套«拼音文字史料丛書»和一本«清末文字改革論文集»(都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这本編年史可以說是«簡編»的發展，«丛書»和«文集»的精华。

除了倪海曙同志的著作以外，較早介紹汉字改革运动的書有三种：1)罗常培先生的«国音字母演进史»(1934)；2)黎錦熙先生的«国語运动史綱»(1934)；3)…道先生的«拼音文字的演进»(1939)。著者这本編年史比过去这些著作，內容更加丰富，分析更加深入，是一本精心細研的著作。

1892 年盧戇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一般的說法，把这一年当作是汉字改革运动史的开始。著者考証，在 1891 年，宋恕的«六斋卑議»成稿，最早提出了“切音文字”的名称。因此著者把汉字改革运动史的开始提前了一年。馬叙倫說宋恕“曾造切音文字，惜未見”。著者考証，宋恕造新字不是在«六斋卑議»成稿的时候，而是在 1909 年，称为“宋平子新字”，原稿三頁保存在溫州文物保管委員会。象这类历史上有关鍵性的問題，著者都細心研究，詳为訂正。

著者对历史功过，下笔謹严。例如他一方面对盧戇章在汉字改革运动上的貢獻点滴不遺地叙述說明，另一方面对盧的政治失节特笔大書：“戊戌(1898)維新失敗后，林輅存呈請推行切音新字的事也就沒有下文。这时日本的台灣总督兒玉邀請盧戇章去台灣主持总督府学务課。盧戇章丧失爱国立場，意然应邀去台，帮助侵略者办奴化教育。这是盧戇章历史上的一大污点。…盧戇章在早期切音字运动中所起的前驅作用，是不应該抹煞的；但是他的这种毫无民族气节的行为，也是不能原諒的。”

閱讀这本編年史，我們不但了解了許多历史事实，同时还学習到整理史实和研究史实的科学方法。

書中附“清末汉語拼音方案一覽表”，列有方案 28 种，注明年代、字母形体、拼音方法及其他项目，眉目清明，便于檢閱。

書中所附的圖片，也都是經过精选的。无暇閱讀原書的人們，細看这些圖片，可以对历史發展得到更加具体的印象。

我們希望著者繼这本編年史之后，再把其余三个阶段的历史也写成專著，早日跟讀者見面。

本書中某些定义不大确切。在 39 頁及以后部分中都談到了句子成分的“省略”。我們認为：进行句法分析时，不应当提句子成分的省略，因为这就意味着暗示似乎还有沒有写出的詞。在 160 頁中談到“就”这个詞的时候，雅洪托夫称之为“虛副詞”。我們認为：承認一个詞是虛詞就排斥了将它划入实詞类的可能，因为一个詞在原則上不能兼具实体和輔助的作用。①

最后想要指出：上述的缺点并不影响閱讀本書之后得到的良好印象。本書是一本有意思的書。并且对于研究和描写汉語动詞来說，絕大部分都是很有益的。

（方詩聰譯自«語言学問題» 1958 年第 5 期）

③ 詳見我写的«論“就”“便”“才”类型的形态特征問題»，見«軍事外語学院論集»，1956 年第 10 期，22–27 頁。(按这篇文章已由作者特投本刊，下期本刊即将發表——編者。)

语言学名詞解釋（八）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編

96 濁音 濁音即指声带起振动的輔音，由于發音时它是带有乐音的，因之又称为有声輔音。"濁音"本来是我国音韵学上所沿用的名詞，但現在一般地都加以采用。古代音韵学家曾把"濁音"細分为"全濁"和"次濁"两类：全濁是指有声的塞音、塞擦音和擦音而言的，次濁則指鼻音、边音和半元音。事实上，这种分类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只是發音方法的不同；将一組發音方法不同的音列成一类，而将另一組發音方法不同的音列成另一类，这种分类法并沒有什么必要。因之，現在我們不采用"全濁""次濁"这些名称。在現代汉語里，仅有少数方言（如吳語和湘語）中有濁音，这些濁音保存或部分地保存了中古汉語的特征；在大多数汉語方言里，缺乏閉塞濁音或摩擦濁音或具有不成系統的單一的濁音。例如在北京話里，除了唯一的舌尖前顎（即卷舌的）带音的擦音（即[ʐ]，如"日""仍""热"等字的声母）以外，沒有濁音。濁音在有些語言中也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例如在梵語和現代印地語中，送气和不送气的濁音有辨义作用。至于在汉語的吳方言中，濁音只是送气的，在湘方言中，濁音只是不送气的，两者都无辨义的作用。（甘）

97 清音 清音即指声带不起振动的輔音，由于發音时它是不带乐音的，因之又称为无声輔音。"清音"原是我国音韵学上沿用的名詞，而現在一般地都加以采用。但在古代音韵学上，"清音"可分为"全清"和"次清"两种：全清就是指不送气的无声塞音、塞擦音和擦音；次清指的就是送气的无声塞音、塞擦音和擦音。現在我們談清音不采用"全清"和"次清"这些名称，而只用"送气"和"不送气"来加以区别。在現代汉語各方言里都有送气清音与不送气清音的区别和辨义作用。（例如北京話里的"爸"[pa]和"趴"[p'a]，"道"[tau]和"套"[t'au]，"姑"[ku]和"枯"[k'u]等。）但在有些語言里，清音沒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清音或都是不送气的（如俄語、法語等），或都是送气的（如英語、德語等）。（甘）

98 送气音 送气音又称吐气音，这是指气流較强的輔音而言的，發送气音时，覺得从口中出来的气流較强。送气音是和不送气音对应的，發不送气音时，也有气流从口中流出，但其气流較弱。一般地講来，送气和不送气与清音的关系較大；有些語言中（如英語、德語等）清音只是送气的，在有些語言中（如俄語、法語等）清音只是不送气的，但在汉語各方言里，清音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都很大，并且有辨义的作用（如北京話的"补"和"普"、"多"和"拖"、"哥"和"科"等）。濁音的送气情况比較少見，有人認为汉語吳方言的濁音是略为送气的。至于在梵語和現代印度境內諸語言（如印地語）里，濁音的送气則比較显著，可是濁音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也具有辨义的作用。（甘）

99 濁音清音化 濁音清音化又称声音气化。这就是有声輔音由于受邻音的影响或由于自身的發展，变为无声輔音的現象。比方，在北京話的語音系統里，除了[ʐ]（如"日""仍""乳"等等字的声母）以外，沒有其他的有声輔音，但有一部分字（例如"病"[p-]，"房"[f-]，"动"[t-]，"共"[k-]等的声母，在中古时为有声輔音（即屬于群、定、澄、从、崇、船、并、奉等母的字），而到了后来才变为无声，这就是濁音清音化的产物。又如在英語里 play [plei]（游玩）这个詞中的 l，因受它前面无声輔音 p 的影响就化为无声的 l——即 [l̥]（在国际音标中，普通用"̥"这个符号加在音标的下面来表示濁音的清音化），一般的 l 本来都是濁音，但在这种情形下，因受邻音的影响而清音化了，所以变成声带不起振动的 l 了。（甘）

100 清音濁音化 清音濁音化又称气音声化。这就是无声輔音由于受了邻音（元音或有声輔音）的影响被同化为有声的現象。例如北京話里的"毛笔"[mau pi]、"目的"[mu ti]、"西瓜"[ɕi kua]这三个詞中的 p、t、k，在快讀时因受了前后元音的同化，結果就可能变成濁音。在国际音标中可用"ˬ"这个符号加在音标的下面以表示清音的濁音化，因此，"毛笔""目的""西瓜"在快讀时就可标作[mau p̬i] [mu t̬i] [ɕi k̬ua]，有时可以标作 [mau bi] [mu di] [ɕigua]。另外，清音也可因邻近的輔音的影响被同化为无声，比方，俄語中的同化，一般都为后退的同化（即逆行同化），遇到清音在前濁音在后时，这就出現了清音濁音化的現象。例如 сдать (交付)[sd-]>[s̬d-]（或[zd-]），отбои（打退）[-tb-]

>[-tb-]（或[-db-]），等等。（廿）

101 寬式标音法和严式标音法 寬式标音法又称音位标音法，即采用一种語言（或方言）中的音位符号来标出該語言（或方言）中的一切音，其中一个音位符号可以表示一个音位的各种变体。严式标音法又称音素标音法，它是采用一种語言（或方言）中一切可能出現的音素符号来标出該語言（或方言）的一切音素。每个音素的差別（即每个音位的变体的差別）都借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因之，寬式标音法所采用的符号有限，而严式标音法所采用的符号極多，但两者各有用途。在不妨碍辨义作用的原則下，采用寬式标音法可以使我們能尽量地少用符号。在普通的語音教学上和在普通标音时，我們所采用的符号是越少越好、越簡單越方便。比方，拿北京語音中的元音来講，如果采用音位标音，我們只需用 i y u e ɚ o a 这七个符号就够了，至于对待音位的变体的語音差异，在必要时，只需用它的环境或条件来解釋或說明就可以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采用音素符号来标出北京語音中所有的元音的音質（即音位的一切变体），那么就会有 i ɿ ʅ ɪ y u ʊ e ə ɤ ʌ ɚ o ɔ a ᴀ ɑ æ ɛ（及一切兒化詞中所产生的鼻元音如"棒兒"[pãr]"凳兒"[tʌ̃r]"名兒"[mɪ̃r]等）这么多的符号了！在普通的語言教学上或在普通的标音时，采取了这种方法、采用了这么多的符号，結果就会帶来很多的麻煩。可是在調查語言或調查方言时，或在分析及描写一个語言或方言中可能存在的一切語音的音質的时候，采用的符号越多才能越詳細越精确。在这种情形下，就必須采用严式标音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音位归納起来，才能确立或認識一个語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統。（廿）

102 方言地理学 方言地理学也叫做語言地理学。这就是运用有計划的調查来了解某些語言現象（語音、詞汇和語法）在全国各地人民口語里相同或互异的分布情况；或者說方言現象的地理分布情况，也就是某些語言特点在各地演变發展的現状和动态。比如"飢基几己寄記"的声母在北京讀舌面塞擦音 j[tɕ]，在沈阳、西安、成都、南京、上海、南昌、長沙等地也是讀[tɕ]，可是广州、梅县、厦門、福州等地讀舌根塞音[k]，胶东、蓬萊和浙南永康等地讀舌面塞音[c]（韵母一般是i、广州是ei），可見这些字的声母在南北各地的演变虽不一致，但有严密的規律可循，如果联系古音，我們不妨合理地推断北方讀音千余年間可能經历了下面的演变过程：k——→c——→tɕ，中間环节虽然缺少历史材料的引証，可是这类方音現象对了解和闡發語音演变的历史富有啓發性却是肯定的。詞汇或語法現象的地理分布也同样富有啓發意义，比如，"一所房子（房屋）"是北方話最普遍的說法，可是汉口、長沙、南昌等地的人說"一棟房屋"，上海人說"一幢房子"，广州、梅县人說"一間屋"。厦門人說"一塊厝"或"一間厝"，福州人說"一落厝"。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各地詞汇的异同，詞义和詞形的分化，量詞和名詞的具体配合关系。

方言地理学是方言学的一个重要部門，創始于德国 Georg Wenker（1876—1881 年間繪制了德語方言地圖）和瑞士人 Jules Gilliéron（1897—1910 年間繪制了法語方言地圖）。1938 年的美国新英格兰方言地圖在方法上和技术上有所提高。1957年莫斯科以东中央地区的俄語方言地圖在科学成就上有卓越的貢献。方言地理学同方言地圖的繪制和闡釋是分不开的。这門学問同語言史的研究有互相啓發和互相补充的作用。（袁）

103 方言地圖 方言地圖也叫作語言地圖，根据細密的調查結果，用地圖形式表現方言現象的分布。为了繪制方言地圖，調查計划必須严密：調查点的規定要考虑到居民的聚集（如城市）和分散（如乡村），居民成分的單純和复杂，山川阻隔和交通条件，等等；点和点之間的距离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記音符号要有系統（如国际音标），記音方法（符号的运用）要求取得內部一致；調查大綱可以分成語音、詞汇、詞法、句法等項；在普遍調查之前也可以首先进行深入的重点調查，把初拟的調查大綱加以修訂。一个調查点代表一定的面，要是点与点之間距离太远，那么在地圖上就很难正确地判定每个点所代表的面；这个面可以用方框形来表示，也可以用圓圈形来表示，这样地圖上就不留空白；最好每个調查点用一个小圓圈来代表，没有調查的地方就留作空白。例如"歌蛾科"的韵母，北京讀 ɤ=⊙，沈阳讀 ə=◓，西安、成都、汉口、長沙、南昌、厦門讀 o=○，上海讀 u=◐，湘乡（双峰）讀 ʊ=◑，南昌、广州、福州、梅县讀 ɔ=◒，…然后附加一个說明："歌蛾"古果攝歌韵（开口一等），"科"古果攝戈韵（合口一等）；沈阳 ə 和 o 不分（有 ə 无 o），上海 u 和 o、湘乡 u ʊ 和 o、厦門 o 和 ɔ 是不同的元音音位。这些圓圈兒要是着上不同的彩色就更醒目。地圖的繪制当然还可以采用不同的設計，比如把相同的点用同样的綫条画在所代表的面上：直綫、横綫、斜綫、曲綫、断綫…。讀一幅方言地圖，需要語言学和語言史的修养，才能进行科学的观察、分析和联系。較大規模的方言地圖的設計和繪制，应該由国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統一領导。方言地圖对国家的文教事业（如語言教学）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袁）

104 同言綫 同言綫指方言地圖上的分界綫，綫的一边在某个語言特点上是一致

的，形成了甲方言，而另一边在相应的語言特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是不同于甲方言，这样就形成了乙方言。实际上方言現象的分布总是很复杂的，所以同言綫也是曲折、錯綜、很不規則的。一幅方言地圖往往只表現一种語言現象，可是一幅綜合性(經过选擇)的方言地圖可以表現几种語言現象，这就容易發現几种同言綫極少完全吻合或重迭，可是同时也会發現其中有些同言綫部分地吻合或重迭，这就形成了同言綫"網"里的綫"丛"（或"带"），正是方言区分界的所在。我国方言地圖的繪制还缺乏丰富的經驗，因此关于同言綫的理論还缺乏專門的研究和闡發。

同言綫是一个总称：如果要分别表示各种語言現象，也不妨分立同音綫，同調綫，同詞綫，同語(語法)綫等名目。"同言綫"这个术語源于希腊語 isos（相同，相等）和 glôssa（言語，話）。有些人譯作"同語綫"或"等語綫"，似不如"同言綫"合适和明确。（袁）

105 历史比較語言学

历史比較語言学是語言学中一个重要的部門，它以历史比較法为基础，研究語言的亲屬关系。凡具有共同历史来源的語言，也就是說，凡从一种語言分化出来的諸語言，它們之間照例必多少保存着一些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上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通过語音表現出来，而且都是有規律的(即所謂"对应規律")，历史比較語言学就是利用反映在語音上的这些对应規律去追溯它們的亲屬关系究竟怎样。

要科学地了解一种語言，必須掌握它的历史和亲屬关系。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要能了解'本民族語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發生及其逐步的發展。如果一不顧本民族語言自身的已死的状态，二又不顧各种有亲屬关系的活的語言和死的語言，那么上述的这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比較語言学的产生，跟整个社会科学从十八世紀抽象的唯理主义之轉向历史主义有联系，它是十九世紀初在比較印欧語系各种語言事实（尤其是由于引用了梵語的資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比較語言学的产生和發展使語言的研究轉入了历史的、科学的軌道，对于普通語言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奠基者是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葆朴和格里木(恩格斯曾对葆朴和格里木的成就作过很高的評价)。其后有不少人从事印欧語系的历史比較研究，其中著名的，在西欧有施来赫尔、勃魯格曼、德尔勃呂克、德·索緒耳、梅耶等人。在俄国有佛尔吐拿托夫、保哥洛紀茨基、布鉄勃尼亞等人。除印欧語系外，也相繼有人研究其他的語系，有些語系的亲屬关系已經研究得相当清楚。

汉藏語系方面，解放前曾經有西洋的傳教士和学者作过一些研究，其中往往錯誤百出，沒有很大价值。我国有些語言学家也搜集过一些材料。总的說来，我們对汉藏語系各語言的亲屬关系还只有大致的了解。解放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領导下，对汉語的各方言和我国境內各少数民族的語言进行了全面的、大規模的調查，积累了大量宝貴的資料。可以断言，我国語言工作者不久一定会在汉藏語系的历史比較方面做出巨大的成績。（叶）

106 历史比較法

历史比較法是历史比較語言学所使用的特殊的科学方法。它通过有計划地比較两种或几种具体語言內彼此对应的較晚事实，来构拟未經文字記載的过去的語言事实。

在大多数的历史比較研究中，这种方法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驟：

1）在比較带有意义的語言單位(假定这些單位有共同的来原）的基础上，比較亲屬語言中的語詞詞素。

2）在被比較的因素間确定有規律的对应。

3）确定被比較对象間大致的先后关系。

4）构拟古代形式。构拟时要考虑到个别語言已經确定的語音規律，以及类推作用是否可能影响个别語言丧失某些古代的形式。

試比較拉丁語的 hostis，古俄語的"гость"，哦特語的 gasts。由于它們的意义相同，声音相似，可以假定它們具有共同的来源；但这种假定只有当它們語音結构中的全部差别被解釋为有規律的对应以后，才能証实。因此，就必須：

(一)指出拉丁語 h，古俄語"г"和哦特語 g 的对应規律，亦即确定在一定的位置上，拉丁語的 h 总是跟古俄語的"г"、哦特語的 g 相对应。

(二)指出拉丁語 o，古俄語"o"和哦特語 a 的对应規律。

(三)說明为什么在拉丁語中詞根 host- 后面有 i，古俄語中詞根"гост-"后面有弱化元音"ь"，而哦特語的詞根后面沒有任何元音。

(四)說明为什么在拉丁語和哦特語中这个詞的詞尾都有主格的标志 s，而在古俄語中沒有。

在解决了上述四个問題以后，为了在被比較的各种語言語音系統發展特点的基础上揭示所有这些对应的規律，还須进行原始形式的构拟和确定每种所見形式大致的先后关系。由于这个詞的开头輔音的原始性質还不清楚，在构拟时需要运用其他印欧語的材料，特别是古印度語的材料。結果，所构拟出来的形式就是 *gho-stis。把这一形式跟拉丁語、古俄語和哦特語进行比較，可以看出它在无論哪一种語言里都沒有完整保存下来，但其間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些語

有的語音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同时，我們还能看到，始的形式在拉丁語中保存最多，在古俄語和峨特語它都丧失了个别的要素。

历史比較法主要是在应用于印欧語材料的基础上生的，它只在构拟語言的音位和形态單位构成的方上具有足够的系統性，应用在亲屬語言的造句法和学方面还很不完备。可見历史比較法不能研究語变化过程的全部范圍，而只是个别部分，个别支流。外，通过历史比較法构拟出来的古代形式往往带有式的性質，过于簡略，不能揭示所研究現象的眞正的体历史。这些都是历史比較法的缺点。但是尽管这，历史比較法在探索語言的亲屬关系，从而研究語的發展規律方面，仍不失为一个科学的、有效的方(叶)

107 馬尔学派 馬尔学派是以苏联語言学家馬尔(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Марр 64—1934)为首的一个語言学派。其中主要的代表有墨山宁諾夫(И. И. Мащанинов)，格林珂娃(Грин-ва)，菲林(Ф. П. филин)等。从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到50年，这一学派在苏联有很大的势力，形成了一种“学式”的壟断，給苏联語言学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这一学派的“語言新学說”認为語言屬于上層建，而且有阶級性。馬尔学派否定有全民的語言。他以为人类語言最初是“手势語”。有声語言产生于阶社会，最初并非作为交际工具而是一种招喚圖騰的术工具。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是从 сал, бер, йон, ш 这四个共同的材料所产生的(即所謂“四要素的理”)，而以后語言的發展都是統一的融合的公式，它是“革命爆發”中产生，并且反映社会經济形式的更換。就完全否定了各个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他們还認語言的發展是分阶段的，而把汉語这样一些“單音”的語言列为人类語言原始的阶段，而最高的阶段則印欧語。根据四要素的理論，馬尔学派認为語言产的材料沒有不同的可能性，因此他們根本反对历史較法，認为它是“形式主义”。馬尔学派过高地估計义学，混淆了語法和詞汇，把語义包括一切。这样一些理論給苏联語言学带来了很大的損失，如忽視亲屬語言的比較研究，在語言教学中忽視詞法等。

当然这一学派中的某些著作由于擺脫了“新学說”的錯誤，也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馬尔本人的《阿尔明尼亞-格魯吉亞語語文学著述与論文集》，以及这一学派其他人所著的如《格魯吉亞古典文学語言的語法》(1925)等。这一学派在具体語言的研究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献。

苏联在1950年曾对馬尔学派的学說进行了專門的討論，斯大林同志在《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一文中指出了馬尔学派的“新学說”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虽然他們自称是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赵)

108 語言 汉語是一种語言，俄語又是一种語言。任何正常的人，至少都会一种語言。語言必須有声音做它的物質外壳，这种声音就是語音；必須有它的建筑材料，这种建筑材料就是詞汇；还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則把这些材料組織起来，这种規則就是語法(語法結构)。語音、詞汇、語法是語言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語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交际工具；有了語言之后，才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轉变过程。人們运用語言交流思想，进行交际，組織社会生产和社会斗爭，推动社会前进。語言旣然是人类所特有的交际工具，它就是一种社会現象，不是自然現象，它是随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社会以外，无所謂語言。語言也不是个人現象，任何語言都是为了交际的需要而創造的，并且是在全社会成員的交际中逐步發展和丰富起来的。語言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現象，它旣不是經济基础，又不是上層建筑。它是許多时代的产物。語言是全民的交际工具，沒有阶級性，它是全民創造的，而且一視同仁地为不同的阶級服务。阶級習慣語只是一些少数的特殊詞語，不具备語言特点的本質——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构，根本不是什么“阶級語言”；使用的范圍也很狹窄。語言和抽象思維有紧密的联系，它是抽象思維必不可少的工具，語言并且推动了抽象思維的發展。(石)

(上接241頁) 言学引論”講义增加了“党的語言政策”、語言学界两条道路的斗爭”等章节，并且同“現代汉”沒有重复。其他一些院校在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但是，总的要求和認識是这門課不能取。很多人認为，这一时期在本刊上的討論，对改进語教学工作是有好处的。比如，华中师范学院和南京学都認为本刊所發表的各地改革情况以及討論意見他們的工作有所啓發。

这次本刊对于語言学課程整改的討論，組織工作做得有些不够的地方，經裴显生、夏錫駿两同志指出后，已加以及时糾正。此外，有些关于这方面的来稿，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完全發表，我們在此謹向这些同志致謝。关于怎样建立新的“語言学引論”課程的討論，截至目前，虽然仍存在一些分歧意見，可是本刊認为，这些問題，如內容包括什么和哪年級开設，等等，必須通过一个时期的教学实踐，逐步摸索，才能获得比較切合实际的集中意見。現在有些院校的語言教研組已在这样做，所以这个討論也就可以暫告一个段落了。

读者　作者　编者

感謝讀者的帮助

看到《中国語文》1959年2月号上發表的潘禾等同志对我室編的《語言学名詞解釋》提的意見，并其后本刊轉来的讀者来信，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帮助。我們准备在將来修改《語言学名詞解釋》的时候考虑这些意見，尽管有的还有待于討論，但有些是可以接受的。这里我們就不一一另作答复了，只希望讀者以后繼續对我們这个工作提出意見。（**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

讀書評所想到的

我讀过郑梅基同志的关于《現代汉語成語詞典》的評介文章（本刊1959年2月号，93—94頁），当时沒有較仔細地翻閱原詞典，对郑同志的文章提不出什么意見。最近又讀了米若同志的文章——《有严重錯誤的"現代汉語成語詞典"》（載《讀書》1959年第6期），文章說詞典"不是語言科学研究的产物，而是一本粗制濫造的書"。这个意見因为是跟郑梅基同志的意見針鋒相对，完全相反的，所以引起了我对《現代汉語成語詞典》探索个究竟，从而比較郑、米二同志意見的兴趣。翻閱的結果，使我了解了《詞典》的基本情况，看到了它的全貌，認为是一本瑕瑜互見的書。郑梅基同志对詞典的評价确乎高了些，有的地方近乎"过誉"。而指出瑕疵則有些抽象（如"运用新的立場观点的地方还嫌不够"，沒举一个例子），有些輕描淡写，自然算不得的評。米若同志的意見，許多是一針見血，打中要害，所列举的例証，也多是使人信服的。不过矯枉过正，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够公允的、客观的。从

典》的錯誤性質上来講是严重的，但它在全書中

只占極少数。当然，这样說絕不意味着原諒《詞典》

誤，对錯誤采取容忍、妥协的态度。恰恰相反，必

以恰如其分的严正的批評。郑梅基同志的意見夸

《詞典》的优点，无視缺点和錯誤，是不符合《詞典》

实际的，因而是主观主义的意見；米若同志夸大《

的缺点、錯誤，不提一点兒优点，采取一笔抹煞的

是一棍子打死的偏激的意見，也是主观主义的。

为客观的評价应該是肯定《詞典》的好的方面，同

出存在的缺点和严重的錯誤。总的說来，这是一

用的但又有严重錯誤的工具書。細一些分析則是

数量上看，正确的有用的部分占压倒多数，缺点、

只占少数；从性質上看，缺点、錯誤又是严重的，不

忍的。这样才是公平的态度，对于青年語文工作

不是无原則的捧場或者夸大优点縮小缺点、錯誤，

使他們飄飄然起来，也不是拿缺点、錯誤总括全書

棍子打死，从而压抑了新生力量。

从对于《現代汉語成語詞典》的評論上，还

一个問題，即刊物編輯同志对作者所評的書刊閱

究得还很不够，而多是就書評論書評。这是不

比如郑梅基同志的書評，如果編者能較多地通讀

那本詞典，我想里边那些严重的缺点、錯誤一定会

的。那么，就有可能采取措施，避免过分表揚的評

現了。因此，在書刊評介方面，我建議編者同志努

到閱讀所評介的書刊，考較作者表揚或批評的根

一步提高書評的質量。（**刘凱鳴**）

中国語文

月刊
1959年5月号
总第83期
1959年5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每册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19,815册　代号2-44